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9 1957

506.1
5600.1
C2

中國語文

总第64期

10

1957

1957年10月号(总第64期)目录

方言复杂能不能实行拼音文字?	王 力 (1)
批判語言学界右派分子聞宥的反动言行和欺詐作風	罗 常 培 (5)
秦鳳翔对待民族語文工作的反动观点和破坏活动	繆 鶯 和 (8)
右派分子陈夢家是“学者”嗎?	唐 蘭 (13)
繼續追击右派——駁斥陈夢家、关錫	秦 华 (17)
普通話异讀詞审音表初稿和本国地名审音表初稿	普通話审音委员会 (20)
关于少数民族語言中新詞术語的問題	傅 懋 勳 (31)
对翻譯工作的几点意見	謝尔久琴柯、吳 乐 (35)
論現代汉语簡單句的分类問題	龙 果 夫 (38)
迭字詞尾初步研究	馬 克 前 (44)
南京話中的“A里AB”	蔣 明 (47)
語文短評	(48)
“語文短評”討論	楊 一 可 (4)
語文筆記	
从翻譯工作中看汉语的問答句	王 素 蓉 (37)
中古方音差別問題	章 璠 (封4)

方言复杂能不能实行拼音文字？

王 力

文字改革是党的政策之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说：“应该在全国各地区努力扫除文盲，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文字改革”；周恩来总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说：“继续努力扫除文盲，发展小学教育，开展工农群众的业余教育，逐步推行文字改革。”这次右派分子猖狂地向党进攻，反对党的领导，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反对思想改造等等，同时他们没有忘了向文字改革这一政策进攻。岂但没有忘了？他们还希望在这里打开一个缺口。

右派分子不是千方百计企图争取知识分子吗？文字，这是知识分子的命根子。假使文字改革的结果会使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文盲，岂不是要了知识分子的命了吗？右派分子自己分明知道不会有这样的结果（预料推行拼音文字的初期，方块汉字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同时通行，而且由于拼音文字容易学，知识分子如果愿意学，一学就会），但是故意危言耸听，让一般知识分子上他们的当。只要大多数知识分子在这一个政策上对党不满，就达到了他们打开一个缺口的目的，从而破坏党的威信。右派分子的用心是恶毒的。

知识分子对方块汉字有感情，这是不可否认的。拿我个人来说，我直到今天还喜欢写毛笔字。我学过两年何陋基，虽然学得很不好，但是当我用钢笔写字的时候，就更比不上一个小学生！拼音文字无论怎样容易学，对我来说总比不上方块汉字好，因为我和方块汉字相依为命已经四五十年了。但是，我想我应该克服这种感情，我们应该好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右派分子是利用知识分子对方块汉字的这种感情来做煽动工作的。但是，这个理由是说服力不强的，于是他们找一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为六亿人口着想”的理由。这种理由就是：文字改革是行不通的，是对全体汉族人民甚至全国人民有害的，是会造成天下大乱的。

文字改革为什么行不通呢？说来说去，主要的理由只有两个：第一、汉语方言复杂，将来拼音文字比方块汉字还要难学；第二、文字改革后，文化遗产没法子继承下来。应当指出，拿这两个理由来反对文字改革的人并不都是右派分子；但是，右派分子的确也拿这两个理由作为武器。

第二个理由是比較容易駁倒的，如果真的为六亿人口着想的话。无论哪一个国家，文化遗产都是通过高级知识分子，间接地传给一般群众的。一般群众并不需要直接地接受文化遗产。今天汉字并未改革，但是一般群众也并不能直接接触杜甫的诗，更不必说《诗经》《楚辞》了。领导上一再声明，汉字永远不会被废除的，将来由专家们翻译一些重要的古书给大家看，或者写些有关古代文化的书给大家念，有什么不好呢？即使有若干不便，比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事业中所需要的一般文化水平来，又是哪一件重要呢？接受文化遗产的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至于第一个理由，那是许多理由当中最富于煽惑性的理由。在这一篇文章里，我想就这个问题加以讨论。对右派分子来说，这是駁斥；对一切善意的但是怀疑汉字拼音化的可能性的先生们来说，这是商量。

二

我们在讨论文字改革的时候，在语言和文字的关系上，必须先有正确的认识：我们既不可以把语言和文字割裂开来，也不可以把语言和文字混为一谈。右派分子反对文字改革，喜欢把语言和文字等同起来。他们说文字改革将会引起语言的变化，仿佛改革了文字同时也改革了语言。其实主张文字改革的人们从来没有主张过语言的改革，因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在人民文化生活上也没有这样的要求。再往深一层说，语言的改革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右派分子又说：推广普通话谈何容易，连语言学家们的北京话都说不好，怎么能推行拼音文字呢？这又是把语言和文字混为一谈。我们试举外国语为例。实际上，人们学习外国语的时候，并不需要说得完全和外国人一样，然后会写外国文字。中国人学习俄语，就一般说，对于硬音 π 学得很不好，对于软音 πb 学得不很好（特别是后面没有母音跟着的更学不好），但是这并不妨碍中国人按照俄文的正字法正确地写出每一个 π 来。中国人学习越南语，对于一个 a 音就学不好，越南语的 a 的发音部位太靠前了，如果和长沙话的后元音 a 相比，差别太大了。差

別大到那種程度，甚至使越南人听不懂中國人所說的a。但是，當中國人學習越南文字的時候，誰不會把這個a寫下來呢？

學話靠口才，學字不靠口才。有許多自修外國語的人們，能看外國書，能寫外國信，甚至能寫外國文章，就是不能和外國人會話。這完全足以證明，學習語言和學習文字是有分別的。學習語言靠着一張嘴；學習文字却靠着眼睛和手。

學習北京話和學習外國語，在學習的性質上並沒有什麼不同。如果說有不同的話，那就是說：作為一個本國人，學習北京話比學習外國語容易得多。

許多人在學習一種語言或方言的時候，自己以為學得很像，實際上學得很差。拿北京話來說，許多人以為自己的北京話學得很到家了，北京人一聽就知道他們是外地人，甚至知道是廣東人、福建人、浙江人，等等。就學話的本領說，學不像當然要算是缺點。但是，他們之所以不能發現自己的錯誤，這並不是沒有原因的。原來漢語方言相互間有一種對應規律，使沒有受過語音學訓練的普通人產生一種幻覺，把相對應的語音單位錯誤地認為相同。這種幻覺，對於學話來說是有利的，對於學習拼音文字來說却是有害的。舉例來說，上海“好”字唸[hə]，北京“好”字唸[xau]，上海人學北京話的時候，往往不知道把[hə]變成[xau]。為什麼呢，這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已經在說[xau]了，和北京人一樣了。實際上，是上海的[h]和北京的[x]相對應，上海的[ə]和北京的[au]相對應，上海人在學習拼音方案的時候，不自覺地把自己的[ə]寫成為au，自己的[h]寫成了h（拼音方案中的h代表着北京的[x]），這就變了不學而能。由此類推，上海人對於“包、刀、糟、糕”等字的韻母都會寫了，對於“很、烘、耗、呼”等字的聲母也都會寫了，誰能知道他們說起普通話來還是“鄉音未改”呢？

再舉一個例子來說。客家話里沒有iang，只有iong（良 liong，相 siong，央 iong）。當一個客家人說北京話的時候，往往原封不動地把他所習慣的iong來代替北京的iang。但是，如果要他用拼音字母拼寫普通話，他決不會寫成iong，而且他一定能很正確地寫成iang。為什麼呢？因為他並沒有意識到他實際上說的是iong，他覺得他所習慣的也正是北京話里的那個iang。口笨的人，心並不笨。他學了幾天拼音字母以後，看見拼音表上並沒有的iong這個結構形式，他決不會憑空製造出一個iong來。

三

我並不企圖證明：人們用不着學好普通話就能用拼音字母拼寫普通話。我的意思是說：如果目的是為了正確地拼寫，那是正字法的事，不要和正音法混為一談。儘管發音不十分正確，只要心知其意，再加上記憶，就能拼寫得十分正確。

學話的困難有兩方面：第一方面是咬字不准，第二方面是應合而分和應分而合。咬字不准，一般並不妨礙拼寫的準確。許多南方人發不好北方的ㄹ母，但是，拼音方案規定ㄹ母寫成r，他們就會把“人”寫成ren，把“入”寫成ru，等等。在應合而分的情況下，也不太难。例如北京“記”“忌”同音，上海“記”“忌”不同音，上海人拼寫普通話，只要記住把“記”“忌”拼成一個樣子就行了。在應分而合的情況下，才是真正難點之所在。例如北京“陳”“程”不同音，上海“陳”“程”同音，上海人拼寫普通話，就不容易辨別：哪一個該拼成chen，哪一個該拼成cheng。在這種情況下，非靠死記不可。

但是，也不要把問題看得那麼嚴重。假使一個上海人把“推陳出新”寫成了tuichengchuhin，把“規程”寫成guichen，那該算是寫別字。現在工農大眾學習方塊漢字，由於漢字難認難寫，不是也天天寫別字嗎？拼音字母寫成的別字，往往只差一個字母，而方塊漢字寫成的別字，却是面目全非（如“推程出新”和“規陳”），到底是哪一類別字嚴重呢？

說到死記，難道方塊漢字就不要死記了嗎？恰恰相反，在一般群眾看來，方塊漢字正是需要每一個字都死記的。反對文字改革的先生們夸說“六書”神妙，而一般群眾却莫名其妙。誰能懂得“安”字為什麼從“女在宀下”（據《說文解字》）呢？難道女人戴上了帽子就算平安無事了嗎？朱駿聲解釋“安”字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安从宀女”，這簡直是對女性的侮辱！只有文字學家們知道這個宀不是帽子，也不是什麼“寶蓋”，而是代表房子的，但是，為什麼女人躲在房子里才算平安無事呢？仍舊講不清楚。“六書”這個東西，文字學家講得津津有味，群眾聽得昏昏欲睡！結果還要靠死記，硬記。

曾經有人統計過方塊漢字的筆畫的基本單位，大約共有四百多個基本單位（例如“大、女、子、士、土、亻、彳、冫”等）。方塊漢字之所以難認、難寫，主要是因為基本單位太多，太複雜。舉例來說，“冫”就是很難記的一個基本單位。在現代漢語常用字中，從冫的字很少，因此顯得不能自成一個范疇。再說，什麼意義的字應該從“冫”，也沒有一定的標準。按說，冫就是冰，凡和寒凍有關的字都該從冫，“冰、凝、冷、凍”等字都合於這個標準。但是，為什麼“治”也從冫呢？據說因為冶金好比冰雪的融化，那已經是大兜其圈子，不容易了解了。還有一個“准”字，它為什麼

么也从“𠂔”呢？原来“准”是从“準”变来的，省写了一个“十”字不能再省去一点，否则不是变了“淮水”的“淮”字了吗？这样是把道理讲通了，但是听讲的人已经打瞌睡了。学写字就学写字，谁还耐烦去学每一个字的历史呢？况且在某些情况下，连扫盲的老师们也被难住了。“决定”的“决”，“冲突”的“冲”，“凄凉”的“凄”，左边该写两点的“冫”呢还是该写三点的“氵”呢？依文字学家看来，这些字都该从水，不该从冰，但是至少从六朝以来，就有从“冫”的写法，应该也不算太错吧？这种混乱的情况，决不是很少的几个例子，而是占很大的数量的。

四

“超方言”是方块汉字的特点之一。在方言复杂的中国，反对文字改革的先生们经常指出这一个特点作为方块汉字的优点，以为将来的拼音文字既然是根据北京语音来拼写的，就会丧失了这一个优点。我想这个问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首先我们要问：方块汉字是凭着什么实质来取得这个超方言的特点的？一般人以为汉字表意不表音，所以能有这个特点。我以为这个说法是不够明确的。现阶段的汉字已经远离了说文所谓“画成其物，随体詁詁”，“视而可识，察而见意”的原始阶段。今天每一个汉字都只是一个囫圇的复合体，大多数的字形结构都毫无理由。（当然文字学家有一肚子理由，可惜工农大众不能接受，所以变成毫无理由。）没有理由就没有根据；没有根据的东西，可以说应用在任何语言都不妥当，同时也可以说应用在任何语言都行得通。如果我们喜欢自我陶醉，我们不妨夸口说：汉字不但超方言，而且超民族。无论任何民族，如果要表示平安，都可以写一个女戴一顶帽子。可惜的是再也没有这样欢迎“六书”的民族了；朝鲜和越南已经改用拼音文字了，日本也尽可能多用假名了。为什么呢？大约总是因为“六书”太难了吧？

为什么我们说汉字只是一个囫圇的复合体呢？因为在一个汉字的内部，各个成分往往经不起分析，分析开来变了毫无道理。试举“特别”这两个字为例。“特”字分析开来是一头牛在一座寺庙旁边，据说是“从牛，寺声”。“牛”是意义的符号，“寺”是声音的符号。但是“特”字的意义和牛有什么关系呢？“特”和“寺”的声音怎能搭配得上呢？文字学家说话了：“特”的原始意义是“公牛”，所以从牛；“特”和“寺”古音同在“之”部，所以从“寺”。“别”字分析开来是“另外”和“一把刀”（刂=刀），更不好懂。文字学家又说话了：“别”字是写错了的，本来应该写作“捌”，左边的“品”就是“副”字。“别”的原始意义是“解剖”，所以从“品”从“刀”。真是不说倒明白，越说越糊涂。如果作为囫圇的复合体来学，一般文盲每天倒可以学几个字；如果分析字形，讲出个道理来，反倒更难学了；工农大众不能放下铁锤镰刀专攻文字学，学了也记不住。我们说，汉字分析开来没有多大道理，因为我们所谓道理是帮助认字和写字的道理，不是反倒妨碍学习进度的所谓道理。

拼音文字即使受方言的局限，从最坏的情况来说，也不过是变为囫圇的复合体。假定一个工人完全不懂普通话，又没有学过拼音法则，要他学写一个 *tebie*，他就把它当成一个囫圇的复合体来照描，也绝对不会比照描“特别”这两个方块更困难些，相反地，也许还容易些，因为拉丁字母的笔画简单些，特别是只有二十六个字母（为汉语拼音用的只须用二十三个字母），不像方块汉字的基本单位多到四百多个。

上面我们所假定的最坏的情况是不现实的。实际上，情况决不会坏到这个地步。由于汉语方音有着对应的规律，人们就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遵循着这些规律，拼写出相当正确的拼音文字来。举例来说，上海“安”字唸 $[\phi]$ ，但是汉语拼音方案把“安”字拼成 *an*。一个上海人学会了这个拼法，尽管他不会发音或发音不正确，他总会觉察到：原来我们上海人唸 $[\phi]$ 的字应该写成 *an*。由此类推，他渐渐懂得把“干”写成 *gan*，把“看”写成 *kan*，把“汉”写成 *han*。自然，问题不是这样简单，“上海 ϕ = 普通话 *an*”这个公式还不能处处合用，他渐渐发现“专”并不是 *zhan*，而是 *zhuan*，“川”并不是 *chan*，而是 *chuan*，“鑽”并不是 *zan*，而是 *zuan*，“酸”并不是 *san*，而是 *suan*。但是，最后他还是得出一个结论：上海的 $[\phi]$ ，在北京话里，不是 *an*，就是 *uan*。如果他更细心一点，他还可以发现一个更精密的规律：上海唸 $[\phi]$ 的字，到了普通话里，如果在 *g, k, h* 后面，就只有 *an*，没有 *uan*；如果在 *z, c, s* 后面，就只有 *uan*，没有 *an*；如果在 *zh, ch, sh, r* 后面，多数是 *uan*，（如“转” *zhuan*），少数是 *an*（如“战” *zhan*）。这样，他所需要死记的东西就很有有限了。我们不要低估群众的概括能力。凡是概括的东西，群众也都有可能把它们概括起来。汉字演变到现阶段，实在太杂乱无章了，可以概括的东西不多。因此，即使在方言复杂的今天，拼音汉字和方块汉字如果进行竞赛，拼音文字还是能够取得胜利的。

五

什么时候实行拼音文字？这是群众所最关心的问题。一方面，右派分子歪曲事实，故意把拼音方案（草案）的公布说成是马上就要实行拼音文字（其实目前只是为了推广普通话）；另一方面，群众等急了，许多人责备文字改革委员会不早日计划文字的根本改革。其实“什么时候实行文字改革”这个问题，依我看来，完全要看条件是不是

已經成熟。假定一切条件都具备了，只剩下語言不統一，是不是可以实行拼音文字呢？我現在試圖回答这一个問題。

我个人認為，語言的絕對統一是不可能的，在很長的时期內，方言仍然要繼續存在下去。一方面，我們積極拥护人民政府推广普通話的政策，这样可以减少方言的紛歧，有利于拼音文字的推行；另一方面，我們坚决反对某些右派分子的主張，說是要等待語言完全統一然后实行文字改革，那样就等于否定了文字改革，因为如上面所說，方言的消灭絕不是一二百年的事。

大力推广普通話可以做到这一个地步：大多数汉族人民除了自己的方言之外还会說一种話——普通話。不必要求每一个人都說得一口漂亮流利的普通話，只要他們能像現在在北方服务的某些南方人那种南腔北調的“藍青官話”就成。到了这种地步，我認為就可以开始推行拼音文字。上面說过，即使在方言复杂的今天推行拼音文字，它也并不比方塊汉字更难学，甚至还比方塊汉字容易些；但是，这是有关六亿人口的文化大事，我們不能不慎重，不能不等到拼音文字的学习效率远胜方塊汉字十倍的时候才开始进行。不过，慎重不等于保守。

我想，拼音文字可以先在北方推行，然后逐步推广。这样，拼音文字可以早些推行，阻力較小。南方人可以自由閱讀拼音文字并且用拼音文字写文章。当然，拼音文字可以和方塊汉字同时并行一个时期，正如五四时代以后，白話文曾經和文言文并行一样。

拼音文字的推行，对普通話的推广能起很大的作用。只有拼写慣了，然后記得最熟，久而久之，会使人們对普通話的語音系統更加清楚，运用起来也就更加熟煉。正音和正字是互相为用的。推广普通話可以促成文字改革，文字改革实现后，还回过头来促成語言的統一。假使將來有一天，方言真正消灭了，那一定是拼音文字的功劳。

在西洋的一些比較大的国家里，方言也是很复杂的。举法国为例，据說法国南方方言（勃罗旺斯方言）和巴黎話的距离等于广州話和北京話的距离（参看柯恩《文字論》，28頁），这并不妨碍法国人使用統一的拼音文字。

等待語言統一然后实行文字改革的理論是極端荒謬的。我們如果拥护文字改革，就不能相信这种謬論。希望那些善意的先生們不要上右派分子的当，希望拥护文字改革的同志們更加坚决，为爭取早日实现文字的根本改革而努力奋斗。

“語文短評”討論

140 [原文]北京市京剧四团吴素秋的兩位好琴师都被別的剧院挖去了，現在她没有琴师唱戏。（光明日报 1956年9月30日2版）[原評]琴师只是伴奏，不是唱戏的。可把“唱戏”改成“伴奏”… [討論]这里的琴师只能說是操琴的，“伴奏”用于演戏不大合适。照原句意思可以改为“她現在因此不能唱戏了”（原句如果說“沒有好琴师唱戏”，則另有改法）。值得討論的是原句有没有必要改。我以为：一定的句子結構有着一定的表意功能。我們不能說这种句子結構不是汉语所固有的；更不能說这种結構会有多种的表意效果。例如：1)沒有飯碗吃飯；2)沒有儿女依靠。这些句子結構的存在是肯定的，它表达“因为没有…所以不能…”的意思也是肯定的。人們既然不会解釋为“飯碗吃”、“儿女依靠”，應該也不会說成“琴师唱戏”。这种非常普通的句式，似可以列作“复杂謂語”的一种，那就是：第一个动词用“有”或“沒有”表示第二个动词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所以第二个动词的前面可以加上“可以”，表示“因而可能”或“因而不可能”。离开整个的句子結構就会失去正确的“主从关系”，因为“沒有琴师唱戏”意思只是“沒有琴师来唱戏”，而“她没有琴师唱戏”的意思則是“她要唱戏而缺少着琴师”，主語的有無会影响謂語的意义的。（楊一可）

164 [原文]协助社制止紅薯腐爛（中国青年报 1956年11月30日第2版新聞标题）[原評]（一）…（二）“协助社”是“协助合作社”的簡称，这里还是用全称比較明白。[討論]这里的簡称用得沒有毛病，即使改用全称，人們还是不知道：是农業合作社呢，还是消費合作社呢？是哪省、哪县、哪乡的合作社呢？…要“明白”只有看正文（正文也可能不够明白）。总之“明白”不能作“詳尽”解。（楊一可）

252 [原文]只有这样，作家的感觉才会敏銳，才会强烈，才能准确地把握住新的人物品質，才能創造新的英雄形象。（蕭殷：《論生活、艺术和真实》51頁）[原評]不同主語的分句，主語是不可承前省略的，这句话中“把握…品質”、“創造…形象”的不是“作家的感觉”而是作家本人。应在第一个“才能…”之前加上“作家”。[討論]原句是一句话，笔者主观上的主語只有一个——“作家”。如果在第一个“才能”之前加上“作家”就变成兩句话，原文的完整性就多少受了损失。把“作家的感觉才会敏銳，才会强烈”改为“作家才会有敏銳而强烈的感觉，”就对了。（楊一可）

257 [原文]鬼子兵死了的、半死不活的都躺在血泊里乱喊乱叫。（辅导員 11期13頁）[原評]死了的还能乱喊乱叫嗎？应改为：“鬼子兵死了的、半死不活的、都躺在血泊里，后者还在乱喊乱叫”。[討論]“后者”这个詞，習慣上应用于論說文，用在記事体里是不够大众化的，比方說：“同學們扫地的、擦玻璃窗的都在忙着幹活，后者…”，听起来显然有点格格不入。改作“伤亡的鬼子兵都躺在血泊里，那半死不活的还在乱喊乱叫”可能正常些。（楊一可）

批判語言學界右派分子聞宥的反動言行和欺詐作風

羅常培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企圖恢復資產階級的社会学和經濟学，是章羅聯盟反動科學綱領的組成部分，是章羅聯盟陰謀篡奪人民政權妄想恢復資產階級制度的前奏曲。中國科學院哲學社会科学部在八月底九月初舉行分組座談會，對一批右派分子如費孝通、吳景超、李景漢、陳達、潘光旦、陳振漢等已經進行了初步的批判。九月十八日起，科學院又繼續舉行了四天半的擴大座談會。在這一次大會上，郭沫若院長和許多位同志的發言更進一步揭發批判，用鐵一般的事實，顛撲不破的道理來折服這些右派分子。不但鑄鼎燃犀，使他們理屈詞窮，原形畢現，並且使參加會議的許多同志也受到很好的社會主義教育。這是科學家們在政治戰綫和思想戰綫上的又一次勝利。我們還必須乘勝追擊，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語言學在社会科学中階級性雖然不及社会学、經濟學那樣強，然而在理論上和应用上也有鮮明的兩條路綫：資產階級所領導的資本主義路綫調查少數民族語言是為幫助反動統治階級實行民族同化或幫助帝國主義推進殖民政權；工人階級所領導的社會主義路綫調查少數民族語言是為幫助各民族創立或改進文字來提高文化，以達到民族實際平等的地位的。哪一條路綫能夠聯繫實際，從廣大人民的利益出發，哪一條路綫只為個人或少數人的名利，並不從各民族的利益着想，這是不待煩言而自解的。本刊所批判的聞宥、秦鳳翔兩個右派分子所走的正是資本主義的語言學路綫。語言學本來是社会科学中的薄弱部門，可是章羅聯盟的骨幹分子費孝通也無孔不入地來這裡勾引和他臭味相投的右派分子，企圖使語言學走向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方向。這不單純是學術上的問題，而是章羅聯盟實行“黨之所好惡之，黨之所惡好之”的政治陰謀。所以，在捍衛馬克思主義社会科学的戰綫上，明辨語言學的大是大非來端正語言學的方向，也和其他科學同樣重要。

語言文字學界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現在已被各方面揭發出來的有聞宥、秦鳳翔、陳夢家、任銘善、林漢達等人。其中聞宥、秦鳳翔兩人都和章羅聯盟的骨幹分子費孝通有不可分的關係。聞宥是費孝通勾引來的中

央民族學院研究部教授，該院民盟支部主任委員；秦鳳翔是雲南民族事務委員會工作人員，九三學社昆明支社的社員。費孝通今年到昆明點火的時候，曾同秦鳳翔在九三學社小組會上和白族歷史調查會上（右派分子龔自知為費孝通在民革召開的）見過兩次面，進行串聯。秦鳳翔本來一貫反黨，反社會主義，破壞民族團結，攪亂民族語文工作，經過費孝通的點火煽動，更加猖獗了。關於秦鳳翔的反動言行，已經雲南民族事務委員會研究室主任繆鸞和同志著文批判（見本刊本期8—12頁），這裡將根據中央民族學院許多同志所揭發的材料（見中央民族學院院刊，27期到38期）和我個人所親見親聞的事實單獨批判聞宥的反動言行和欺詐作風。

聞宥一向披着“學者”外衣，假裝不問政治，兩耳不聞天下事的沉默態度。但是當黨號召整風開始，他就興高采烈地說：“有熱鬧看了！”“自從解放以來，每次運動我們總是當病人，這回我們要當醫生了。”照他自己的話說：“這樣，我就變得年輕了。”“我要由冷瘋子變成熱瘋子了。”並且自動地向人聲言，他可以免費給人寫大字報。於是他一貫的陰賊險狠的狼子野心才昭然若揭，再也掩藏不住了。

他狂妄地反對黨的領導說：“中央民族學院領導不懂業務，不可能办好學校。整風了，也办不好學校，不可能開展研究工作，整不整與科學無關。”“政治和業務無法結合。”他又和王鍾翰、吳文藻共同主張組織民主黨派聯合會，想和黨分庭抗禮，並且說：“組織起來力量大，憑我們這點力量就能把中央民族學院的黨打垮。”他還繼續不斷地散布反蘇、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謠言說：“社會主義搞不好，蘇、匈、波、中是制度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不是希特勒發起的，而是蘇聯斯大林發起的。”“共產主義生活方式與某些文化事業和人的自然性格配合不起來。”“人性的本質與共產主義有衝突。”“馬列主義不能解決原子問題。”他又自己承認“對共產黨沒有感情”。並且存心造謠，破壞民族團結說：“陳毅副總理前次去西藏很不受歡迎，經過交涉才進去的，但不能出拉薩一步。拉薩以外都是武裝。”他這樣信口雌黃，挑撥離間，究竟是何居心呢？他這些謠言究竟從哪裡來的呢？解放八年以來，聞宥既未教書——在川大，校長登門敦請，在中央民族學院，院長登門敦請，

都被他拒絕——也未做什么研究工作，人民拿很高的待遇養活着他，那一點對不起他？他却一心要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這是為什麼？我們只要分析他自己所供出的“你們說帝國主義不好，我倒托在帝國主義卵翼之下”這句話，就可以知道聞有許多的謊言罪行是有思想根源的。他所以“對共產黨沒感情”，正因為對帝國主義分子感情太深，一直感恩圖報，藕斷絲連。

聞有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呢？想當年大家如果趕得上看鴛鴦蝴蝶派的“文學”，見有署名聞野鶴者，即是此公。因為給葉玉森抄稿子，認識了一點古文字，後來貪緣朱家驊的聯襟伍叔儻，進了中山大學。又由於同事潘尊行先生薰陶，稍微剽竊了一點早期西洋傳教士如艾約瑟(Joseph Edkins)、拉古普利(Terrien de Lacouperie)之流的所謂漢學和語言學，從此就逐漸以語言學家自命，腦子里撒下崇拜帝國主義的種子。抗日戰爭以前，貪緣進了燕京大學，更得到巴結帝國主義先遣部隊的機會。可是因為製造宗派，排擠鄭振鐸先生，連他的美國主子也不要他了。抗日戰爭期間，他又由雲南大學轉到成都教會所辦的華西大學的中國文化研究所任所長，於是在帝國主義先遣部隊的卵翼之下，更養成十足的買辦資產階級的洋奴性格。本來不通英文，而幾乎每篇文章都求人譯成英文發表，夢想得到洋主子的垂青，以便微倖造成所謂“國際學者”。在華西大學時，他還和一個來歷不明的德國籍的女人鮑克蘭夫人勾勾搭搭，不知做了些什麼勾當。這個女人從前曾在偽國社黨的头子張君勳在大理所辦的民族文化學院教過書。該院解散後，她還想留在雲南旅行，後來又跑到貴州，直到1950年才被人民驅逐出境。當時她和聞有通信往還，甚為密切，他們究竟做了許多什麼事情，還要叫聞有認真交代。總之，聞有崇拜帝國主義的洋奴性格一直到解放後，還原封沒動。他看了《參考消息》上帝國主義誣蔑我國的話就說：“西方人對我國的評價也有些道理。”1956年國際東方學會在慕尼黑開會，他還自動地請求科學院派他參加，並且私人寫信給翦伯贊先生請求。同一年，他在所作的《台語與漢語》中還說：“我們都知道，關於祖國南方以及印度支那半島一帶的語言的研究，過去都是人家越俎代庖的。首先是大批帝國主義分子初步搜集了材料，然後由一些資產階級學者進行了分析和判斷。台語自然也不是例外。”（着重點是我加的）底下還列舉了許多名字，甚至連這些帝國主義先遣部隊的官銜如主教、神父、牧師、上校之類，都奉命惟謹地恪遵恭錄，不敢妄刪一字。另一方面，他却完全無視了解放後我國民族語文工作者對於少數民族語言的廣泛調查研究，對於傣僳語族的新成就，一味崇拜帝國主義分子和“資產階級的學者”！他卻沒料想到，單以那篇《台語與漢語》而論，先不必問聞有的結論如何，光是材料方面經傅懋勳同志和科學院民族語言研究所的一些同志們核對，已經發現出許多錯誤，不久就

要發表出來足以發其復！聞有應該醒悟，關於祖國南方以及印度支那半島一帶的語言，儘管有帝國主義分子初步搜集的材料，有一些“資產階級學者”進行了分析和判斷，然而不經我們自己審核，那些材料是不可靠的。他竟東鱗西爪地把這些材料摭拾過來妄下結論，那跟在沙漠上蓋房子有什麼差異？何況帝國主義分子調查研究語言的目的和路線跟我們有本質上的不同呢！聞有如果只能追隨帝國主義的後塵，用第二道手材料作研究，即使發表再多一點文章，頂多也只能跟美國的沙佛(Robert Shafer)媲美，只好讓他們彼此隔著太平洋互相吹捧，不會被實事求是的語言學者所重視！對祖國的科學文化事業也不會有什麼補助！

聞有這樣崇拜帝國主義分子，對於中國的學者却一貫抱著“見鬼唱喏，對人磨牙”的態度。他在雲南大學時，聽說熊廸之校長要請姜亮夫先生任教，就唆使別的教授反對，却被他們拒絕了。在華西大學時，先後猜忌迫害呂叔湘、韓儒林、傅懋勳三教授，在抗戰時期生活極不安定的情況下迫使他們離校。總計他過去半生的歷史，他自己以為受帝國主義豢養、壓迫祖國人民的一段是他的黃金時代。他這個奴性已深的買辦從來沒想到祖國人民受了帝國主義多少迫害，遭了帝國主義多少殃，只是從他個人出發，還做著憑借帝國主義勢力，繼續迫害人民的舊夢，所以他才“對共產黨沒感情”，對新中國一切都看不慣。在整風開始他懷著變天思想“由冷瘋子變成熱瘋子”，發出一系列的反動言論，妄想依靠章羅聯盟推翻黨在科學文教界的領導權，把新中國倒退回半封建半殖民的社會，好恢復他買辦資產階級的地位，繼續騎在人民頭上招搖撞騙，欺世盜名！“你們說帝國主義不好，我倒托在帝國主義卵翼之下。”他這喪心病狂的話，卻反映出買辦的奴才本性來！他對西藏造謠，也是破壞民族團結，妄想英帝國主義恢復殖民統治的反動行為。

告訴你，聞有，買辦資產階級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已成了最反動的階級，在六億中國人民正在全力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絕不可能讓車輪倒轉，絕不容許像你們這樣的洋奴、買辦再“得君行道”了！再不容許你在章羅聯盟骨幹分子費孝通的卵翼之下妄想篡奪黨在文化教育事業方面的領導權了！

在學術方面，聞有還有強不知以為知，冒充內行和剽竊別人資料、觀點攘為已有的很嚴重的惡劣作風。據中央民族學院石鍾健同志揭發，聞有曾在華西大學管理博物館多年，院系調整後，華西大學博物館劃歸四川大學，據說他一直沒有办好移交手續。他出版的《銅鼓圖錄》和《四川漢畫選集》兩部著作難免有利用職權盜竊國家文物據為已有的嫌疑。馬學良同志也指出：“聞有來中央民族學院三年，始終不肯在語文系教書。他到研究部也不過想利用研究部的大批材料，便于自私自利地出名賺錢。我請他出來教書，他就和我講條件，

說他不願教書，只願整理材料。”這還是他假公濟私，唯利是圖的一貫作風。

他為掩飾自己在語言學方面的淺陋，始終不肯同人開誠布公地商量討論。1938年我剛到昆明，他正在調查昆明近郊的少數民族語言。他常常找我，問幾個音標的發音，而對他所做的工作却秘而不宣。有一次他到路南調查撒尼語言，回來又問我幾個音值的讀法，我答复後，他並不說自己記音不准，反說可惜他沒有帶假顎去。要知道假顎本來是試驗自己發音的設備，如果要試驗發音人的發音部位，那必須按照發音人的口型定做，絕不能勉強用自己的假顎強安到發音人的真顎上，正如同張三的假牙不能給李四戴一樣。聞有這句假充內行的話完全可以露出他一向強不知以為知的馬脚。還有一次他問傅懋勳同志說：“浪紋計(kymograph)能試驗清濁嗎？”我想現在的研究實習員凡是受過一個月語音訓練的人都可以答复他的問題。浪紋計的功用很多，但是實驗語音的音高(聲調)或清濁(不帶音、帶音)可以算是它的主要功用。這位自封的“中國民族語言研究的第二個人”居然連這些起碼的語音學常識都沒有，那也就愧做語言學的“大師”了。這正和費孝通沒看見過《阿里泰到山里去》那部小說就号召大家向阿里泰學習，可以前後媲美！

還有他給英國駐葡萄牙的委員巴納德(J. T. O. Barnard)《怒族語 Rawang方言教科書》(A Handbook of the Rawang Dialect of the Nung Language, 1934)所作的書評里說：

…第一部分之首，有一“綴字表”(transliteration table)(!)，所定系統粗略，其奇軀如hk-, hky-等，亦未予以適當之說明。以吾人所知言，藏緬族中本有若干語言，在若干破裂聲首前具此一種特具之氣音，且其中之glide每與破裂聲後之母音形成一種諧和。Barnard君所紀者當即此類，而表中未加陳說，讀者必不易知其確值…。(《西南邊疆》，第3期，90—91頁，1938年。)

這位自封的“中國民族語言研究的第一人”既然沒有到現場實地調查，也沒有對滇西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有過全面的、深入的研究，就對於hk, hky等標音符号片面地妄加解釋，實在是穿鑿附會想入非非。據我所知，英美入記錄滇西一帶的沒文字的少數民族語言，有

些部分大概沿用韓森(O. Hanson)所造的景頗文字母，我從前所記景頗、茶山、浪速各種語言的發音人和巴納德所做的怒語詞彙都沿用這種拼法。這套字母有一個特別寫法，就是把代表送氣音的送氣成分h都寫在塞音的前面，例如hp等於[pʰ]，ht等於[tʰ]，hk等於[kʰ]，hky等於[kʰj]之類。韓森當初所以要這麼擬定，照我想，或許因為ph和th等在英文里都代表一定的音值，為避免和這些習慣的讀音牽混，所以把ph顛倒作hp，把th顛倒作ht，這里邊並沒含有什么深奧的音理。若像聞有所說：“藏緬族中本有若干語言，在若干破裂聲首前具此一種特具之氣音，且其中之glide每與破裂聲後之母音形成一種諧和。”那就未免有點兒“像煞有介事”地妄求“甚解”了！我對於景頗、茶山、浪速、怒族等語言雖然沒有得到很多的材料，却都親自調查過，自信對於這一點起碼的審音技術還有相當的把握，假如聞有的推論可以成立，那我對於自己的耳朵就要開始懷疑了。

汶川蘿卜寨羌語的語音、語法、詞彙，全部材料本來都是傅懋勳同志調查的，但是聞有利用買辦的權威把全部材料都鎖在他辦公室的抽屜里，傅懋勳同志為研究上需要想調出來看一看，他卻不准。後來他所發表的《汶川蘿卜寨羌語音系》(《中國文化研究所集刊》，第3卷，頁14—25，1943)，還寫出與傅懋勳合作的字樣，及至他再發表《汶川羌語詞彙簡編(蘿卜寨方言)》(《中國文化研究所集刊》，第10卷，頁115—134，1951)，就公然攘為己有，單獨用聞有的名字發表，不再提起傅懋勳的名字了。這種攘奪剽竊的行為是聞有的一貫作風，汶川蘿卜寨羌語的全部材料至今還把持在聞有手中。現在人民要向他算賬，要他把這部分材料以及他所剽竊的其他材料全部交還人民！

綜合各方面的材料來說，我們可以斷定聞有的言行是反動透頂、卑鄙已極的！在祖國人民正在全心全意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時候，聞有必須徹底毀滅你的買辦資產階級立場，堅決和章羅聯盟及其他反動分子完全斬斷關係，交出人民的學術資料，全盤改變你那剽竊掠奪、欺世盜名的詐騙作風，發揮你僅有的一點力量，在黨的領導下為社會主義科學事業服務，人民才能察其言觀其行地寬恕你，否則你將要自絕於人民！

(上接47頁)

問“這個人邐里邐場不邐里邐場？”這主要是因為A里AB已是四個音節，重迭起來一口氣說九個音節以上很不順口。4)一般形容詞可以受程度副詞的修飾限制，A里AB不能，因為它本身就有“加強語意”的作用，無需再加程度副詞。

從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嵌音重迭式A里AB在南京話中確是發達的。在構詞規律、語法特點等方面，它

與北京話基本上是相同的。這種表達形式具有輕巧靈活的特色，而且是能產的。力山同志說：“這種形式似乎會向增加的方向發展”(《中國語文》創刊號)，這個估計無疑是正確的。同時，筆者還認為：在語言不斷發展的过程中，一部分富有表現力的南京話A里AB應該逐漸被吸收到普通話中去，以使全民族共同語更加豐富多采。

秦鳳翔对待民族語文工作的反动 观点和破坏活动

繆 鸞 和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民族語文工作人員秦鳳翔，一向披着“專家”外衣，散布荒謬言論，破坏民族團結。在大鳴大放中，更向党进行猖狂的进攻。在民族語文這項具体工作上，他就咒罵党的领导“既不懂，又不学”；进而把中央到地方，毛主席到云南民委领导，都說成“外行的外行”；更說“民委领导只懂得‘科学院’的招牌，只懂得‘科学’两个字”。由此而發展到狂妄地說党不配领导科学，說“党和科学家沒有共同的語言”。再进而說党不能建設国家，說“沒有專門知識，任何一項工作都插不上手”。最后一直引出他的結論說：“汉高祖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要共产党赶快下台，讓这班“專家”来领导。他还咒罵“三反”、“肃反”运动是“反革命的斗争”，并公开承認“我当然沒有革命感情”。秦鳳翔一系列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行，經過徹底揭發、批判以后，还不肯低头認罪。作为一个民族工作者，我对此感到無比的憤怒。現在願借此篇幅，把秦鳳翔对待民族語文工作的反动观点和破坏活动作一些揭露。

一 坚持“民族同化”的反动观点

秦鳳翔在民族語文工作中一貫錯誤地主張以汉族語言同化少数民族語言。比如，在他所設計的布都和佤多兩個文字方案及用例的“卷头語”中，标明設計該方案的一个目的是“便于使布都族語言同汉族語言和其他兄弟民族語言互相交流、互相丰富以至于互相溶合”，分別設計出“布都化”和“卡多化”汉詞專用字母及調号表，替他們找出“溶合”的道路。在日常工作中，他也不斷向少数民族幹部說：“我帮助你們創造文字，但是我能够从你們語言中得到什么？”他对少数民族語言就是这样極尽污蔑之能事，說成太簡單、太落后、实在不够用；因而認為只有走所謂“溶合”實質上是“同化”的道路。

他的“同化”思想集中表現在1955年9月10日同苏联顧問謝尔久琴柯教授的談話里面。他一开头就提出“一个民族有几种方言，是先統一語言，还是先發展文化”的問題；他表示要先發展文化。方式是用土話教学，然后使用汉文。紧跟着他又提出，“中国西南各少数民族語言与汉語关系、历史关系，和苏联的西伯利

亞北部的少数民族語言与俄語的关系情形是不一样的，即中国西南各少数民族語言与汉語联系非常密切。因此在处理語言問題上是否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我們知道，苏联在处理这个問題时，是采取帮助各少数民族發展其語言文字的方法的；那末，他所說的“不同的方法”是什么呢？不言而喻，是要采取“同化政策”了！在这里，他用“借詞”的說法来掩飾，但是他所着眼的，乃是如何加强他所謂“联系”，使西南各少数民族語言依附于汉族語言，以达到取消各少数民族語言的目的。

他的陰謀活动也經常是用馬列主义的詞句来掩盖着进行的。他在1953年写的《布都族文字方案及用例》的“卷头語”里面，曾經搬弄斯大林所說“我們主張將來各种民族文化溶合成單一的使用共同語言的文化”，作为他的“溶合”道路的論据。斯大林所說“將來各种民族文化溶合成單一的使用共同語言的文化”，这是真理；但那只是“將來”的事，而且是“世界範圍內”的事。斯大林清楚地告訴我們，这不是一个国内問題，而是一个国际問題，一个社会主义在国际規模获得胜利以后的問題。

秦鳳翔把斯大林在当前阶段所“忽視”、所“不懂”、“沒有提出來”过的任务搬到解放不久的新中国，作为創造少数民族語文的准則，这是什么用意呢？很明显，不过是摘引馬列主义当中“語言融合”的詞句来掩飾他的“語言同化”陰謀而已。据我們了解，秦鳳翔想望的并不是企圖出現一种既非汉語又非任何一种少数民族語言的新語言，而是企圖把汉語“溶合”在各少数民族語言之中；換句話說，也就是把各少数民族語言完全“溶解”在汉語里。可是，这又跟斯大林所說的將來各民族語言的“溶合”有什么共同之点呢？

秦鳳翔可能辯解說，他所主張的乃是在全国範圍內以汉語为各个民族的共同語。的确，这样共同語是必然要出現的。苏联各民族早就广泛地使用俄罗斯語言作了各民族間彼此交际的手段，也就是作为苏联各个民族的共同語。但是要注意的是：第一，苏联各少数民族只称俄罗斯語为“第二母語”，相并而行的还有自己的“母語”；第二，苏联各少数民族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自願地、沒有任何强迫地在各民族現行的語言中挑选俄罗斯語作为共同的語言，当中並沒有所謂“溶合”

的过程；第三，苏联各少数民族热爱和向往俄罗斯語的心情，是在摆脱民族压迫，取消强迫同化，本民族語文得到独立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结束了民族压迫制度，各族之间的关系以至各族語文的关系，都有了根本的改变——由压迫同化改变为平等发展。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各少数民族对于汉族語文的热爱和向往，將和苏联各少数民族对待俄語一样，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完全出于少数民族的衷心挑选，絕不容許汉族幹部包办代制方案，强立法規，更不容許設計什么“溶合”的道路。1953年中央規定創造少数民族語文的七項原則中，貫串着一个精神，就是“自願自擇”；并且把它特別提出来，作为民族語文工作的守則。而秦鳳翔却經常說，“少数民族的事，不包办不行。”

秦鳳翔一再強調少数民族語言的落后性，認為这些語言只适于表达最基本、最起碼的真理，不可能用来發展真正的文化。因而为少数民族創制文字，只能用来作为学习汉語文的“拐棍”，或者移植大量的汉語来充实它，丰富它。

我們都知道，解放以前，由于历代的民族压迫，少数民族的經濟、政治与文化得不到發展，他們長期被迫处于甚为低下的水平。各少数民族因为缺乏文字与本民族文献，缺乏用母語授課的学校，才相对地造成了他們語言的落后性。不錯，某些少数民族語言的确缺少表达科学技术、哲学和政治概念的詞彙；但是，即使在民族压迫的情况下，这些語言同样足以用来創作人民口头文学，同样流傳有許多表現本民族人民智慧的故事、歌謠、格言和俗語，这难道是可以抹杀的么？解放以后，消灭了民族压迫，在党和政府帮助少数民族發展其經濟、政治与文化的新的条件下，这种語言的相对落后性自然地就漸趋消灭了。

在發展少数民族語言时，是否需要借用外来的詞彙呢？不消說，这肯定是要的。对此，我們不妨先看一看苏联的情况。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術語制訂特別委员会創制新術語和科学名詞的主要根源，一方面是每一民族母語的富藏和俄語中的術語；另一方面是通过俄語而吸收进来的国际術語。他們在制定術語的工作中，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本民族語言的富藏。有时候在某一語言中有可以适当地表現出某一科学概念的本質的詞，而在另外的一种語言中常常是無法确切地傳達那一術語所表現的概念的本質。在这样的情形下，必須大胆地把已經采用到俄語中的術語輸入。但是有些術語是可以比較恰当地翻譯的，就可以采取翻譯的办法，使群众易于接受。

秦鳳翔是怎样对待这个問題呢？首先他反对調查少数民族的詞彙，也就是反对發掘少数民族語言的富藏；其次他对一兩個本民族語文干部所認為較难翻譯的詞，反对再去和群众商量，就直接借用汉語詞彙。他

在和謝尔久琴柯顧問的談話中就說过：“我看过謝教授的文章，其中提到吸收本民族詞彙时，有时还要向老年人調查。我認為就可以直接用汉語的普通話，如‘蝴蝶’。”像“蝴蝶”之类的基本詞，都要“直接用汉語的普通話”，更明显看出他的“語言溶合”的實質；其最后目的，不过是把各少数民族語言完全“溶解”在汉語中罢了！

各少数民族人民在和汉族人民長期交往中，事实上早就或多或少地吸收了一些汉語詞彙，作为本民族語言的有机組成部分。秦鳳翔仅仅抓住这一点，就下結論說，西南各少数民族語言和汉語非常接近；甚至認為白族語是“汉語的特殊方言”（与苏联顧問的談話）；因而想取消“白族”之为單一民族。^①秦在这些方面的挑撥也是很惡毒的。

斯大林說組成“語言”的基础是“基本詞彙和文法構造”；秦鳳翔在进行語言比較时，为什么不去抓根本問題——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却去抓“借用詞”呢？这是因为他根本反对这样的做法。即如他在和謝尔久琴柯顧問的談話中，強調彝族和哈尼族各个支系甚至不同村寨的“語言”（其实是方言或土話）的不同，說“彝語大体上語言类别是一样的，文法一样，声音系統也差不多，但詞彙差別很大。以昆明的西山和大板桥来講，他們就不能通話，主要是詞彙差別大……”那末怎样办呢？他說：“可是他們有一个‘共同語’——就是汉語”！可以明显看出，他認為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共同語”早就形成，用不着再去比較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干脆把它們統一起来好了。更可以看出：他的“比較方法”是在为他所說的“共同語”找寻根据，以遂行其“民族同化”的陰謀！

1953年語文工作會議上，有人批評秦鳳翔是承繼了吳稚暉的“道統”（他和吳稚暉有几十年的历史淵源），這句話是正确的。吳稚暉曾經提倡过“注音符号”，秦鳳翔就夢想改头換面地把少数民族的文字当做学习汉語文的“注音符号”；他認為少数民族文字只是具有“拐棍的作用”。他在所写《論云南拉祜族文字改革問題》一文中說：“为了需要学习直接閱讀汉文書籍，为了需要在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會場上說道地的全国

① 与此相类，秦鳳翔从“語言”一个条件出發，也否認“回族”之为單一民族，認為他們的共同語言是“汉語”，應該改称为“回教”。另一面，他又从“語言”一个条件出發，否認“景頗”、“載瓦”之为同一民族。景頗族中这两个支派的語言确有很大差异，但在他們的历史傳說中，有着同一的祖先，特别是目前他們又生活在一个地区甚至杂居在同一村寨里，有着亲密的交往和婚姻联系；長期以来他們都以“同屬一族”的民族自覺創造着自己的历史；解放后又以“同屬一族”的民族成分与傣族等共同建立了“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为什么硬要把它們分割开？

共同語，留着這些字母（指幾個拉祜族音位系統中所無的字母）作為學習漢語、漢文的拐棍兒或者正音符號使用，也是挺有好處的。”

他反對各少數民族長久使用自己的語文，他認為那是“小集團的語文”，“出了那個小圈子就不能用”（和蘇聯顧問的談話）。因而作為“拐棍”來說，過了河就必然要丟的！

可以看出：他是如何忠貞地承繼着國民黨同化以至取消少數民族語言的“道統”，在人民事業中來進行破壞活動！他割裂馬列主義的詞句來反對馬列主義，他鑽進民族工作的崗位來破壞民族工作。照他這樣做，會造成什麼樣的政治後果呢？斯大林曾經指出：“同化政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庫中絕對不容許有的，因為它是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是有害的政策。”（見《民族問題和列寧主義》）難道還不明顯么？

二 製造“民族分裂”的罪惡陰謀

秦鳳翔主張“民族同化”的另一面，就是製造“民族分裂”。

他一貫強調同一民族中不同支系之間甚至不同村寨之間土話、次土話的差別，把它說成是“兄弟民族語文問題中的主要矛盾”。他向謝爾久琴柯顧問提出：“一個民族有好幾種方言，而且有特殊差別，矛盾很大，我們是先統一語言呢？還是先着重提高文化？還是兩件事同時作？”這個問題他早就作出了事實的答案，就是為哈尼族的三個支系布都、碧約、卡多分別設計了三套文字方案，也早就作出了書面的答案，他在《論雲南拉祜族文字改革問題》中主張：“說到要解決兄弟民族語文問題中的主要矛盾，無非是各自造出一套字母來，使向來只能用口說的語言，現在變得也能用手寫了，讓他好用民族的形式發展馬列主義內容的文化罷了！”

就雲南來看，由於歷史上的民族壓迫和民族內部的分化遷徙，各少數民族形成大散小聚、交錯雜處的分佈狀態；因而各少數民族內部不僅支系繁多，方言、土語也是歧出繁多。這是雲南少數民族語言的歷史實際。但在新的條件下，——有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幫助，廢除了民族壓迫，得到了民族解放，各自從其不同的發展階段走向社會主義，或早或遲地都要形成現代民族，這就為原來的民族語、部落語、部族語開辟了一個廣闊的發展空間。黨的民族語文政策，不僅要讓它們自由發展，還要採取某些措施，促進這種發展。比如說，在設計文字方案前，一定要進行普遍的調查和深入細緻的比較研究，選擇基礎方言和標準音，然後再歸納音位系統創制文字。目的是由分歧導向統一。某些少數民族，由於長期分散隔離形成了懸殊甚大的方言，或在分化、聯合的過程中形成了不同的語言，由實際出發，目前必須設計幾個文字方案，但也必須照顧到將來的發展（如儘可能統一字母的形式），儘量避免留下人為

的障礙。

秦鳳翔一貫反對調查研究，抓住斯大林說的“只有社會的語言，沒有個人的語言”一句話作為擋箭牌，找一兩個民族幹部就關起房門來“創制”文字。這樣做，不僅否定了馬列主義的“調查研究”的科學方法，更重要的是否定了語言學的主要任務——研究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也就是有意抹殺語言隨着社會發展的客觀事實。

他把少數民族語言說成是靜止不動的，因而提出方言、土語的差別是民族語文問題中的“主要矛盾”；同時用盡全力來找這個“主要矛盾”。所用的方法則是別具心肝的方法。他一貫反對“求同”，特別是從語言的基礎——語法構造、基本詞彙等方面去求同。他一貫主張“求異”，儘管是極細微、極枝節的差異。他向謝爾久琴柯顧問說：“我和顧問的意見還不一致。如在統計方法上就是不一致的。如用甲法統計則沒有不同，而用乙法則即顯示其不同。”所謂“乙法”，就是專門“求異”的方法。這不明明是有意製造民族分裂么？

秦鳳翔既然反對調查研究，也從來沒有做過調查研究，那末，他的“統計數字”是從那裡得來的呢？現在且看兩個活生生的例子：哈尼族碧約支系的語文幹部胡金華同志提到他們叫“南瓜”和卡多支系不一樣，他趕快打開筆記本記下來：就憑這個唯一的資本到處宣揚“碧約話和卡多話有85%不相同”。例子呢？“譬如南瓜”！他又向謝爾久琴柯顧問大談儂、沙話的差別，說“有40%不相同”。顧問向他要材料，他就捏造已經交給科學院來的語文幹部常紘恩同志。會後有人去向常要，恰好他也在坐；常質問他，他說：“材料嗎？還在梁爾昌（儂人、語文幹部）的肚子裡！”以“專家”自居的秦鳳翔，不擇手段地編造這些“百分比”，究竟為什麼？難道不是為了“証實”這個“主要矛盾”，以便“各自造出一套字母來”，從而達到分裂各個少數民族的罪惡陰謀么？

在他設計“布都文字方案”時，王爾松同志曾說：“我們自稱是‘豪尼’，與紅河方面自稱‘哈尼’只是稍微的音變而已。別族叫我們做‘布都’。”他立刻阻止王同志不要再說“豪尼”的自稱，“說了出去，布都族的文字方案就難得批准了”！又在1953年12月的語文工作會議上，馬國柱同志根據自己的家譜和老人的傳說，說明哈尼族中布都与多塔兩個支系分支並不遠，又和元江的撥比（布孔）相接近。秦鳳翔打斷他的話說，“背家譜王爾松可以倒數到幾十代，以後再研究。”他就是用這麼卑鄙的手段，處心積慮製造民族分裂。

他在《布都族文字方案及用例》的“卷頭語”中公然提出這樣的口號：“反對以一個地區為標準而使別個地區對它服從的不平等辦法”！這清楚地說明秦鳳翔的“是非”標準恰和我們兩樣：企圖用漢族的語文去同化少數民族的語文，以至取消少數民族的語文，不叫“不平等”；隨着社會的發展，“民族語言”的自然形成倒叫

做“不平等”，这是甚么样的邏輯？

“統治”与“压迫”是旧世界不同民族的不同語言之間的事实。例如土耳其的同化主义者，曾在几百年中努力伤害、破坏和消灭巴尔幹各族人民的語言。在这个时期中，巴尔幹各族人民語言的詞彙發生了重大的变化，接受了不少土耳其的詞和語，有过“匯合”，也有过“分离”。可是由于它們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彙的穩固性，还是坚持下来和活下来了。

至于同族内部的語言，在社会主义革命前的历史时期中，从氏族語言到民族語言，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發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后，在無产階級及其先鋒队的领导下，各族語言这样的發展，更是具有嶄新的、进步的意义。

莫尔狄諾夫叙述苏联各民族語言的發展情况說：“苏联各民族語言的發展，就表現在其詞彙之获得补充上，表現在許多詞和語的意思的改变上，表現在人为的同行語和不需要的外來語的清洗上。但是这些語言的語法構造却完全保存下来了（語言的特点）。这些語言的發展，是按着他們的內在規律进行的。”他还說：“苏联各民族語言的發展，也表現在过去方言很多的語言（塔什克語、布路特語、莫尔达維亞語、馬里語等）的逐漸的、不断的統一上面。虽然这个过程尚不能認為是已經完成了。”（見《論苏联社会主义各民族語言的發展》）

方言的統一，当然不可能一下就完成，某些过渡的办法也是需要的。謝尔久琴柯顧問曾向秦鳳翔說：“如果靠語言方言差別很大，也可以造兩種文字，但还是需要具体材料。如只是給范围很小的土語造文字，是不合适的。”顧問重复說：“我們是不能給每一种土語或每一个村子里的話来造文字的。苏联达克斯坦有37种話，而我們只造了8种文字。因为他們之間有很多是支派、親屬关系。”顧問的話早就戳穿了秦鳳翔制造民族分裂的陰謀。

可以看出：秦鳳翔坚持“民族同化”和制造“民族分裂”，乃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为了取消少数民族語言，才配备給各种方言土話一根“拐棍”。其必然結果，是使同族語中的方言、土話定型化，造成四分五裂的状态，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民族語言的形成。这是他的反动性的另一个方面。

三 党能不能领导民族語文工作

秦鳳翔瘋狂地叫囂“外行”不能領導“內行”，要党赶快下台，讓“專家”来領導。我們認為，在民族語文工作上，党的領導同志可能不懂得音標、調号、記音方法之类的專業知識，但是，他們完全能够正确地掌握党对民族語文工作的政策和方向。因为沒有党的領導，民族語文工作就会迷失方向。

党和政府怎样領導語文工作及其他科学事業呢？

周总理在最近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曾指出：“一方面是学术領導，另一方面是政治思想上和行政上的領導”。并且說：“对于学术問題，我們从来主張用行政命令进行干涉，我們的領導方針是‘百家爭鳴’，就是通过科学界的自由爭論和客觀實踐来解决学术問題。对于科学工作中的政治思想、方針、政策、計劃等方面，更需要党的領導。”

党在民族語文工作方面的指导思想是，必須摆正基础与上層建筑的关系位置。作为文化工作看待的民族語文工作，一方面，必須为經濟、政治服务，为改造社会服务；另一方面，只有做好民族地区的經濟、政治工作，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改造，扫除各民族社会發展的根本障碍后，民族語文工作以至民族文化工作才有所依托，才有發展的空间。与此同时，党从来并不是忽視，而是非常重視文化对于經濟、政治發展的反作用。毛主席就教导我們：“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响和作用于一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經濟。”（見《新民主主义論》）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是辯証地看待和处理有关基础与上層建筑的問題的。就云南來說，党和政府早就注意到民族語文以至民族文化的工作。从1952年起，就在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几个自治州（区）先后建立了民族語文研究機構。中国科学院也派有工作組，共同进行調查、研究和設計文字方案等工作。1956年，中央又派民族語文工作第三工作队全隊及第一、二、四队的部分隊員共約百余人到云南，从而大大地加强了語文工作的力量。截至目前，已經帮助傣、景頗、拉祜、哈尼、傈僳、佤、納西等七个民族創制和改进了十种文字；連同四川、貴州方面設計的彝文和苗文，也在云南推行的，共有九个民族的十三种文字。在工作中，培养了一批各民族的語文干部；在昆明和几个民族地区，也陸續建立了編譯出版機構，已經出版六种文字的小学課本。又在云南民族学院开办了六个少数民族語文班。1956年11月，云南省少数民族語文指导工作委员会成立，更进一步加强了領導。不可能想像，在有民族压迫的旧中国以及帝国主义国家里，敢于进行这样的工作，更不必說肯于投放这样大的力量。

今天的民族語文工作成就都是旧中国所夢想不到的，而秦鳳翔之流，公然想抹杀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这些巨大成績，污蔑党忽視民族文化，不要民族文化；甚至說党“把它看作是可有可無之事”。其真正目的，不外是企圖用資產階級的“文化至上論”来改变党的指导思想，从而陰謀取消社会改造。他污蔑党的指导思想是“先富后教”，其实是想把他的“先教后富”的反动思想偷偷搬出来。这跟他在做国民党党官时所說“以文化力量推动經濟，再合文化与經濟之力量以改善政治”的謬論，是一脉相承的；也跟曾經到云南来撈了一把和挑了一下的費孝通所主張的“在佤山区要首先

發展文化”是互相呼应的。他們的共同战略,是以少数民族在文化方面的要求为借口,夸大文化的作用,要挟党把文化工作摆到首要地位来首先进行;从而想制造混乱,打乱党的工作步骤,用文化工作来代替以至取消社会改造的工作。这是他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最为隐蔽的一手,也是十分毒辣的一手。我們說秦鳳翔所謂的“先富后教”是对党的污蔑,就是因为它同样是違反馬列主义的。党在进行社会改造、發展生产的全部工作中,从未放下宣傳教育的武器,从未放下民族文化的工作;但是党的宣傳教育是“有所为而为”的,即一切为了社会主义。这同右派分子所叫囂的有根本的區別。

党在民族語文工作上的方針是“慎重穩进”,因为創制和改进民族文字是發展民族文化的百年大計,并且工作本身也常常会牽涉到民族之間和民族內部的关系,牽涉到一些历史習慣問題。以后更提出“采取比过去更为積極,但仍应是穩步前进的方針”。云南民族情况复杂,所有民族工作都是遵照中央所指示的“慎重穩进”方針来进行的,民族語文工作怎么能够例外。在这方面,別有用心的秦鳳翔又是什么态度呢?这可以从他所写的《論云南拉祜族文字改革問題》一文中看出来。他把“慎重穩进”的方針称之为“禍祟”;因而大声疾呼:“我們一天不把这些祟捉掉,兄弟民族的語文事業怕是一天不会按着他应有的速度进行下去的!”在这里,他不仅有“言”,而且先之以“行”:1952年,他关起房門粗制濫造地为哈尼族的三个支派“設計”了三个方案,就煽动少数民族語文幹部去要挟领导立刻推行。并且教唆他們說:“领导不答应,就用民族政策駁他;再不答应,就写信到毛主席那里去告。你們是少数民族,你們說話硬。”1953年,正是边疆民族关系和階級关系交織在一起,对敌斗争很尖銳,党和政府正在集中力量疏通民族关系的时候,他又和語文組幹部李曉邨搞了一个所謂“拉祜文修改方案”。他对李曉邨說:“共产党最势利,只要你有群众基础,他們自然贊助你;要是你没有群众基础,他再也不理你。你在拉祜族中的声望很高,你可以大叫,別人就要搗你的蛋也搗不了。”(据李曉邨揭發)在他点火煽动下,就制造出一个拉祜族代表請願运动,造成極严重的政治后果。其目的不仅挑撥少数民族和党的关系,而是通过这些办法来实现他的以文化工作来取消社会改造的罪惡陰謀。

党在民族語文工作方面的根本政策是和大民族主义者截然相反的。这就是“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

己語言文字的自由”。我們要从兩方面来体会这条根本政策:一是“各民族都有使用自己語言文字的自由”,这在民族压迫时代是絕不容許的。民族压迫时代的大民族統治者,对少数民族語文采取“同化政策”“消灭政策”。旧中国如此,俄国沙皇时代也是如此。一是“各民族都有發展自己語言文字的自由”。我們認為,这就是根据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获得民族解放、民族平等的新的条件下,自由地發展,逐步成为統一的、現代民族的語言。然而秦鳳翔竟主張“民族同化”,制造民族分裂;这难道不是从最根本的地方破坏了規定在宪法中的民族語文政策么?

中共云南省委在云南民族語文工作方面所确定的工作步骤是:先边疆,后内地;先多数,后少数。秦鳳翔对此也进行恶毒的攻击。在反击右派运动中,他还說:“为什么不先給内地彝族創制文字(事实上四川創制的彝文已經在云南的一个彝語方言区推行;其余方言区,正在进行調研工作),而須先給边疆傣族改进文字?”“为什么不同时給各少数民族創制文字?”进而污蔑党的民族政策說,“講的是平等,实际是不平等。”我們認為,党在进行民族語文工作时所以要有步骤、有先后,并不仅仅由于主观力量有限制,更重要的是为了与当前中心工作相配合。党根据各个不同民族的特点和需要,根据各个时期工作發展情况,根据主、客观条件,随时都在作通盤考虑、全面规划,因而在进行中就不能沒有先后緩急之分。这完全是从各族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長远利益出發的,根本牽涉不到“平等”“不平等”的問題。秦鳳翔公然用步骤先后來攻击党的民族語文工作,甚至扩大到攻击党的民族平等政策,把自己裝扮得好像比共产党还关心少数民族。秦鳳翔的真正目的何在呢?說起來不外是:妄想挑撥少数民族和党的血肉关系,更主要的是要求党撤开時間、地点、条件,在各民族地区,采取同一措施、同样步骤,以等同速度全面开展各項工作。如果这样做起来,其結果必然是“天下大乱”,右派分子便妄想借此实现資产階級复辟的陰謀。

最后,应当指出,党对民族語文工作,同对其他任何工作一样,不仅能够领导,而且领导得很好。党早就看穿秦鳳翔的这些陰謀,为了保卫各族人民的共同事業,坚决反对他的荒謬說法和做法。而他一直污蔑党糟蹋了“專家”,把他这种人“投閑置散”。他想篡夺民族語文工作领导权并进一步破坏民族团结的陰謀,难道不是很明显么?

(上接19頁)

文字改革並沒有因为右派分子的惡意进攻而受到阻碍,正相反,右派分子的叫囂反而引起了人們对文字改革的注意。贊成文字改革的人更多了,文字改革將在一陣歪風之后更加順利更加穩步地进行下去。当然,文字改革工作方面还有許多問題需要討論、研究,

还有許多道理需要向人民进行細致的耐心的宣傳和解釋;但是首要的是分清楚大是大非,击破右派分子的歪曲事实、煽風点火的陰謀,揭露右派分子站在反动立場上所發表的反馬列主义的謬論。这就是我們文字改革工作者当前的中心任务。

右派分子陈夢家是“学者”嗎？

唐 蘭

在大鳴大放期間，向党进行惡毒的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陈夢家是“学者”嗎？不是的。他是“冒牌学者”，实际上是一个十分热中，不擇手段地拼命向上爬的野心家，是一个善于投机取巧，唯利是圖的市儈，是一个不懂裝懂，假充內行，欺世盜名的騙子。

正如他自己所說，他在“抗战以后，到1944年依靠了以新月派为主的种种社会关系，很快地往上爬到了教授”。在抗日战争最危急的关头，“想在国际上成名，到美国过美国式的生活，無耻地接受世界上最大的剝削家罗克菲勒的津贴，为他們服务。以研究銅器为名，实际上完全丧失了民族立場，贊助了美国豪商、軍人、官僚劫夺我国的銅器”。1947年到清华，和商人們拉交情，博取在古董商人間的威信，“从流氓詩人变为市儈学者”。他还妄想“把自己成为国际权威”。只是由于北京解放了，“这些狂妄的野心和夢想”不得不結束，但他說“只是暂时掩住而已”。因此，他对党仇視仇恨在心，“抱着有一天，…有东山再起之望”。在党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后，他認為这样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可以“东山再起”了，就發瘋似地到处發言、写文章、拉攏、挑撥、点火、放毒箭，从各个方面来向党进攻。

由于他过去的資產階級腐化生活，由于三反中他是大老虎，所以在思想改造时不得不被迫自認為“流氓詩人、市儈学者”。但他抱着市儈不妨市儈，学者我自为之的态度，抱着“东山再起的希望”，他总还認為自己有一批資本，共产党总有一天还需要重視他。別人学馬列主义，他可以不需要，他有“旧學問”。他敢于吹噓有七十万字的大書，“并不違反馬列主义的精神”。所以他敢于反党、反馬列主义。

他自我吹噓的“学术上的成就”是什么呢？据說有“旧學問”，是“文字学、金石学、古器物学、历史事实考証、地理考証等等”。他說，他“不但以一种專家自居，而以种种專家自居”，他“裝出样样都懂，样样都管，把自己裝成万能的样子”。

我們来看一看这个野心家、市儈和騙子所自我吹噓的“旧學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933年前后的一次宴会上，聞一多先生告訴我，有个青年陈夢家敢于說“夏朝就是商朝，夏禹就是商湯”，將要訪我。隔几天，这青年来了，長頭髮，神气傲慢。留下很厚一部稿子，內容荒謬，都是忽發奇想，懸

空立說。这是我認識他的开始。不久，他入燕京大学研究院跟容庚先生学金文。

就是这样，这个在伪中央大学念过法律系，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學習过，准备当牧师，而又当过很反动的新月派青年詩人，写过極其丑惡的黃色小說，在中学里教書被轟跑的陈夢家，找着了一条爭名爭利的終南捷徑，所謂“从金石学出發的”这块招牌就很容易地挂上了。

那时，赵孟頫壺剛發現，我根据馬衡先生的意見，曾写过一篇跋，銘文大意是赵孟和邾王（即吳王夫差）在黃池之会相見时，邾王賞給赵孟的僕介一些銅，这个僕介用銅来做了祭器。陈夢家想借这个題目出一下風头，但可惜連赵孟是赵鞅都不知道，他还以为晋国只有一个赵孟就是赵盾来和我爭論，是我把《左傳》翻給他看，他才認輸了。但他终于写文章攻击我不懂文法，他十分可笑地把“邾王”又叫做“禹邾王”；把狀詞“于”字当做“在”字用；把僕介的介解釋成賞賜；把應該讀为賞錫意义的“惕”字解釋为后代“冰敬、炭敬”的“敬”。因之，他把吳王夫差賞給晋国人銅，变成了赵孟送給吳王銅。这都是他所謂文法。他就是靠后台有人支持，發表了这一类荒謬文章而起家的。后来在昆明，我讀到《战国策》把“黃池之会”称为“黃池之遇”，証明馬衡先生的意見完全正确，又写了一篇文章，痛駁他的錯誤，还特別讀給他听，他只好瞠目結舌，不作一声。

七七事变后，他正在南方，伪教育部在長沙設立临时大学，后来改为西南联合大学，他趁这个机会，夤緣到那里当教員，講文字学，扶搖直上，不过五年，当上教授，因此，他又挂上文字学家的牌子。他常常攤出《說文》就講，可是自己还不懂得；常常弄錯，还是大言不慚。他从欧洲回来后，曾告訴我，他跟一位外国汉学家談到于省吾先生，把“省”讀做“省政府”的“省”，对方諷他說“恐怕是‘吾日三省吾身’的‘省’吧”，他認為这位汉学家真高明，实际上是自称文字学家的陈夢家太不高明，把丑出到国外去了。

一直到1956年，他在《考古学报》第一期的《西周銅器断代》和第二期的《寿县蔡侯墓銅器》兩篇文章里再三提出他的新發見，据說“‘奠器’和最常見的‘奠彝’，不是尊彝而是奠祭时所用之器”。可惜得很，根据《說文》，这个字只是“尊”字，从宋朝以来研究銅器的人成百成千，都讀《說文》，所以不会弄錯，只有自称为金

石学家、文字学家的陈夢家，不但沒有讀《說文》，連翻也不翻一下，連普通常識都沒有，就胡謔起來了。他認為別人都不懂，只有他懂，敢于著書立說，貽誤學人。我在1956年故宮博物院銅器專門會議上對他批評過，他當時面紅耳赤，承認錯了，但1957年考古研究所出版的壽縣蔡侯墓出土遺物里，還是原封不動，他難道還有一絲一毫的學者味嗎？

在他盡力夸張的七十萬字大書里，單是“甲骨文字和漢字的構造”，就寫了一萬字。他基本上利用我在《中國文字學》里所主張的象形、象意和形聲的三書說，但由於他一定要高出一籌，所以把象形象意合并起來，硬添上一種“假借字”。他不懂得文字學研究的對象是文字的形体，而假借只是應用文字的一種方法，所以許慎的定義就是“本無其字，依聲托事”，既然“本無其字”，怎麼又出來一種假借字呢？文字學者而沒有這樣的常識，不懂得一般所謂“假借字”只是一種習慣語，例如說“其”字本來是畚箕，現在當作代詞，是“假借字”，這是一種說法；但如果在文字學上的分類，卻另是一事，“其”字還是“象形字”。從象形借來，本身還是象形，從形聲借來，本身還是形聲，決不能因為被假借了，就變成另外一種文字。顯然，這樣的著作，其東拉西扯，加入了很多與題無關的東西，目的只在拼命弄筆，欺世盜名和拉長稿子多得稿費而已。

在昆明時，偽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手上有百多張被盜竊而流散在國外的中國銅器的照片，原物在歐美博物館或私人收藏，甚至是古董鋪里的，既搞不清原物情況，甚至不知道有什麼銘文，更不知道器的真假，並且在流散國外的銅器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本沒有什麼科學價值，但陳夢家卻如獲奇寶；編了《海外中國銅器圖錄》，寫了《中國銅器概述》，作為他自稱古器物學家的資本。概述一開始就極其可笑地說秦以前是銅器時代，“秦以後已有詳備可據的紀年史，是為史書時代”，照他這樣說法，秦以前的《春秋》和《竹書紀年》就都不是編年史了。他又說：“最早之刊本為宋，最早之手寫本為唐，最早之竹簡為漢”，只要稍稍懂一些中國文化史就都可以知道這裡沒有一句是說對了的。他這樣淺薄無知是人們所想像不到的。那時，郭寶鈞先生有一本《中國銅器學》的稿子在他那裡，他盡量利用了，寫信給郭先生卻說“很多地方，所見略同”，既然“所見相同”，當然不好算他“抄”或“偷”了，在他的書里，始終沒有提到郭先生的著作。

事實證明，過了十六七年，他還是那樣淺薄無知。七十萬字的大書里有“飲食器具”一節，他說：“鼎、煮肉”，就不知道鼎可以煮魚、煮鳥、煮菜湯。說：“鬲，蒸谷類的煮水部分”，請問口徑不過五市寸、容水不過一公升的銅鬲能蒸多少飯呢？說“甗下部是鬲，上部是甑”。又在“殷代社會的歷史文化”的一節里說：“由於甗之有甑，可見飯是蒸而食之的。由於銅器中甗少而甑

更少，可見當時實用的甑，多是竹木制的”。自稱為古器物學家而不懂得商代的甗是從陶器演化來的，是一個整體，春秋以後才分成上下兩截，竟不知道用了甗，就根本不需要甑。自稱為文字學家竟不懂得“甑”字從瓦，可以看出古代一般都用瓦制，殷代陶甗也有發現。這不都是怪事嗎？

在昆明時，陳夢家曾問我如何鑒定銅器的真假。我于此道本非行家，那時又無實物，不知為不知，只好不答复。可是他一到美國，就挂牌鑒定銅器，和奸商流氓勾結在一起，充起專家來了。其實他的鑒定，始終是直接或間接地從古董商人學的，所以對可以盜賣給外國人的文物最有興趣，而在故宮博物院所藏著名重器亞醜方尊和方彝的真假引起爭論時，就認真作假，要讓古董商人作最後裁定，才不再懷疑。相反地，一直到最近，古董商人的一个宋仿牺尊，放在他書桌前几个月，却始終認為是古器。

在他剛回國時，買了大批假黑陶，什襲而藏之。有一次拿給我看，並很神秘地告訴我，國內無人認識，外國博物館有很多，這是他的“寶貝”。一直到三反時，經手商人自己坦白，他們矇了許多外國奸商，也矇了陳夢家。由於古代木器在國外有市場，陳夢家就經常在魯班館等地搜羅明代傢具，擺了一屋子，常常約人看，就自封為木器專家。其實所謂明代木器，大都經過改裝或拼湊，只有所用材料真正是明代的。

總之，陳夢家的所謂“鑒定”，只是聽到一些經驗，學到一些皮毛，自己不加思考，不加分析，所以始終兩眼漆黑。在他的七十萬字的大書里，甚至把五十多年前商人們賣給英帝國主義傳教徒庫林的一塊假刻卜辭，當作彼他所發現的寶物，據說是殷朝一個叫做“兒”的人的家譜，是十分重要的史料，于是把拓本放到圖版里，還要題上“考古研究所藏”。如果真是這樣，收藏這塊假卜辭原骨的大英博物院真要喜出望外了。可惜這塊真骨上所刻的假字，筆畫笨拙牽強，早就為大家所論定。單是這個“兒”字，在上部白形里多了一個橫畫，無論甲骨金文以至小篆，從沒有這個寫法，一望而知是無知杜造。自認為“實事求是”的大書，僅僅在這一件事上，就使讀者不辨“是”“非”，貽害無窮。抉擇材料真假，是考古學上最基本的問題，我們不可能照樣寫七十萬字來一一批判陳夢家的七十萬字大書，而且也絲毫沒有必要，因為只就這一塊假卜辭為例，就可以看出這本大書在學術上究竟有沒有價值了。

據陳夢家說，他還懂得歷史事實考證、地理考證等，可惜在地理考證方面，我們只看見過他抄襲了黃盛璋同志的材料所寫的有关王城問題，此外表現不多。就是在歷史事實考證方面，他有过什麼成就呢？他自己夸耀的“北京解放以後，曾不顧眾議之所非，又在清華大學講過一期”的《尚書通論》講稿，是他在十幾年前編的，內容都是一些陳芝麻爛谷子。例如東晉的偽古文

尙書從宋以來經過很多學者討論過，只消用几百字總結一下，附一個參考書目就行了，他竟拉扯了一萬多字。“若”字有“如此”的意義，古書和金文常見到“王若曰”，那就是“王這樣說”，是史官記錄的話，所以也可以說，“周公若曰”，“微子若曰”。陳夢家連《助字辨略》這類書都沒有讀過，硬要把“王若曰”限定為史官代王宣布命令的話，甚至於根據這類推斷尙書盤庚微子等篇是戰國時人所作，又寫了一萬多字。這些塵羹腐飯他自己盡可“頗自珍愛”，却勉強要人民大眾也當作美味，這不是在白日做夢嗎？

陳夢家還自認為年代學家，他只根據《史記集解》所引的一條竹書紀年，由武王伐紂到幽王共二百五十七年，他既不找別的史料，也不研究一下現在可以知道的西周各王的積年，也不想一下書本上的數目字容易寫錯（像竹書紀年盤庚至殷亡的年數就有錯字），就盲目地決定周武王伐紂是公元前1027年。到了我把漢代所傳殷曆的遺說整理出來以後，他無耻地在《殷虛卜辭綜述》里利用這些材料追改一番，歪曲材料來附合他的謬論。更無耻地在篇末特別介紹他論西周年代的幾種寫作，把我整理出來的殷曆一字不提。

如上所說，陳夢家既不是這個家，也不是那個家，只能稱為空頭專家。腹中空空無所有，到處開笑話，却要神氣活現地裝成無所不知的“學者”。他的一套本領是別人研究什麼，他也立刻研究什麼；別人有了文章，他就可以略略改頭換面，間或添上一些，只要靈機一動就可以寫出來的胡說八道，就成為動輒萬言、又臭又長的文章。他善于變相抄襲，在昆明時，他代偽中央日報編一個副刊，叫做“讀書”，拉我寫文章，我寫了一篇《未有諡法以前的易名制度》，他在《殷虛卜辭綜述》里“史書上的商王廟號”一節就把我的意見作為他的意見。這一部大書里這一類的抄襲是數不勝數的。

我對於他這一套本領是久已領教過的，所以1946年他在美國芝加哥寫信給我說：“我忘記你對金村年代好像有一個說法，它決非韓墓，懷氏對此頗含糊不清，便中請賜教行。”我沒有復信，寫了一篇《洛陽金村古墓為東周墓非韓墓考》，在報上公開答復，以免被他巧偷。他自己從來沒有認識出過一個過去認不得的甲骨文字，但自封為古文字學家。他總有一二十次向我借看尚未發表過的文字考釋的舊稿，我從未答應。他說只消開一個我所認識的古文字的單子，或者把我寫過批語的金文編或甲骨文編借給他，我也沒有照辦。他罵我懶，罵我吝惜，甚至說我是吹牛，我還是沒有理。我總不願意把自己沒有整理好的意見，供給他一類人來坐享其成，或者改頭換面，貽害讀者，或者吹毛求疵，蓄意中傷。事實證明，他在《殷虛卜辭綜述》和《西周銅器斷代》里很多地方都是如此。

儘管這樣，我過去對他，總還寄與一些期望。他表面還很爽直，有話就說，對老年人（例如徐森玉老先生）

很殷勤，有些小聰明等等假象也曾迷惑了我；所以儘管看見他亂罵人，擺權威架子等很討厭；儘管在他對我說“我捧你，你不要到處說我不好”這一類無耻的話，覺得可鄙；但總還期望他能變好一些。在黃盛璋同志抨擊他的盜竊材料時，還希望他們能夠和解，能夠互相團結。只是經歷了這次反右派鬥爭後，我才得到深刻的教訓，把眼睛擦亮了。這種在靈魂深處徹底腐朽而又拒絕改造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是不能寄與任何期望的。

陳夢家在三反運動時是大老虎，黨和政府沒有追究既往，他應該改過自新。但在院系調整後，他轉入了考古研究所，相反地把尾巴翹得更高了。幾年來，他似乎很努力，很忙，據他說是“社會主義熱情”。但忙的是什麼呢？忙的爭權利，當把頭，捧這個，拉那個，搞小圈子，挑撥離間，打擊人；忙的東跑西跑，沽名釣譽多寫東西，多拿稿費；忙的買房子，買明代傢俱；裝着熱心戲劇，搞鬼把戲。

他的著作真快真多，兩年工夫寫七八十萬字，平均每天一千多字，這種抄都抄不及的速度，真够嚇人一跳。印出一部大書，確是有樣子。拿到七八千稿費，買一所大房子而有余，名利雙收，確實可用以向人夸耀，引誘年青人走這條道路。只可惜他的著作來歷，都不大光彩，變相的抄，變相的偷，加上不負責任，胡說八道。七十萬字的大書幾乎成為百科全書，只要牽絲拔籐可以拉扯得上，就拼命望里填，下筆萬言，去題千里。假使不是定期交稿，就寫七百萬字也完不了。一篇文章常常發表兩次。一個題目，常常在同一時期里重複寫兩三次。他的目的只是快出書，多出書，寫完這個，就忙那個，從來不肯做校對工作，從來沒有想對人民應該負責任。對於十幾年前的舊稿《尙書通論》，他自己說已經“面目生疏，無從董理”，要別人替他查對原書，改正錯誤。他自己“不暇更作較大的改動，只能盡旬日的工夫，稍加清理與補充，即以付印”。而七十萬字的《殷虛卜辭綜述》，所引的卜辭，據說“想要重對而始終沒有重對”，所以連當材料用也靠不住。

他是專職研究員，國家每月給他巨額工資，他沒有摸一下良心，為人民做一點有益的事情，却總想趁機會撈一把。首先他想獨霸甲骨文和銅器的研究，想把《殷虛卜辭綜述》作為總結。在幾次會議上我們都反對他這樣做，我們知道他的底，自己沒有真正研究，如何能妄下雌黃，企圖壓倒過去學者們的成績。但他還是偷偷地這樣做。綜述寫完後，他趁我忙，故意只拿一小部分稿子給我看，就要我為他提書面意見。我當時認為學術問題，可以各抒己見，即使有些謬論，也可以引起別人的深思，所以同意他的出版。但他居然要拿這本七拼八湊、東抄西盜的書作為資本來向黨進攻，我真悔恨當時沒有很好地盡我的責任，沒有對它做公正嚴厲的批評，閉上眼睛就簽了字。

1953年秋，在《文物參考資料》上，我和他有過一次爭論。我認為“由於青銅工具的發明，一方面使生產力提高，一方面也就使手工業和農業分了工，許多人脫離了農業生產而專事於金工、木工等”。有人提出了疑問，陳夢家竟蠻橫地替我代答，他說要到青銅工藝發達以後，才可以造青銅工具。“青銅工藝只是在那個社會制度下特殊發展而成的王家工業。殷代的青銅工藝，只是一種工藝，還不能稱為存在於社會的專門化的工業部門。當時，農具和一般的工具恐怕不是銅的”，又說“那時候根本不用青銅農具”。他否定了作為奢侈品的青銅生活用具只是在金屬工具的使用以後，生產力十分發展，並有了階級剝削，才會出現的一個基本原則，他甚至含糊地說“那個社會制度”而不願意指明是什麼性質的社會。我當時曾批評過這種謬論，並要他好好地學習馬克思主義。他口頭上認錯了，但設法阻止我的批評文章的發表。

對右派分子來說，客觀事實是不容情的。當陳夢家跟我爭論時，安陽大司空村的殷代遺址，偏偏打了他一下耳光，發現了一個殷代銅鏹，證明是生產工具。石興邦同志寫了一篇文章，陳夢家趕緊使用兩面手法，一面夸獎文章寫得好，一面阻止文章的發表，阻攔了兩年，在1955年發表的發掘報告里才有極簡單的敘述。他在《殷虛卜辭綜述》里故意含糊其辭，說“由發掘或由其他方式出土的殷代銅器中，有大量的兵器、祭器，有不少也不太多的工具，而幾乎沒有農具”。又說“殷代青銅農具之不見，是合乎歷史條件的”。“金屬的農具即使有，也不會是一般直接耕種者所用的”。他不敢公然否定殷代有金屬農具，可又死不承認，只好“推想殷代的百工是受重視的，他們可以製造並使用金屬的工具”，而說大司空村出土的青銅鏹“應屬於這一類，它不是耕種者的農具”。但是這個長22.45厘米的大銅鏹，除了挖地，作什麼用呢？陳夢家沒有交代出來。這種一手遮天的手法，有意歪曲科學的歷史的事實，究竟為什麼呢？

現在，已經很清楚，他在有意地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史，我們過去只認為他落后，沒有學好馬克思主義理論，那是太老實了，太天真了。

他向來不談歷史分期問題，于省吾先生說“《殷虛卜辭綜述》沒有講到社會性質是主要缺點”。我們都知道陳夢家沒有真正精通甲骨金文，沒有在整理全部卜辭材料上下過苦工，沒有真正掌握和古代史有關的文獻和資料，並加以研究，尤其主要的，他從來不學習馬克思主義，他怎么能接觸殷代社會性質的問題呢？但是他並不是沒有講到，于先生給他騙了。他撈說商代那種高度的文化是在最原始的石器骨蚌器等基礎上產生的，他蓄意要反對馬克思主義，當然要在表面上避開這個關鍵性的問題，而在暗中輸入資產階級觀點。

去年冬天以後，他不斷地講歷史分期了，又作報

告，又寫文章。他在1956年10月寫的《尙書通論序》，提出了他所謂“史學研究”的全部綱領。他說，“除了方法是最主要的以外，工具和資料是研究古史的首要的條件”。他所謂工具是：小學、銘文、版本學、古器物學、年代學、曆法和古地理。這都是他自認為有了本錢的。他說“經學和小學本身的研究，是為古史研究奠基的基石，舍此而談古史，那只是沒有基礎的架子而已。方法是錢串子，材料是錢，有了方法和材料，散錢才能連串起來，只有方法而無材料，那只是錢串子而已”。從這裡，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還想在古史方面取得獨占地位，空喊了半天方法，卻根本不提到馬克思主義，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是想抬出資料問題來對抗馬克思主義”。這和費孝通、吳景超、李景漢之流的右派分子借社會調查來向馬克思主義進攻，不正是異曲同工嗎？

同樣，他過去從來不談文字改革問題，我提意見，他說“這是政策，不要爭了”。我說“文字學研究文字發展規律，要為改革文字而努力”，他說他只注重認識古文字。我提到過文字學會、文字研究所，他都不感興趣。從今年春天以來，他突然興高采烈地論文字學，論文字改革，主張設文字研究所，還慫恿我組織文字學會。一方面他渲染中國語文社向我“圍攻”，另一方面却要文字改革委員會組織文章來批判梁東漢同志。三月間他還怕做公開講演，怕有人喝倒采，下不來台，五月間就認為形勢大變，全面地反對文字改革，甚至要政府收回簡化字表。他現在還在要無賴，說這是“學術性的問題”，他是“以文字學者的資格提出來的”。他連漢字簡化方案都沒有看完過，他又在什麼時候研究過這些問題？他除了叫囂和煽動外，提出過什麼積極性的意見？他有什麼資格說他是“文字學者”呢。中國文字學一向是向前發展的，遠在一千八百多年前，許叔重就和主張文字永久不變的俗儒們作堅決鬥爭。要拉社會倒退，讓文字永遠原封不動的右派分子想玷辱我們有優秀傳統的文字學，難道是我們所能容忍的嗎？陳夢家還用“十分贊成”的話來強力推薦關錫一封誣蔑我們領袖的信，說贊成文字改革的人是“順大坡”，是“市儈行為”。右派分子向來慣於用“賊喊捉賊”的辦法，所以“市儈”決不是別人而正是他們自己。陳夢家說，“說話要看時機”，可惜他把時機看錯了，把馬腳露出來了，這道道地地的市儈，投錯了機，終至于一敗塗地了。

在大鳴大放期間，陳夢家忙得不可開交，唯恐火放得不旺，毒放得不够。當人民反擊右派的時候，他後悔了，退縮了。他口口聲聲自命為“學者”，只是不注重馬列主義的學習罷了，只是自己太狂妄罷了。我們要問他和人民日報記者談話時，既反對毛主席所說的“拆牆留錢”，又反對毛主席提出文字改革的方向；在學習雜誌座談會上把馬克思主義說成是教條；難道都不是大是大非嗎？難道只是學術問題，不是政治問題嗎？這幾年來他總想拿所謂“舊學問”，想把“資料”來反抗馬克

繼續追击右派

——駁斥陈夢家、关錫——

秦 华

右派分子陈夢家利用文字改革問題向党进攻的卑劣行动已經引起語言学界和社会人士的憤怒，几种語文刊物都已有專文駁斥。但为了更加揭露右派分子的骯髒面目和可耻的陰謀，还有进一步批判的必要。必須通过深入的批判，我們才可以分辨什么是善意的批評(那怕是反对文改的意見)，什么是利用时机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事業进攻的陰謀。

發表在《中国語文》1957年6月号上的《一封討論文字改革的信》，是右派分子陈夢家及其嚮囉关錫向党进攻的最毒惡最露骨的一篇文章。《中国語文》已經發表了潘山、毛西旁兩位同志对陈夢家、关錫的駁斥；《光明日报》的《文字改革》双周刊也对陈、关等右派分子的反動言論进行了批判，足見陈、关的惡毒的居心已經引起了人們的憤怒与警惕。

那篇文章分兩部分，前边是关錫写給陈夢家的信，后边是陈夢家的“附記”。它的来路是关錫通过《光明日报》写信給陈夢家，陈夢家加上“附記”送交《中国語文》，气势汹汹地要求發表。現在先从关錫的信談起。

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时都是先把自己裝扮成正直忠誠的化身，有的說把他的骨头燒成灰也檢查不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来，有的說党是偉大的，他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关錫也不例外，他一則說“我非常关心祖国的文化”，再則說“对文字改革虽有意見，但不敢公开表示出来。我認为这是对祖国不負責任的态度。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應該打破这种陈旧的观点”。看，关錫把自己打扮成怎样一个正人君子、爱国志士！但是在这种画皮底下究竟隐藏着什么貨色呢？

在那些冠冕堂皇的話后面，关錫立即造起謠言来了。他說：“積極主張文字改革的一些同志，大力宣傳工农兵群众都贊成文字改革，实际并不这样，只要相近的朋友同志之間說起来时，几乎是人人反对。”(本文下加点全是笔者加的。)首先我們要弄明白的是，解放后中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并不是一部分積極主張文字改革的人在那里自發地进行宣傳，而是人民政府成立了專門机构来进行工作的。全国解放后不久，就在党的扶持之下成立了文字改革协会，1952年正式設立了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1954年改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直屬国务院。关錫故意不正視党和政府一直支持并指导我

們的文字改革工作的事实，而把它說成是一部分人在那里宣傳。他的目的是企圖把党的工作說成是少数个人的活动，从而否定党的领导；同时也在罵少数人的掩护下繞弯子辱罵了党。

关錫在这兒还污蔑我們的文字改革宣傳工作是捏造事实，他的証据是“相近的朋友同志之間說起来时，几乎人人反对”。真是这样嗎？絕对不是的。我們只要举出一件事来就够了。1955年1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曾印發了30万份征求意见的表，其中首先問到：“中国文字改革要走拼音文字的方向，你是不是同意？”在文改会收到約四万多份意見表里，百分之九十以上拥护文字改革，贊成拼音化。填寫这份意見表并没有什么可以引起顧虑的地方，填寫者是自願的，他們可以不署名或者随便填寫什么名字。因此，这一个群众意見的統計是真实的，它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希望，它就是“工农兵群众都贊成文字改革”的証据，这也就是人民政府成立文字改革机构的客观基础。这兒我們就不能不怀疑关錫所謂“相近的朋友同志”究竟是些什么人。关錫的这些相近的朋友同志是他捏造的呢，还是受了他惡意宣傳影响的人，还是他們那些同声相应的右派嚮囉們呢？在严肃的反右派斗争中，我們要关錫有所交代，人民是不容許这种欺騙詭詐的行为的。

右派分子是拐弯抹角極尽其污蔑党、污蔑革命領袖之能事的。他們不敢公开反对党，不敢公开反对毛主席，因为党和毛主席在全国人民中享有最高的威信。在这种情形之下，右派分子就只好拐弯抹角来进行他們污蔑党和领导同志的陰謀。关錫就是这样。他不敢公然反对毛主席对文字改革方針的英明指示，而把毛主席的指示說成是受了一部分主張文字改革的人“歪曲事实”的“迷惑”。他說，“可是大力宣傳說是群众一致拥护文字改革的結果，把毛主席也迷惑了，所以毛主席在1951年对馬叙倫先生談話時曾說过：‘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有人借此更大事宣傳起来，实际毛主席是为了符合群众意見而說此話。但群众并不贊成文字改革。何况毛主席不是語言文字学家，对此不能一点不中肯的地方也沒有。”

在这兒，他把毛主席描寫为偏听偏信的官僚主义者，惡意地歪曲了党和毛主席所指示的行之有效的群众路綫。群众路綫是党在大大小小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法寶。党和毛主席是永远了解群众的，代表群众利

益的，所以能永远走向胜利。所謂“受一部分人的迷惑”只是关錫对毛主席的惡毒攻击而已。正因为毛主席观察問題全面，体会群众要求深刻，而且从人民的長远利益出發，所以全国拥护文字改革的呼声是普遍的，是日益高漲的。这种呼声正証實了毛主席指示的正确。

关錫在这兒还把毛主席描写为随声“符合”(附和)向人民討好的庸人，按照他的說法，好像毛主席对这个問題本無所知，只不过討人民的欢喜而已。至于文字改革对人民有利还是有害，毛主席是不在心上的。我們看，还有哪个右派分子敢于这样污蔑党和人民的領袖呢？还有哪个右派分子敢于这样猖狂地企圖損害全国人民爱戴的毛主席的威信，从而挑撥党和毛主席跟人民的关系呢？

关錫还嫌他的話不明显、不露骨，怕达不到目的，再加上一句“毛主席不是語言文字学家，不能一点不中肯的地方也沒有”。請看，关錫在这兒給毛主席再加了一頂帽子：毛主席在这个問題上不学無术。关錫这种無耻的說法，不能不引起我們無比的憤怒。右派分子除儲安平之流外，一般都是狡猾地說党好，黨員不好；上边好，下边不好；借此达到实际上取消党領導的陰謀。而关錫則公然侮辱毛主席，这是不能容忍的。右派分子說党不能領導科学，陰謀夺取文化科学方面的領導权。关錫这种說法和用心同其他右派分子如出一轍，不过更露骨更囂張而已。关錫在信上說，“您在二月四日光明日报上發表的《略論文字学》一篇文章，是一篇好的文章。我很同意你的看法。”关錫一方面佩服右派分子陈夢家这位所謂文字学“專家”，而另一方面又詆毀毛主席不懂語言文字学。言下之意，領導語文政策的应当不是党和毛主席，而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陈夢家之流。

通过这次反右派的大辯論，右派攻击党領導文化科学方針的謬論已被徹底粉碎。在文字改革方面，几年来的事实，早已証明党的領導方針是正确的，而且基本上执行得很好。汉字簡化方案已經公布实行，我們推广普通話的工作已在全国範圍內蓬勃展开，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已經公布試用，我們的拼音文字研究工作也在有計劃地进行，这一切都是毛主席和党英明領導的表現。我們并不否認文改工作中还存在一些缺点，但成績仍然是主要的。可是右派分子不願看見这些成績，仇視这些成績，片面誇大缺点和歪曲事实，因而千方百計破坏它并利用文字改革問題向党、向毛主席肆行污蔑。他們站在腐朽的資產階級的立場上，本来就不可能同我們人民有共同的語言的。

在关錫的信里，我們可以充分看到他的反动立場的本質，这种本質是不能用一些好听的自我裝飾的字眼以及拐弯抹角玩花招的手法所能掩盖和狡賴过去的。关錫說，“改革就是象征进步，反对改革就是落后、保守。人們多半有此錯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当打

破这种陈旧的观点。”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其所以是进步的，就是他們把改造世界、变革现实看成自己光荣的任务。只有变革现实，生产才能發展，人民才能求得幸福，因此改革必然象征进步。相反，沒落階級(封建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則为了保持他們剝削的利益，反对打破旧制度，反对改革，因此他們就是落后的、保守的。这是真理，而不是錯覺；这是进步的观点，而不是陈旧的观点。其所以是进步的，因为它是發展的观点；另一种观点之所以是落后保守的，因为它保持旧制度，反对發展，阻碍进步。可是关錫的看法正相反，这是什么原因呢？除了替反动的剝削階級辯护，还有什么別的理由呢？关錫的反动立場还表現在下边的話里。他說，“至于‘順大坡’也跟着贊成文字改革，也可以說是一种市儈行为。”“順大坡”就是大势所趨的意思，“大坡”就是全体人民的一致趨向。在不可抗拒的群众趨向面前，少数动摇分子不得不跟着走，这就是順大坡的意思。关錫在文字改革問題上談到順大坡，也正証明了前边談到的他对于事实的歪曲，証明了他的前后矛盾。他一边說群众实际上并不贊成文字改革，一边又說“順大坡”，即群众大多数都贊成文字改革。这兒可以看出他在群众贊成文字改革的现实面前，老羞成怒，不覺說了真話。他也看出群众性的文字改革的洪流是不可抗拒的，而对表示贊成的人們怀有無限的憤懣。这和党整風初期右派分子們謾罵積極分子又有什么兩样呢？他們的目的只有一个，反对人們坚决跟着党走，在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給人們施加压力，威胁人們跟着右派分子走。这样看来，关錫的反动立場也就更加明显了。

我們知道，右派分子是善于等待时机的。他們平时陽奉陰違，裝得老老实实，騙取党和人民對他們的信任。但一到有机可乘，他們的假面具就揭开了，这时候他們就利用合法机会进行他們的陰險勾当。关錫也不例外。他在信中說，“在百家爭鳴的号召之下，关心祖国文化教育的人們，應該積極提出久郁未發的意見。以使祖国的文化能够避免走向黑暗之途。”关錫利用的时机是百家爭鳴，他是在党号召的学术上的百家爭鳴时机实行向党进攻。奇怪得很，这位“关心祖国文化教育”的先生，解放八年以来，在共产党領導的人民政权下却有意見“久郁未發”，言下之意党和政府这几年来一直在限制或压迫言論自由。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在說話呢？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里曾說，人民有言論自由，而反动分子則不許乱說乱动。事实上文字改革問題这几年来一直在刊物上討論着。贊成的和反对的文章都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关錫的“久郁未發”的意見正是一向不允許乱說的貨色，現在趁大鳴大放的时机冒出来了，人民还是要把它打回去的。关錫对党的文字改革方針的認識竟是“使祖国的文化走向黑暗之途”。关錫不覺得解放前蔣介石

反动派压迫文字改革运动，逮捕文字改革工作者，解散新文字团体，封闭新文字报纸，追查写新文字标语的同志等等作法是黑暗统治；他不觉得蒋介石反动政权下的教育废弛、文化落后、文盲众多是文化上的黑暗时期，反而觉得对扫除文盲、提高人民文化、便利科学技术发展有重大意义的文字改革方针会使中国走向黑暗之途。请问在这种方针下，走向黑暗之途的是哪些人？没有别的，那只是没落阶级害怕人民天下更巩固，从而使资本主义复辟的企图更加渺茫的一种阴暗心情的表现而已。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立场有不同的道理，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就是我们对关锡反动谬论的看法。

了解了关锡的反动立场，我们就不难理解他对文字改革问题（这儿只谈到文字拼音化问题）的荒谬的看法。（至于善良的人们由于不了解而持有类似的意见，又当别论）我们觉得中国文字必须走拼音化的道路，拼音文字是建设社会主义、提高人民文化的必要条件之一，关锡却认为“汉字完全没有拼音的必要，它利益很小很小，害处很大很大”。我们觉得拼音文字好学又好用，汉字难学难用，关锡却认为“拼音文字好学不好懂，汉字难学易懂”。我们觉得学习汉字浪费学生的精力和时间，关锡却认为“人一生用字时间长，学字时间短”，多花几年学汉字没有关系。我们觉得小学生在学汉字上遇到的困难太大，他却说“我们并没有受过那些苦头”，“看看小学生，每天可以说净玩，看不出他们因学习汉字而费了额外多的时间和脑力而苦恼”。关锡和我们没有共同的语言。这儿我们只简短地说明一些情况来驳斥关锡对于事实的歪曲。

文字和其它工具一样，产生于社会的需要，在实践中得到逐步的改进，而且在需要越大的时候就改进得越快。原始时期人们只能拿图画笼统地表示语言，以后才学会拿表示词的字表示语言，以后又学会以表示音节的字表示语言，最后才学会拿表示音素的字母表示语言。这样愈向前愈学会更精密的分析，而文字的学习和使用也就更加容易起来。自从人类有了拼音文字以后，后起的民族就再不走前人迂回的道路而径直用拼音文字。英语、法语、德语、俄语以及我国的若干兄弟民族语言都是这种情况。原来不够科学的文字也在一定条件之下改用更科学的音素化的拼音文字，土耳其、苏联境内的突厥民族以及越南人民共和国就是这种情况。我国的汉字改革方针也是本着这种精神的。拼音文字是按照语音系统地记录语言的，所有的语言既然都是声音的，自然也都可以使用拼音文字。关锡说汉语辅音没有单念的（不像英语、俄语那样），没有语尾的曲折变化，因而不适合用拼音文字。这完全是没有常识的胡说。拼音文字跟着语言走，懂得语言就能学习文字，就能懂得文字，使用文字。文化程度

逐步提高了，语言逐步丰富了，文字自然也跟着认得多了。这里没有什么不好懂的问题。汉字脱离语言才真正发生难懂的问题。至于小学生的学习文字，朝鲜就是例子。朝鲜没有废除汉字前，小学是六年毕业，废除汉字后就减为五年，以后又减为四年。苏联小学生由于使用拼音文字，小学四年毕业，而且课程内容分量超过我们，译成汉字是我们的两倍多。由于他们小学的时间短，所以工学院可以延长为五年，而我国则只能是四年，苏联的医学院是六年，我们只能是五年。又由于他们小学课程分量比我们多，所以高等学校虽比我们多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二十五的时间，课程分量却比我们多百分之一百至百分之二百。比方，据统计，苏联的生理学教本译成汉字为一百多万字，我们的则只有五十万字。苏联的“精神病学”比我们的讲义多两倍多。人家的“内科学基础”我们讲授不到三分之一。这就是我们所以要走拼音化道路的真正原因，这就是党和毛主席英明正确领导的客观真理和客观依据。而关锡之流则不过是闭目塞听、恶意瞎说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关锡的文章是陈梦家推荐发表的。他这样作不是为了批判，而是为了赞扬。只要看一看他在“附记”里所推崇的话就够了。他说，“我认为，信中所涉及的，是一个普通的人对于文字改革的意见。”“至少是真诚的”，“但不能说成是幼稚的。”“但不一定像专家那么有成见。”

这儿他极力要把关锡的恶劣地向党进攻说成是群众的呼声，说成出于诚意而且是成熟的意见，顺便再打击一下党（在“专家”字样的掩护下），把党的正确方针和措施说成成见。所以关锡的意见也可以说是陈梦家的夫子自道，或者说借刀杀人。这种手法是很恶毒的。比写匿名信更巧妙些，比直接写出效果更大些。所以陈梦家唯恐这封信不得发表，咄咄逼人地一再说，“倘使我也在刊物编者的心目中当作一个‘专家’，那么我愿意负责推荐这篇平常的通信。”再则说，“《中国语文》就应该赶快登载这类群众的意见”，“我们办刊物的人就应该尽量早登快登”。陈梦家唯恐天下不乱的心情早溢于言表了。

陈梦家还向读者点了一把火，阴谋鼓动在群众中掀起大规模的反文字改革的风波，从而引起群众对党的不满，离间党和人民的关系。他说，“我十分赞成这篇通信中的精神。”“文字改革是一切使用汉字的人的事，群众都有说话的权利”，“群众是刊物读者的绝大多数。他们比少数的‘专家’更有权用此刊物园地发表反对或怀疑的意见。”这儿他“号召”群众学习关锡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精神，污蔑党和政府在文字改革问题上一向不给人民说话的权利，并且露骨地煽动群众来反对或怀疑文字改革。

（下转12页）

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初稿和本國地名 審音表初稿

普通話審音委員會

普通話審音委員會自1956年4月起開始審訂異讀詞的讀音。事先由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辭典編輯室的部分同志，就現代北京話的實際讀音，參照韻書字典，搜集有異讀的詞，提出初步意見。到1956年7月，搜集了異讀詞六百多條。這批材料由審音委員會分批油印送請各位委員審核。許多委員對於原稿擬訂的讀音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見。審音委員會於是召集委員會會議，就一些原則性的問題進行了討論和研究。又成立一個初審小組，對各委員提出的具體意見進行了多次商討。商討的結果，又提交委員會審議。1957年8月審音委員會秘書處根據會議所討論重新修訂了異讀詞表原稿，仍分送各位委員審核。這次審核，意見已接近一致了。審音委員會秘書處根據各委員最後的審核意見又加以整理，編成了這個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初稿。

本國地名讀音的審訂是從1956年11月開始的。審音委員會曾把本國重要地名讀音有疑問的，選出了一百多個，用通信方式向當地進行了初步調查，根據調查的結果訂出了普通話的讀音。審音委員對這批地名審訂的讀音，意見較為一致，已經最後通過。

現在把這兩種審音表的初稿先行公開發表。希望廣大讀者多多提供寶貴的意見，以便做進一步的修訂。

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初稿

一、本表一共收集了現代北京話的異讀詞666條（其中也包括一小部分詞組），逐條注明審音委員會審訂的讀音，按音序排列。

二、審音以詞為對象，不以字為對象。例如：“率”這個字有“shuǐ、pǔ”兩個音，但是在“效率”這個詞里，只讀“shuǐ”，在“率領”這個詞里，只讀“pǔ”，所以“效率”的“率”和“率領”的“率”的不同讀法不在審音範圍之內。本表所收的都是異讀詞，像“膿”、“波浪”之類；“膿”有“róng、lóng”兩種說法，“波浪”有“bōlàng、bōlǎng”兩種說法。這類詞才是審音的對象。

三、本表所收多音節的異讀詞有兩種情況：

1) 某字在某個詞里發生異讀而在別的詞里不發生異讀，審音的時候，只審訂有異讀的詞。例如：“訂”字在“裝訂”這個詞里有“dìng、dīng”兩種說法，但是在“訂單、預訂”里只有“dìng”一種說法；本表只審訂“裝訂”這個詞的音，不牽涉到“訂單、預訂”的音。

2) 某字在許多不同的詞里都同樣有幾種讀法，本表只選了少數幾個詞加以審訂，並沒有把所有這一類異讀詞全部收進去。例如：“波浪、波瀾、波濤、波動、波及、波折、波長、光波、電波……”這些詞里的“波”都有“bō、pō”兩種讀法，本表只舉“波浪、波濤、光波、電波”等幾個詞為例，其餘“波動、波瀾、波折、波及”等等可以類推。

四、北京話里，哪些詞的哪個字必須輕讀；或是可輕可重，本表都沒有審訂，留待將來再審。本表所收的有輕音的詞，限于輕音字本身有異讀的。例如：“喜鵲”有“xǐ·què、xǐquè、xǐ·què、xǐquè”幾種說法。

五、審音的標準，根據北京音系，可也並不是每一個字都照北京話的讀法審訂。北京話里，有些字的讀法是和北京語音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合的；也有某一個字不只一種讀法，有的合乎規律，有的不合。本表所訂的音大致根據以下幾項原則：

1) 一個字的讀音在北京話里非常通行而不合北京語音的一般發展規律的，這個音還是可以採用，但是同時也要考慮到這個音在北方方言里應用得是否廣泛。例如在北京話里，“危”讀“xī”，“期”讀“qī”，“帆”讀“fā”，這些音不合一般發展規律，但是採用了，因為在北京話里非常通行，北方方言也大致通行。可是像“暫”讀“zhàn”，“醉”讀“zuì”，“診”讀“zhěn”，這些不合規律的音就不採用，而把“暫”的音訂為“pàn”，“醉”的音訂為“uì”，“診”的音訂為“zhěn”，因為這是符合一般發展規律並為北方方言所通用的。

2) “開、齊、合、撮”的讀法，原則上以符合語音發展規律的為準。例如：“嫩”採用“nèn”的音，不採用“nēn”

的音。“淋”采用“ㄌㄣˊ”的音，不采用“ㄌㄣˊ”或“ㄌㄣˊ”的音。

3) 古代清音入声字在北京話的声調，凡是沒有异讀的，就采用北京已經通行的讀法。凡是有异讀的，假若其中有一个是陰平調，原則上就采用陰平，例如：“息”ㄒㄧˊ，“击”ㄐㄧˊ。否則逐字考虑，采用比較通用的讀法。

六、每个詞原則上暫訂一个音，但是也有少数詞保留了兩個音，例如：“血”ㄒㄩˊ，ㄒㄩˊ。

七、本表后面附有异讀詞單字索引，索引只收了有异讀的那些單字(审音表里底下加点的字)，按笔画的多少及起笔“一丨丿”的次序排列。

[ㄣ]		徘徊	ㄆㄞˊ ㄅㄞˊ	飞躍	ㄈㄟˊ ㄩㄛˊ (“躍”不取 ㄩㄛˊ 音)
拔(毒)	ㄅㄚˊ (ㄅㄚˊ)	牌坊	ㄆㄞˊ ㄈㄞˊ	沸點	ㄈㄟˊ ㄉㄢˊ
波浪	ㄅㄚˊ ㄌㄞˊ	胚胎	ㄆㄞˊ ㄊㄞˊ	沸騰	ㄈㄟˊ ㄊㄞˊ
波濤	ㄅㄚˊ ㄊㄞˊ	配給	ㄆㄟˊ ㄍㄟˊ	廢弛	ㄈㄟˊ ㄕㄟˊ
波菜	ㄅㄚˊ ㄕㄟˊ	蓬勃	ㄆㄟˊ ㄅㄟˊ (“勃”一律念ㄅㄟˊ)	翻供	ㄈㄟˊ ㄍㄟˊ
播音	ㄅㄚˊ ㄣˊ	坯子	ㄆㄟˊ ㄣˊ (但“鋼坯”讀 ㄍㄟˊ ㄆㄟˊ)	繁殖	ㄈㄟˊ ㄕㄟˊ
剝削	ㄅㄚˊ ㄊㄟˊ	皮膚	ㄆㄟˊ ㄕㄟˊ	分泌	ㄈㄟˊ ㄆㄟˊ (但“泌陽”的“泌”讀 ㄆㄟˊ，參地名表)
貝壳儿	ㄅㄟˊ ㄕㄟˊ	枇杷	ㄆㄟˊ ㄕㄟˊ	分娩	ㄈㄟˊ ㄆㄟˊ
僻靜	ㄆㄟˊ ㄣˊ ㄌㄟˊ (“僻”念ㄆㄟˊ只限于 “僻靜”一詞)	琵琶	ㄆㄟˊ ㄕㄟˊ	分析	ㄈㄟˊ ㄕㄟˊ
剝	ㄅㄟˊ (單說ㄅㄟˊ，如“剝皮”說 ㄅㄟˊ ㄕㄟˊ，在其他复音詞 里念ㄅㄟˊ。)	品質	ㄆㄟˊ ㄕㄟˊ	憤慨	ㄈㄟˊ ㄕㄟˊ
包庇	ㄅㄟˊ ㄅㄟˊ	乒乓球	ㄆㄟˊ ㄕㄟˊ ㄕㄟˊ	妨害	ㄈㄟˊ ㄕㄟˊ
薄	ㄅㄟˊ (“薄弱、淡薄”的“薄”念 ㄅㄟˊ)	瀑布	ㄆㄟˊ ㄕㄟˊ	妨碍	ㄈㄟˊ ㄕㄟˊ
宝藏	ㄅㄟˊ ㄕㄟˊ	朴素	ㄆㄟˊ ㄕㄟˊ	蜂拥	ㄈㄟˊ ㄕㄟˊ (“拥”一律念陰平)
暴露	ㄅㄟˊ ㄕㄟˊ (但“一曝十寒”的 “曝”念ㄅㄟˊ。)	麻痺	ㄆㄟˊ ㄕㄟˊ	諷刺	ㄈㄟˊ ㄕㄟˊ
板凳	ㄅㄟˊ ㄕㄟˊ	馬匹	ㄆㄟˊ ㄕㄟˊ	膚淺	ㄈㄟˊ ㄕㄟˊ
半身不遂	ㄅㄟˊ ㄕㄟˊ ㄕㄟˊ ㄕㄟˊ (在其他詞里 “遂”讀ㄕㄟˊ)	馬尾兒	ㄆㄟˊ ㄕㄟˊ ㄕㄟˊ (但“尾巴”讀 ㄕㄟˊ ㄕㄟˊ)	敷用	ㄈㄟˊ ㄕㄟˊ
本質	ㄅㄟˊ ㄕㄟˊ	墨迹	ㄆㄟˊ ㄕㄟˊ	伏击	ㄈㄟˊ ㄕㄟˊ
傍晚	ㄅㄟˊ ㄕㄟˊ	脉	ㄆㄟˊ ㄕㄟˊ	辐条	ㄈㄟˊ ㄕㄟˊ
比較	ㄅㄟˊ ㄕㄟˊ (“較”一律讀 ㄕㄟˊ)	徽茵	ㄆㄟˊ ㄕㄟˊ	辐射	ㄈㄟˊ ㄕㄟˊ
避雨	ㄅㄟˊ ㄕㄟˊ (“避”不取ㄕㄟˊ的音)	沒趣兒	ㄆㄟˊ ㄕㄟˊ ㄕㄟˊ	幅儿	ㄈㄟˊ ㄕㄟˊ (“幅”在其他詞里念 ㄕㄟˊ)
便秘(閉)	ㄅㄟˊ ㄕㄟˊ (“秘”念ㄕㄟˊ，只限于 “便秘”一詞。)	矛盾	ㄆㄟˊ ㄕㄟˊ	撫摩	ㄈㄟˊ ㄕㄟˊ (“摩”在其他詞里念 ㄆㄟˊ)
遍地	ㄅㄟˊ ㄕㄟˊ	門脉	ㄆㄟˊ ㄕㄟˊ	輔導	ㄈㄟˊ ㄕㄟˊ
病菌	ㄅㄟˊ ㄕㄟˊ (“香菌、菌子”的 “菌”念ㄕㄟˊ)	門診	ㄆㄟˊ ㄕㄟˊ	附和	ㄈㄟˊ ㄕㄟˊ
哺乳	ㄅㄟˊ ㄕㄟˊ	秘密	ㄆㄟˊ ㄕㄟˊ	妇孺	ㄈㄟˊ ㄕㄟˊ
补給	ㄅㄟˊ ㄕㄟˊ	秘書	ㄆㄟˊ ㄕㄟˊ	复辟	ㄈㄟˊ ㄕㄟˊ (“复”一律念去声)
布匹	ㄅㄟˊ ㄕㄟˊ	勉強	ㄆㄟˊ ㄕㄟˊ	复習	ㄈㄟˊ ㄕㄟˊ
不妨	ㄅㄟˊ ㄕㄟˊ (單用也是ㄕㄟˊ，如說 “妨主”，但“妨碍、妨 害”的“妨”念ㄕㄟˊ。)	面嫩	ㄆㄟˊ ㄕㄟˊ	复兴	ㄈㄟˊ ㄕㄟˊ
不敷	ㄅㄟˊ ㄕㄟˊ	閩臺	ㄆㄟˊ ㄕㄟˊ	复診	ㄈㄟˊ ㄕㄟˊ
不惜	ㄅㄟˊ ㄕㄟˊ	閩劇	ㄆㄟˊ ㄕㄟˊ	复仇	ㄈㄟˊ ㄕㄟˊ
步驟	ㄅㄟˊ ㄕㄟˊ	明晰	ㄆㄟˊ ㄕㄟˊ	复杂	ㄈㄟˊ ㄕㄟˊ
埠头	ㄅㄟˊ ㄕㄟˊ (“埠”字不取ㄕㄟˊ音)	命脉	ㄆㄟˊ ㄕㄟˊ	复原	ㄈㄟˊ ㄕㄟˊ
部署	ㄅㄟˊ ㄕㄟˊ	木樨(木犀)	ㄆㄟˊ ㄕㄟˊ	复(覆)轍	ㄈㄟˊ ㄕㄟˊ
[ㄣ]		首蓓	ㄆㄟˊ ㄕㄟˊ	[ㄣ]	
不敷	ㄅㄟˊ ㄕㄟˊ	發酵	ㄆㄟˊ ㄕㄟˊ (“酵”不取 ㄕㄟˊ 音)	搭救	ㄉㄞˊ ㄕㄟˊ (北京又讀 ㄉㄞˊ ㄕㄟˊ， 不取。)
不惜	ㄅㄟˊ ㄕㄟˊ	發顫	ㄆㄟˊ ㄕㄟˊ	搭載	ㄉㄞˊ ㄕㄟˊ (“登載、記載”的“載” 念 ㄆㄟˊ)
步驟	ㄅㄟˊ ㄕㄟˊ	伐樹	ㄆㄟˊ ㄕㄟˊ (“伐”一律念陽平)	答理	ㄉㄞˊ ㄕㄟˊ
埠头	ㄅㄟˊ ㄕㄟˊ (“埠”字不取ㄕㄟˊ音)	法兒	ㄆㄟˊ ㄕㄟˊ (“法”一律念上声)	答应	ㄉㄞˊ ㄕㄟˊ
部署	ㄅㄟˊ ㄕㄟˊ	法子	ㄆㄟˊ ㄕㄟˊ	答复	ㄉㄞˊ ㄕㄟˊ
[ㄣ]		法律	ㄆㄟˊ ㄕㄟˊ	打哈欠	ㄉㄞˊ ㄕㄟˊ ㄕㄟˊ
[ㄣ]		法国	ㄆㄟˊ ㄕㄟˊ	[ㄣ]	

打·击·大·厦·王

戒捕、逮捕、体师、岛屿、悼念、豆豉、胆怯、薄夕、旦档、案载、隄防、岸圯、抵抗、抵换、缔结、地壳、地质、雕塑、电波、督导、堆质、对质、短期、吨

特殊·伐色·尿症
特討·蜜糖·提貼·跳突·突破·突击·突然·土脉

ㄏㄩㄣ
 ㄏㄩㄣˊ(“盡”不取陰平調)
 ㄏㄩㄣˊ(“廈門”念ㄊㄩㄣˊ)
 ㄏㄩˊㄒㄩㄣˊ(“大王牌”說ㄏㄩˊㄒㄩㄣˊ
 ㄒㄩㄣˊ)
 ㄏㄨˊ˙ㄒㄩㄣˊ(“山大王”說ㄏㄨˊㄒㄩㄣˊ
 ˙ㄒㄩㄣˊ)

[illegible]

〔去〕

大ニテX
 大ニテY
 大ニテZ
 大ニテW
 大ニテV
 大ニテU
 大ニテT
 大ニテS
 大ニテR
 大ニテQ
 大ニテP
 大ニテO
 大ニテN
 大ニテM
 大ニテL
 大ニテK
 大ニテJ
 大ニテI
 大ニテH
 大ニテG
 大ニテF
 大ニテE
 大ニテD
 大ニテC
 大ニテB
 大ニテA

唾沫 頹廢 頹唐 蛻變化色 退部 臀通緝

同胞・統括

荻・省・鋤・
拿・內・鏟・尿

牛虻(蟲)
宁可

和•
暖•
嫩•
膿•
弄•

勞軍百姓
老巢印頭
烙露狼藉
冷場

理髮
理·會
里·應·外合
利·益
流·血

連署
連宗
連陰天
·恋愛
·量入為出
·淋
·兩棲
·虜获
·露骨
·鹿角菜

ㄅXㄣ̇·ΠΞ
 ㄅXㄥ̇Cṽ
 ㄅXㄥ̇ㄆㄛ̃
 ㄅXㄥ̇Vṽ
 ㄅXㄥ̇XŸ
 ㄅXㄥ̇ㄗ̃(但“色兒”念PŸ儿)
 ㄅXㄘ̇X̃
 ㄅXLHṽ(从北京念ㄅXLHṽ,
 不念ㄅXL<ṽ。)

$\Delta X \dot{L} \gamma \epsilon$
 $\Delta X \dot{L} \gamma X \dot{z}$

[3]

3YFXZ
 3YTIL
 3ZYZ
 3IX(名、动) (“尿”用做名词
 又念 ΔXΓ)

31ǎnǎ
31lèzhǐ (“安宁”的“宁”念
31lè)

3X⁴·ΓX²
3X⁴
3X⁴
3X⁴(但“弄堂”的“弄”讀
3X⁴)

[力]

ㄋㄜˊㄣㄣ
 ㄋㄜˊㄨㄣˊㄣ
 ㄋㄜˊㄙㄜˊ (“巢”不取ㄋㄜ音)
 ㄋㄜˊㄣ
 ㄋㄜˊㄙ
 ㄋㄜˊㄣ
 ㄋㄜˊㄣ (“場院”的“場”念ㄋㄜ,
 其余都念ㄋㄜ。)

ㄎǐㄘㄩˋ (“髻”一律念去声)
 ㄎǐㄉㄤˋ
 ㄎǐㄌㄧˋ×ㄉㄤˋ
 ㄎǐㄌㄩˋ
 ㄎǐㄒㄩㄥˋ(如“流血牺牲”)
 ㄎǐㄒㄩㄥˋ(如“鼻子流血了”)

分 | 𠂇 𠂇
 分 | 𠂇 𠂇
 分 | 𠂇 | 𠂇 𠂇
 分 | 𠂇
 分 | 𠂇 𠂇 𠂇 𠂇
 分 | 𠂇
 分 | 𠂇 𠂇
 分 | 𠂇 𠂇
 分 | 𠂇 𠂇
 分 | 𠂇 𠂇 𠂇

綠林
蘿卜
邏輯
落花生
落花生
李生
卵巢
弄堂

膊·臂·命·新·蚌·
隔·隔·夜·渠·当·茵·慨·召·
膊·臂·革·革·蛤·隔·隔·改·溝·勾·杆·感·感·

感觸·坯·頭·雨·迹·肉·膜·炎
鋼·骨·谷·古·骨·骨·髓·乖·謬·矩·子·手
創·滾·沸·波·播·橙·益·攻·市·績·給·制
供·供·銷

卡賓鎗

卡·片
卡·通

勿X勿14
 勿X \dot{X} ·52
 勿X \dot{X} ·41
 勿X \dot{X} (一律念勿X \dot{X})
 勿X \dot{X} ·厂XYPL
 勿X \dot{X} PL
 勿X \dot{X} 牙 \dot{X}
 勿X \dot{X} 志 \dot{X}

[《】

《ㄓ・ㄗ
《ㄓ・ㄗ
《ㄓㄣㄌ
《ㄓㄒ
《ㄓㄨㄥ（但“蚌埠”讀ㄓㄨㄥˋ）
《ㄓ
《ㄓㄟ
《ㄓㄨㄛ
《ㄓㄨ
《ㄓㄨ
《ㄓㄨ
《ㄓㄨㄣ
《ㄓㄨㄣ
《ㄓㄨㄣ（“召集，召开”的“召”念ㄓㄨㄣ）

[illegible]

[5]

ㄙㄩㄣˊ (外来詞里“卡”
念ㄙㄩˊ, “卡子、
关卡”的“卡”念
ㄘㄩˊ。)

5YX19
5YXL

朽爛
 弦(絃)
 閒暇
 限期
 陷陷
 坑
 心迹
 馨香
 菌
 相識
 嵌
 虛偽
 畜产
 削減
 閥閥
 学徒
 雪白
 雪櫃
 馴順
 馴养

Tɿ̌ʃʌŋ
 Tɿ̌ʃ
 Tɿ̌ʃTɿ̌
 Tɿ̌ʃ<ɿ
 Tɿ̌ʃ(不取Tɿ̌ʃ音)
 Tɿ̌ʃʌ
 Tɿ̌ʃɿ
 Tɿ̌ʃTɿ̌
 Tɿ̌ʃɿ
 Tɿ̌ʃ(“識”一律念 ʃ)
 Tɿ̌ʃ<ɿ̌
 Tɿ̌ʃʌ(“伪”不取ʃʌ音)
 Tɿ̌ʃ
 Tɿ̌ʃɿ̌
 Tɿ̌ʃɿ̌
 Tɿ̌ʃʌ(不取Tɿ̌ʃʌ音)
 Tɿ̌ʃ<ɿ̌
 Tɿ̌ʃʌ(“駙”不取去声調)
 Tɿ̌ʃɿ̌

逐·主·拙·拙·拙·灼·追·追·追·追·追·追·轉·裝·裝·撞·忠·終·重·重·重·種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イ〕

支指脂指植殖質質指導指摘誌秩序軋召開召集氣澤績珍惜偵偵緝察肝節貞貞診脈診療診治步逐逐漸

[illegible]

痴心沼奪辱頭螻寸別勘究粉不差錯襲鈔巢動寂迹子(身)
池褌耻尺尺差查揅差不抄鈔巢顫沉陳橙常成成熟懲罰戒出診夕罰分
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

[illegible]

時實貨字當導內外述木射(箭)舌苦
稍微收荻收縮熟首創山脉崖深究么神祕商埠商港洽賜賞殖生疏

[P]

P<I
P_U
PΓX_Z
P̂P̂
P̂K̂
P̂K̂
P̂Ẑ
P̂X̂
P̂Ĥ
PYNX
P_Z(HI₉)
P_ZH
P_ZX (但“青苔”的“苔”念
 X)
PX_X
PXX_X
PXX_X(“縮”一律念陰平)
P̂
P̂XX_X
P̂Q̂
P̂Q̂Y
P̂ĤX
P̂·N̂
P̂N̂
P̂K̂
P̂K̂
P̂K̂
P̂K̂
P̂K̂
P̂L̂
P̂L̂PX

畜。牲。
叔。疏。
通忽。
疏。疏。
远。蔬。
菜。蕪。
血。輸。
練。熟。
習。然。
期。暑。
名。署。
光。曙。
縛。束。
士。碩。
頤。衰。
微。衰。
誰。誰。
獺。水。
渠。水。
螳。水。
蛙。水。
杉。水。

P L ㄌ ㄌ̃
 P X
 P X ㄅ X L (“疏”一律念 P X)
 P X · ㄉ X
 P X U ㄣ̃
 P X ㄑ ㄑ̃
 P X T U ㄣ̃
 P ㄒ̃ ㄅ ㄌ ㄌ̃
 P ㄒ̃ T ㄌ̃
 P ㄒ̃ < ㄌ
 P ㄒ̃ ㄋ ㄌ̃
 P ㄒ̃ < X ㄋ
 P ㄒ̃ C ㄌ̃
 P X ㄗ̃ ㄗ̃
 P X ㄋ̃ ㄅ X ㄌ̃
 P X ㄋ̃ X ㄌ̃
 P X ㄌ̃ (不取 P ㄌ̃)
 P X ㄌ̃ ㄅ ㄌ̃
 P X ㄌ̃ < ㄌ̃
 P X ㄌ̃ T ㄌ̃
 P X ㄌ̃ ㄣ̃
 P X ㄌ̃ ㄋ̃ (“杉木、紫杉” 的
 “杉” 念 P Y)

[0]

0X7X2
 0X7Y
 0X7Z
 0X70X
 0X71X
 0X7.1

[P]

紫·餒·自·給·自·足
自·我·熟·詣·時·恨·惡·組·織·傾·綢·蠶·探·孔·具·床·杆·踪·迹

p̌ɸy
 p̌ɹǎ
 p̌uǐ p̌ɸx̌
 p̌x̌ɛ̃
 p̌ɣ̌ɸx̌
 p̌ɛ̃i
 p̌q̌ɸ
 p̌Lɿ̌ (“憎”一律念陰平)
 p̌Ľ
 p̌x̌·w (“組”一律念上声)
 p̌x̌ɛ̃ < i L
 p̌x̌ɛ̃ ʂ̌
 p̌x̌ɛ̃ ʂ̌
 p̌x̌ɸɬ̌
 p̌x̌q̌ɹx̌ľ (名)
 p̌x̌q̌ũ
 p̌x̌q̌ɹx̌ŋ̌
 p̌x̌q̌«q̌
 p̌x̌Ľũi

綜·合
總·括
縱·隊
縱·貫
縱·橫
粽(糉)子

財閥。創愧。暴酷。爛差。疏
草。慚。殘。殘。燦。參。粗。

法·兴·带·艘·森·速·宿·索·尿·虽·隧·隧

惡劣

呆板

益处
·
一丘之貉

軼事
軼聞
屹立
崖壑
亞麻
亞軍
亞鉛
亞熱帶
椰子
省
耀武揚威

PXŁŁŁ
 PXŁŁŁŁ
 PXŁŁŁŁ
 PXŁŁŁŁ
 PXŁŁŁŁ
 PXŁŁŁŁ (北京也說 𐰃𐰆𐰏𐰤, 不取。)

[7]

ㄅ
 ㄆ
 ㄇ
 ㄏ
 ㄎ
 ㄌ
 ㄍ
 ㄗ
 ㄘ
 ㄙ

[2]

ΔCǝ̃
 Δǝ̃Tɪ̃L̃
 Δǝ̃·ʁʁ
 Δʁ
 Δɿʁɪɿ
 Δǝ̃ʁǝ̃(“速”一律念 Δǝ̃)
 Δǝ̃ʁǝ̃
 ΔXǝ̃Tɪ̃L̃(北京又說 ΔXǝ̃
 Tɪ̃L̃,不取。)
 ΔXɿ(名)(參 31ǝ̃)
 ΔXɿʁɿ̃(“虽”不取陽平調)
 ΔXǝ̃ʁǝ̃
 ΔXǝ̃ʁǝ̃L̃

ΔXΓ(名)(參31ḫ)
ΔXΓ𐎧𐎺(“虽”不取陽平調)
ΔXḫ𐎧
ΔXḫ𐎧Xḫ

[註]

主 持 人

〔五〕

𠂇𠂇𠂇

[1]

1. 1X
1 < 1X 1X (但“貉絨”說 1X
1X)

ɿʈ
 ɿxɿ
 ɿʈɿ
 ɿʈɿ
 ɿŋŋ̃ (“亞”一律讀去聲)
 ɿʈuɿ
 ɿʈ<ɿ
 ɿʈɿʈ
 ɿ·p (“椰”不取陽平調)
 ɿ
 ɿʈɿʈɿ

鑰匙·游·油·友·右·研·筵·莞·英·應·應·應·應·用

誣陷。誣陷。舞蹈。五更。蝸牛。兒。
 我。外埠。數。外。微。小。害。危。機。急。險。反。子。巍。然。靡。縮。
 委。萎。

裝善造尾巴官勞戍惜理亂
偽·偽·偽·尾·尉·慰·衛·惋·紋·紊

蠢·快
愉·乐
娛·玉簪花
躍·進
醞·釀
佣·工
踴·躍

1 ǣ·ƿ (但“鎖鑰”說 ΔXǣUǣ)
 1 ǣU1
 1 ǣU
 1 ǣ1
 1 ǣ<1L
 1 ǣU1X
 1 ǣT1
 1 ǣ·ΔX1
 1L1U1
 1LTǔ
 1ǣ·CX
 1ǣ1X
 1ǣUǣ

[X]

Xㄅㄆ (“誣”一律讀陰平)
 XT1ㄇ
 ㄎㄌ
 ㄎㄌ (“更”不取ㄣㄌ音)
 XTㄌ
 XTㄌ (不取ㄣ音)

xə́ŋ
xə́cX
xɿTɿʑ̌
xɿŋə́
xɿu
xɿuí
xɿTɿʑ̌
xǐ́cʑ̌
xǐ́·p
xǐ́θq̌
xǐ́nǐ
xǐ́Δxɿ(但“姜”單用讀陰平，
如“气姜，买卖姜”。)

Xǐ 喜 Xǐ
 Xǐ 尸 Xǐ
 Xǐ 尸 Xǐ
 Xǐ 尸 Xǐ (不用ǐ 尸 Xǐ)
 Xǐ 尸 Xǐ
 Xǐ 尸 Xǐ
 Xǐ 尸 Xǐ
 Xǐ 尸 Xǐ
 Xǐ 尸 Xǐ

[U]

ǖǘǚ (“愚”一律念ǖ)
 ǖǘǚ
 ǖǘǚ
 ǖǘǚǘǘ
 ǖǘǚǘǘ
 ǖǘǚǘǘ
 ǖǘǚǘǘ
 ǖǘǚǘǘ

异 讀 詞 單 字 索 引

〔二画〕

〔1〕卜・ㄅㄨˇ(蘿·~)

〔三画〕

〔一〕大 ㄉㄚˋ(王)

ㄉㄚˋ(王)

〔1〕夕 ㄒㄧ(且~, 前~, ~照, ~陽, 除~)

〔四画〕

〔一〕匹 ㄆㄧˇ(布~, 馬~)

〔1〕欠 ㄑㄩㄢˋ(打哈~)

勾 ㄍㄡ(当)

尺 ㄖˇ(头~, 寸~)

〔五画〕

〔、〕宁 ㄋㄧㄥˊ(可)

〔一〕击 ㄐㄧ(伏~, 打~, 突~, 攻~, 追~, 射~, 游~)

召 ㄓㄠˋ(开~, 集~)

聖 ㄕㄨㄥˋ(感~, 号~)

〔1〕甲 ㄐㄧㄚˇ(甲子)

ㄐㄧㄚˇ(魚)

·ㄐㄧㄚˇ(指~)

卡 ㄎㄚˇ(宾椅, ~片, ~通, ~介苗, ~車)

〔1〕处 ㄘㄨˇ(罰, ~分, ~女, ~理, ~決, ~置)

〔六画〕

〔一〕百 ㄅㄞˋ(老~姓)

拍 ㄆㄞˋ(兴)

ㄆㄞˋ(帶)

朴 ㄆㄨˇ(質, ~素)

导 ㄉㄠˋ(輔~, ~体, ~师, 督~, 主~, 指~, 視~)

尽 ㄐㄩㄣˋ(小~, 大~)

朽 ㄒㄧㄡˇ(爛)

弛 ㄘㄧˇ(廢~)

戌 ㄒㄩˊ(衛~)

圩 ㄒㄩˊ(子)

〔1〕帆 ㄈㄢ(船~)

当 ㄉㄤ(适~)

吃 ㄘ(口~)

屹 ㄧˋ(立)

吁 ㄩ(呼~)

劣 ㄌㄧㄟˋ(惡~)

〔1〕兵 ㄅㄧㄥ(兵球)

兵 ㄅㄧㄥ(兵~球)

伐 ㄈㄚˋ(树, 討~)

企 ㄑㄧ(圖, ~鵠, ~望)

血 ㄒㄩㄝˋ, ㄒㄩㄝˊ

ㄒㄩㄝˊ(流~)

ㄒㄩㄝˋ(流~, 輸~, 混~兒)

色 ㄕㄟˋ(套~)

ㄗㄣˋ(退~)

危 ㄨㄟ(害~, 机~, ~急, ~險, ~亡)

伪 ㄨㄟ(裝~, 善~, ~造, 虛~)

〔七画〕

〔、〕庇 ㄅㄧˋ(包~)

究 ㄐㄩㄢˋ(竟, 追~, 終~, 查~, 深~, 研~)

灼 ㄓㄠˋ(热)

应 ㄩㄥ(許)

ㄩㄥ(里~外合, ~付, ~邀, ~用)

忘 ㄨㄥˋ(健~)

〔一〕坯 ㄅㄟ(子)

ㄅㄟ(鋼~)

壳 ㄎㄜˊ(貝~儿)

ㄎㄜˊ(甲~, 地~)

杷 ㄆㄚˊ(枇~)

坊 ㄈㄤ(牌~)

抵 ㄉㄧˇ(償~, ~抗, ~換)

尿 ㄋㄟ(糖~症, ~)

ㄋㄟ(~)

弄 ㄋㄨㄥˋ

ㄋㄨㄥˋ(堂)

劳 ㄌㄠˊ(軍, 慰~)

更 ㄍㄥ(五~)

歼 ㄐㄧㄢ(灭)

杉 ㄕㄢ(木, 紫~)

ㄕㄢ(水~)

荒 ㄨㄟ(萎)

尾 ㄨㄟ(馬~儿)

ㄨㄟ(巴)

〔1〕呆 ㄉㄞ(板)

〔1〕妨 ㄈㄤ(不~, 何~,)

ㄈㄤ(害~, ~碍)

告 ㄍㄠ(忠~)

谷 ㄍㄨˇ(雨)

角 ㄐㄩㄝˋ(鹿~菜, 号~, ~膜)

龟(黉) ㄍㄨㄟ(裂)

我 ㄨㄟ(自~)

佣 ㄩㄥ(工)

脊 ㄐㄧˇ(梁)

ㄐㄧˇ(髓)

〔八画〕

〔、〕波 ㄅㄛ(浪~, ~濤, 电~, 光~)

法 ㄈㄚˋ(儿~, ~律, ~国, ~子, 司~)

沸 ㄈㄟ(点~, ~騰, 滾~)

泌 ㄇㄧˋ(分~)

沫 ㄇㄛ(唾~)

刻 ㄎㄜˋ(字)

学 ㄒㄩㄝˋ(徒)

沼 ㄓㄠ(气~, ~澤, 池~)

〔一〕拔 ㄅㄞˋ(毒)

亞 ㄚˋ(麻~, ~軍, ~鉛, ~熱帶)

析 ㄒㄧ(解~)

·ㄒㄧ(分~)

拥 ㄩㄥ(蜂~)

拙 ㄓㄠ(口~, ~笨, ~劣, ~見)

巷 ㄒㄠ(道)

奇 ㄑㄧ(数)

苔 ㄊㄞ(舌~)

ㄊㄞ(青~)

軋 ㄎㄜˊ(鋼~)

帶 ㄉㄠ(炊~)

〔1〕怯 ㄑㄧㄟ(胆~, ~懦)

昂 ㄤ(激~)

〔1〕供 ㄍㄨㄥ(給制)

ㄍㄨㄥ(翻~, 提~, ~銷)

和 ㄏㄠ(暖~)

肪 ㄈㄤ(脂~)

舍 ㄕㄛ(宿~)

〔九画〕

〔、〕突 ㄊㄨ(变~, ~破, ~击, ~然)

李 ㄌㄧ(生)

洽 ㄔㄚˊ(和~, 商~)

室 ㄕㄨˋ(教~, ~内, ~外)

迹 ㄘㄧˋ(墨~, 古~, 絕~, 心~, 陈~, 事~, 踪~)

亲 ㄑㄧㄣˋ(家)

訂 ㄉㄧㄥˋ(裝~)

〔一〕勃 ㄅㄛ(蓬~)

括 ㄍㄨㄝˋ(統~, ~号儿, ~弧儿)

革 ㄍㄜˋ(命~, ~新, 改~)

拷 ㄎㄠ(網~, ~紗)

指 ㄓㄧ(甲)

重(头)

柞 ㄗㄠ(網~, ~蚕)

甚 ㄖㄣˋ(～么)
削 T1ㄒ(切～)
T1ㄒ(剥～,～减)
省 T1ㄒ(内～)
[1] 虻 ㄇㄥˊ(牛～)
恪 ㄎㄜˋ(～守)
哈 ㄏㄚˇ(～达)
虹 ㄏㄨㄥ
贞 ㄓㄨㄥˊ(坚～,～节,～操)
[1] 胞 ㄅㄠ(同～)
胚 ㄆㄞ(～胎)
复 ㄈㄨˊ(～杂,～辟,～习,～兴,～
診,～仇,～原,答～,恢～)
看 ㄎㄨㄥˊ(～护,～管,～守)
盾 ㄉㄨㄥˊ(矛～)
脉 ㄇㄞˊ(門～,命～,土～,山～,
診～)
侵 ㄑㄧㄣ(～略)
眚 ㄕㄞˊ(～肝儿)
射 ㄕㄞˊ(～箭)
俊 ㄐㄨㄥˊ(～,英～)

[十画]

[、] 秘 ㄇㄧˋ(便～)
ㄋㄧˋ(神～,～密,～書)
益 ㄧˋ(～处)
ㄧˋ(利～,公～)
恋 ㄌㄧㄢˋ(～爱)
疾 ㄐㄧˋ(～病)
畜 ㄒㄩˋ(～产)
ㄒㄩˋ(家～,牲～)
剖 ㄆㄡˋ(～解)
差 ㄘㄞ(～别)
ㄘㄞ(～不多,～錯)
ㄘ(参～)
容 ㄖㄨㄥˊ(～易)
紊 ㄨㄣˋ(～乱)
烙 ㄌㄜˋ(～印)
[一] 捕 ㄅㄨ(逮～)
档 ㄉㄤ(～案)
速 ㄕㄨˋ(～度)
殊 ㄕㄨ(特～)
陷 ㄒㄧㄢˋ(～坑,～落)
获 ㄏㄨㄟ(拿～,虜～,～得,收～)
连 ㄌㄧㄢˊ(～宗,～陰天)
逦 ㄌㄩㄣˊ(驅～,～步,～漸,～一,
追～)
辱 ㄖㄨˋ(耻～,～罵,～沒,榮～)
索 ㄙㄞˋ(～性)
[1] 映 ㄧㄥˋ(海～)
蚌 ㄅㄥˋ(蛤～)
骨 ㄍㄨ(～头)

《ㄒ(～肉,～髓)
虽 ㄕㄨㄟ(～然)
[1] 徊 ㄏㄨㄞ(徘徊～)
婉 ㄨㄢˋ(分～)
息 ㄒㄧ(貼～)
矩 ㄐㄩ(～形)
·ㄐㄩ(規～)
俱 ㄐㄩ(～乐部)
脂 ㄓㄧ(～肪,油～)
秩 ㄓ(～序)
嫫 ㄌㄩ(～乐)

[十一画]

[、] 港 ㄍㄤ(海～,商～)
混 ㄏㄨㄣˊ(～凝土,～合,～淆,～血
兒,～杂)
寂 ㄐㄧˋ(～寞,沉～)
[一] 菌 ㄐㄩㄣ(病～,黴～,杆～,細～)
ㄐㄩㄣ(～子,香～)
菠 ㄅㄛ(～菜)
埠 ㄅㄨ(～头,商～,外～)
逮 ㄉㄞ(～捕)
豉 ㄕㄩ(豆～)
隄 ㄉㄧ(～防,～岸,河～)
堆 ㄉㄨㄟ
理 ㄌㄩ(～会,紋～)
勘 ㄎㄢ(～察,校～,查～)
械 ㄒㄩㄟ(机～,器～,～門)
戚 ㄑㄧ(亲～)
雪 ㄒㄩㄟ(～白)
尉 ㄨ(～官)

[1] 惜 ㄒㄧ(不～,可～,珍～,惋～)
悼 ㄉㄠˋ(～念,誌～,追～)
雀 ㄑㄩㄟ(～盲眼)
ㄑㄩㄟ(～斑,～盲症)
ㄑㄩㄟ(孔～)
崖 ㄧㄢ(山～,～鹽)
匙 ㄕㄧ(鑰～)
[1] 巢 ㄠ(老～,卵～,～穴)
剥 ㄅㄠ(～削)
ㄅㄠ
借 ㄐㄧㄟ(～同)
偵 ㄓㄨㄟ(～探,～緝,～察)
緇 ㄕㄞ(支～)
組 ㄗㄩ(～織)

[十二画]

[、] 途 ㄊㄨ(半身不～)
診 ㄓㄣ(門～,復～,急～,～脉,～
疗,～治,出～)
渠 ㄑㄩ(溝～,水～)
窘 ㄐㄩㄣ(～迫)

焰 ㄧㄢˋ(火～)
[一] 殖 ㄓ(繁～,～民,生～)
殘 ㄘㄢˊ(～暴,～酷)
搭 ㄉㄚ(～救)
期 ㄑㄧ(短～,～刊,限～,時～,
暑～)
場 ㄇㄤ(冷～)
間 ㄐㄧㄢ(～斷,～接)
落 ㄌㄜˋ
ㄌㄜˋ(～花生)
疏 ㄕㄨ(～通,～忽,～远,粗～)
·ㄕㄨ(荒～,生～)
强 ㄑㄩㄢ(～渡,～制)
ㄑㄩㄢ(勉～)
琶 ㄆㄚ(琵琶～)
蒂 ㄉㄧ(芥～)
萎 ㄨㄟ(～縮)
植 ㄓ(～树,种～)
棲 ㄑㄧ(兩～)
揩 ㄎㄞ(～油)
搽 ㄘㄞ(～粉)
軼 ㄧ(～事,～聞)
違 ㄨㄟ(～反)
[1] 晰 ㄒㄧ(明～)
幅 ㄈㄨ(～儿)
唾 ㄊㄨㄟ(～沫)
量 ㄌㄩㄢ(～入为出)
黑 ㄏㄟ(～豆)
嵌 ㄑㄧㄢˋ(～金,～入,鑲～)
蛭 ㄓ(水～)
愉 ㄩ(～快)
跌 ㄉㄟ
[1] 傍 ㄅㄤ(～晚)
遍 ㄅㄧㄢˊ(～地)
創 ㄘㄨㄢ(重～,～伤)
ㄘㄨㄢ(～举,～始,～造,～作,
首～,草～)
給 ㄍㄧ(补～,配～,供～制,～予,
自～自足)
傀 ㄍㄨㄟ(～儡)
筑 ㄓ(建～)
鈔 ㄘㄞ(～票)
簾 ㄌㄧㄢ(～席)
答 ㄉㄚ(～理,～应)
ㄉㄚ(～复)
怨 ㄩㄢ(～罰,～戒)

[十三画]

[、] 廈 ㄏㄚˋ(大～)
塑 ㄕㄨ(雕～)
梗 ㄍㄥ(～米)
痴 ㄕㄧ(～心)

詣 ǐ(造~)
 [一] 較 ㄐㄧㄠˋ(比~, ~量)
 辟 ㄅㄧˋ(復~)
 珥 ㄦㄣˇ(玳~)
 載 ㄘㄞˋ(登~, 記~)
 ㄘㄞˋ(搭~, 裝~)
 携 ㄒㄧˊ(帶~, ~手)
 森 ㄙㄣ(~林)
 隔 ㄍㄜˊ(~, ~夜)
 馴 ㄒㄩㄣˋ(順~, ~養)
 [一] 署 ㄕㄨˋ(部~, 連~, ~名)
 跚 ㄕㄢ(~子)
 蛻 ㄊㄨㄟˋ(變~, ~化)
 暖 ㄋㄨㄢˇ(和~)
 暇 ㄒㄧㄚˊ(閒~)
 椰 ㄧㄝ(子~)
 愚 ㄩ(蠢~)
 [一] 鉞 ㄩㄣˋ(饒~)
 傾 ㄑㄩㄥ(向~, 左~)
 觸 ㄔㄨˋ(感~, 接~, ~角, ~覺)
 筌 ㄑㄩㄢ(字~)
 微 ㄨㄟ(稍~, 衰~, ~小)
 貉 ㄏㄜˊ(一丘之~)

[十四画]

[、] 痺 ㄅㄧˊ(麻~)
 熄 ㄒㄧ(燈~)
 棕(櫚) ㄘㄨㄣˋ(子~)
 誣 ㄨ(賴~, 陷~)
 [一] 摘 ㄓ(指~)
 凳 ㄉㄥˋ(板~)
 敷 ㄘㄨ(不~, ~用, 外~)
 蓓 ㄅㄟ(苗~)
 碩 ㄕㄨㄛˋ(士~)
 酵 ㄎㄧㄠˋ(發~, ~母)
 隧 ㄊㄨㄟˋ(道~, ~洞)
 [一] 暴 ㄅㄠˋ(露~)
 閥 ㄘㄨˊ(軍~, 學~, 財~)
 閩 ㄇㄧㄣ(薑~, ~劇)
 蜥 ㄒㄧ(蜴~)
 慚 ㄘㄢ(愧~)
 慨 ㄎㄞˋ(憤~, 感~)
 [一] 嫩 ㄋㄨㄣˋ(面~)
 膊 ㄅㄨ(脰~)
 膜 ㄇㄛˊ(骨~炎)
 綜 ㄘㄨㄣˋ(合~)

[十五画]

[、] 摩 ㄇㄨ(撫~)
 調 ㄊㄠˊ(皮~)

誼 ㄩˋ(厚~, 友~)
 潰 ㄘㄨㄟˋ(爛~)
 膾 ㄏㄞˋ(腹~)
 潛 ㄑㄧㄢˊ(在~)
 熟 ㄕㄨˊ
 ㄕㄨˊ(練~, 習~, 早~, 成~, 純~)
 誰 ㄕㄨㄟ
 視 ㄕㄨˋ(奪~)
 褐 ㄏㄜˊ(色~)
 [一] 播 ㄅㄨ(音~, 廣~, 轉~, 春~)
 趣 ㄘㄨˋ(沒~兒)
 髮 ㄈㄞˋ(理~)
 暫 ㄘㄨㄣˋ(時~)
 藏 ㄘㄨㄤ(室~)
 [一] 蝻 ㄘㄢˇ(蝗~)
 膚 ㄘㄨ(皮~, ~淺)
 憎 ㄘㄨㄥ(恨~, 惡~)
 賜 ㄘㄩˋ(賞~)
 蝸 ㄨ(牛兒~)
 [一] 僻 ㄅㄧˋ(靜~)
 楫 ㄓㄧ(通~, 偵~)
 ㄘㄧ(鞋口~)
 質 ㄓㄨˋ(本~, ~量, 品~, 朴~, 對~, ~問, 實~)
 餒 ㄋㄨㄢˋ(氣~, 自~)
 締 ㄊㄧˋ(結~, 交~, 取~)
 蔬 ㄕㄨ(菜~)
 創 ㄘㄨㄟˋ(子手~)

[十六画]

[、] 諷 ㄈㄨㄣˋ(刺~, 譏~)
 [一] 樨 ㄒㄧ(木~)
 輻 ㄘㄨˋ(條~, 射~)
 輯 ㄓㄧ(遲~)
 橙 ㄘㄨㄥˊ(子~)
 蕾 ㄌㄞˋ(花~)
 薄 ㄅㄠˋ(淡~, 稀~)
 ㄅㄠ
 樞 ㄕㄨ(雪~)
 避 ㄅㄟ(雨~)
 醞 ㄩㄣˋ(醉~)
 [一] 螳 ㄕㄨ(水~)
 嶼 ㄩˋ(島~)
 縛 ㄘㄨˋ(束~)
 頹 ㄊㄨㄟˋ(廢~, 唐, 衰~)

[十七画]

[、] 瀑 ㄅㄠˋ(布~)
 濤 ㄊㄠ(波~)

燦 ㄘㄢˋ(爛~)
 [一] 孺 ㄖㄨˊ(婦~)
 臀 ㄊㄨㄣˋ(部~)
 藉 ㄓㄧˋ(狠~)
 臂 ㄅㄧˋ(膀~)
 [一] 蚌 ㄅㄢˋ(螺~)
 曙 ㄕㄨˋ(光~)
 蹈 ㄊㄠˋ(舞~)
 [一] 儲 ㄔㄨˊ(備~, 金~, 蓄~, 藏~)
 縮 ㄕㄨㄣˋ(收~, 萎~)
 績 ㄓㄧˋ(功~, 戰~)
 縱 ㄘㄨㄣˋ(隊~, 貫~, 橫~)
 膿 ㄋㄨㄣˋ(潰~)

[十八画]

[、] 謬 ㄇㄧㄟˋ(乖~, 刊~)
 [一] 簪 ㄘㄢ(玉~花~)

[十九画]

[、] 靡 ㄇㄧ(委~)
 識 ㄕㄧˋ(相~, 常~, ~貨, ~字)
 [一] 轍 ㄘㄨㄟ(復~)
 鵲 ㄑㄩㄝˋ(喜~)
 [一] 纈 ㄒㄧㄟ(旱~, 水~)
 縊 ㄓㄧ(繩~)

[廿画]

[一] 馨 ㄒㄧㄣ(香~)
 [一] 蠕 ㄖㄨˋ(動~)
 螻 ㄌㄨ(尺~)
 耀 ㄩˋ(榮~, ~武揚威)
 巍 ㄨㄟ(然~)

[廿一画]

[一] 露 ㄌㄨˋ(頭~)
 ㄌㄨˋ(骨~)
 [一] 髓 ㄊㄨㄟˋ(骨~, 脊~)
 躍 ㄩㄟ(飛~, 跳~, ~進, 踴~)

[廿二画]

[、] 顛 ㄊㄧㄢ(發~, ~動)
 颯 ㄕㄞˋ(空~, 抄~)

[廿四画]

[一] 鑿 ㄘㄨㄟˋ(確~, 穿~)
 [一] 驟 ㄘㄨㄟˋ(步~)

[廿五画]

鎗 ㄑㄨㄤ(匙~)

[廿七画]

鑽 ㄘㄨㄢ(探~)
 ㄘㄨㄢ(孔~, 具~, 床~, 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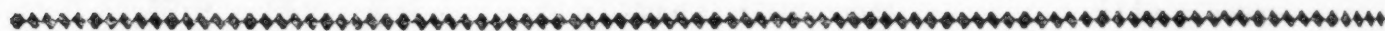
本国地名审音表初稿

- 一、本表所收地名以县、市的名称为主，共收地名 170 个，逐条注明审訂的讀音，按音序排列。
- 二、地名的本地讀音，如果在音系上跟北京音是相当的，一概以北京音为准。例如“鄆县”的“鄆”，本地讀 $ní$ ，北京讀 $ní$ ，“略陽”的“略”，本地讀 $hú$ ，北京讀 $hú$ ，都是有規律的对应，所以本表照北京音把“鄆县”訂为 $ní$ ，“略陽”訂为 $hú$ 。这类地名，本表只选收了一部分，并未全部收入。
- 三、凡地名某字在历史上有一定的特殊念法而現在本地音和它相合的，一概“名从主人”，不加改动，例如：“綏山”讀 $shuí$ ，不讀 $kuí$ ；“解虞”讀 $tiě$ ，不讀 $xiě$ 。
- 四、凡地名某字在历史上有一定的特殊念法而現在本地音和它不合的，也按“名从主人”的原則，把本地实际的讀法按照方言跟北京音的对应規律，訂出普通話的讀法。例如：把“荷澤”訂为 $hé$ ，“費县”訂为 $fèi$ 。
- 五、难認的地名，例如“整屋” $zhěng$ ，“渦陽” $wū$ ，本沒有审訂的必要。为了一般讀者的便利，本表也收了一些这类地名，注上了讀音。

亳县 (安徽)	$hú$	屯留 (山西)	$tū$	华陰 (陝西)	$huá$
百色 (广西)	$bá$	訥河 (黑龙江)	$nè$	获鹿 (河北)	$huò$
柏乡 (河北)	$bǎi$	宁蒗 (云南)	$níng$	琿春 (吉林)	$hǎn$
北碚 (四川)	$běi$	乐亭 (河北)	$lè$	黄陂 (湖北)	$huáng$
蚌埠 (安徽)	$bàng$	乐陵 (山东)	$lè$	潢川 (河南)	$huáng$
泌陽 (河南)	$mì$	乐山 (四川)	$lè$	湟源 (青海)	$huáng$
鄆县 (陝西)	$ní$	耒陽 (湖南)	$lěi$	晃县 (湖南)	$huàng$
鄆陽 (江西)	$ní$	閬中 (四川)	$kàng$	即墨 (山东)	$jí$
邳县 (江苏)	$pī$	溧水 (江苏)	$pǐ$	薊县 (河北)	$jī$
番禺 (广东)	$pān$	临朐 (山东)	$lín$	邙县 (河南)	$máng$
郫县 (四川)	$pī$	临猗 (山西)	$lín$	將乐 (福建)	$jiāng$
莆田 (福建)	$pǐ$	酃县 (湖南)	$líng$	涇县 (安徽)	$jīng$
蒲圻 (湖北)	$pú$	雒南 (陝西)	$luò$	井陘 (河北)	$jǐng$
鄆县 (陝西)	$ní$	漯河 (河南)	$luò$	莒县 (山东)	$jǔ$
鹽源 (青海)	$yán$	灤县 (河北)	$lán$	句容 (江苏)	$jù$
沔县 (陝西)	$miǎn$	略陽 (陝西)	$lù$	筠連 (四川)	$jūn$
瀋池 (河南)	$shěn$	高要 (广东)	$gāo$	鄆城 (山东)	$yún$
閩侯 (族) (福建)	$mín$	皋蘭 (甘肃)	$gāo$	棲霞 (山东)	$qī$
穆稜 (黑龙江)	$mù$	流陽 (安徽)	$liú$	蕪江 (四川)	$wú$
佛坪 (陝西)	$fó$	崞县 (山西)	$guò$	蕪春 (湖北)	$wú$
費县 (山东)	$fèi$	貴筑 (貴州)	$guì$	海陽 (陝西)	$hǎi$
汾陽 (山西)	$fén$	冠县 (山东)	$guān$	乾县 (陝西)	$qián$
鄆县 (陝西)	$ní$	珙县 (四川)	$gōng$	乾宁 (四川)	$qián$
涪陵 (四川)	$fú$	喀什 (新疆)	$kā$	犍为 (四川)	$jiān$
大埔 (广东)	$dà$	岢嵐 (山西)	$kě$	沁水 (山西)	$qìn$
大城 (河北)	$dà$	和闐 (新疆)	$hé$	邛崃 (四川)	$qióng$
條县 (广东)	$tiáo$	和碩 (新疆)	$hé$	曲沃 (山西)	$qū$
碭山 (安徽)	$tàng$	荷澤 (山东)	$hé$	西峽 (河南)	$xī$
磴口 (甘肃)	$dèng$	郃陽 (陝西)	$hé$	鱣水 (貴州)	$chǎn$
东阿 (山东)	$dōng$	海澄 (福建)	$hǎi$	隰县 (山西)	$xí$
东莞 (广东)	$dōng$	邯鄲 (河北)	$hān$	厦門 (福建)	$xiá$
郅城 (山东)	$zhì$	邗江 (江苏)	$hān$	解虞 (山西)	$tiě$
天台 (浙江)	$tāi$	鄆县 (陝西)	$ní$	新乐 (河北)	$xīn$
		桦川 (黑龙江)	$huá$	新淦 (江西)	$xīn$

陰平)

崇陽 (河南)	TILIX	對善 (新疆)	PQPQ	耀縣 (陝西)	IZTIX
盱眙 (江蘇)	TUI	莘縣 (山東)	PXTIX	鄆陵 (河南)	IQXIL
淑浦 (湖南)	TUXX	深圳 (廣東)	PXUX	焉耆 (新疆)	IQXI
柘邑 (陝西)	TUXI	嵯縣 (浙江)	PZTIX	鉛山 (江西)	IQPQ
浚(滑)縣(河南)	TUXTIX	流陽 (江蘇)	PXIX	郟城 (河南)	IQXIL
懿屋 (陝西)	UXUX	日喀則(西藏)	QYYPZ	鄆縣 (浙江)	IXTIX
湛江 (廣東)	UXUXIX	婁光 (新疆)	QXZKIX	應縣 (山西)	IZTIX
貞丰 (貴州)	UXUL	秭歸 (湖北)	PXIX	漾濞 (雲南)	IXXI
鎮賚 (吉林)	UXUX	柞水 (陝西)	PXZPXI	吳堡 (陝西)	IXXI
長子 (山西)	UXIX	樅陽 (安徽)	PXLIIX	武陟 (河南)	IXXI
諸暨 (浙江)	UXUXI	三穗 (貴州)	IXIXI	婺川 (貴州)	IXIXI
茌平 (山東)	IXIL	莎車 (新疆)	IXIXI	尉氏 (河南)	IXIXI
茶(茶)陵(湖南)	IXIXIL	睢寧 (江蘇)	IXIXIL	晚町 (雲南)	IXIXIL
柘縣 (湖南)	IXTIX	濉溪 (安徽)	IXXTI	園鄉 (河南)	IXXTIIX
澄迈 (廣東)	IXIXI	睢縣 (河南)	IXXTIX	汶上 (山東)	IXIXI
澄海 (廣東)	IXIXI	綏稜(楞)(黑龍江)	IXIXIL	零都 (江西)	IXIXI
澄城 (陝西)	IXIXIL	愛輝 (黑龍江)	IXIXI	于闐 (新疆)	IXIXI
長汀 (福建)	IXIXIL	黟縣 (安徽)	IXIXI	尉犁 (新疆)	IXIXI
常熟 (江蘇)	IXIXI	沂水 (山東)	IXIXI	蔚縣 (河北)	IXIXI
什邡 (四川)	IXIXI	嶧縣 (山東)	IXIXI	乐清 (浙江)	IXIXIL
石埭 (安徽)	IXIXI	崖縣 (廣東)	IXIXI	越嶲 (四川)	IXIXI
歙縣 (安徽)	IXIXI	掖縣 (山東)	IXIXI	鄖縣 (湖北)	IXIXI
單縣 (山東)	IXIXI	叶縣 (河南)	IXIXI	鄆城 (山東)	IXIXIL



(接 16 頁)

思主义,这难道不是他一貫地堅守住資產階級立場,在进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种种活动嗎?

現在,他很狡猾,不肯徹底交代,低頭認罪。他還以“學者”自居,還念念不忘于大本書,自己認為有“學術上的成就”,認為“後來居上”,在過去學者的成績上“画蛇添足”地或者是“佛头着粪”地加上一分兩分。總之,他覺得還有一些永遠用不完的本錢,別人為反右派斗争而忙,為改造自己、鍛煉自己而忙,他還可以安心做一個右派分子的冒牌學者,悠然自得,頑強抗拒;還在夢想資本主義復辟,他可以“东山再起”。我們今天必須揭穿這種右派分子的画皮,不許他們玷污“學者”這兩個字。事實上,陳夢家飛黃騰達得太容易了,他在哪一方面配稱得上“學者”與“專家”?這個善于投机取巧、鑽空子、恬不知耻的右派分子野心家、市儈和騙子,假如自己還認為要算“學者”或“專家”的話,我們可

以讓他提出証据來,讓我們來痛痛快快地爭論一番。

歷史是無情的,在我們的社會里,絕大多數人堅決跟着共產黨走,前途是偉大而光明的,但在一小撮野心家、市儈和騙子面前,却只有死路一條,決沒有“东山再起之望”了。讓他們看一看高尔基的《小市民》吧!他們如果想死里逃生,必須趕快低頭,向人民服罪,這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他們還有一點小聰明,就應該革面洗心,脫胎換骨,從頭學習,從新做人。社会主义道路的門還是敞開着的,陳夢家的年紀不小也不太大,如果放下屠刀,下決心改變立場,老老实实地學習,也未嘗沒有做一個真正“學者”的可能,這就在於他自己的最後選擇了。

本期版面拥挤,“書刊評介”暫停。

本刊編輯部

关于少数民族語言中新詞術語的問題

傅 懋 勤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八年来，各族人民形成了空前的团结和频繁的交往。新的事物、新的概念给汉族和各兄弟民族带来了大批的新詞術語。这些新詞術語丰富了我們各民族的語言，增强了这些語言在人們交际和社会斗争中的功能。“新詞”就是一种語言的詞匯里原来沒有而新增加进来的詞，“術語”是各个專門行業和社会集团使用的帶有專門性的詞。術語当然也有原来就有的，也有新增加的。新增加的術語也是新詞的一部分。由于科学技术的日益推广，文化教育的逐渐普及，工人、农民、知識分子的紧密联系，以及工業、農業和商業的迅速发展，一部分專門術語也会逐渐地成为全民使用的新詞。例如：“車間”本来是工厂里使用的術語，“工分”本来是農業社使用的術語，“原子能”本来是科学技术的術語，現在都已經成为全民詞匯的組成部分了。我在本文里着重討論在兄弟民族語言里全民生活中新建立的詞和較有普遍性的術語。至于大批的專門術語應該由各專門行業和語言科学工作者会同起来，根据全民語詞的結構原則和業務上的特殊需要去整理研究。

近年来，我国各少数民族的語言文字，随着人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生活上日益增長的需要，都有了很大的發展，这种發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 1) 原来沒有文字的，創制了文字。
- 2) 原来有文字而不能很好地适应現代社会發展的需要，在原有文字基础上做了改进，或另行創制了新文字。
- 3) 語言的各方面起了变化，表达手段日漸精密，并且由紛歧趋向规范。特別在新詞術語的加速增長方面，表現得更为突出。
- 4) 扩大了本族語言文字的使用范围；編譯出版了許多書刊報紙；民族的自治机关使用自己的語言文字行使职权。在民族学校里，除漢語文外，逐漸地使用本族語文的課本来进行教学。有些民族在积极准备或已经开始用本族文字扫除文盲。

事实上，1) 2) 4) 三項都和 3) 項的新詞術語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使用文字就离不开新詞術語，新詞術語得不到很好的解决，詞匯的规范以及書写和讀音的规范，也不能全面而适当地确立起来。同时，在編譯出版工作里也会經常遇到一些概念不知怎样表达，或遇到一些詞無所适从，或者造成混亂不统一的現象，甚至因用詞不当而引起誤解。根据各方面的反映，目前在

新詞術語的工作方面存在着以下四个缺点：

1) 有些詞义不恰当——这是指有些詞不能正确地表达所要表达的意义。例如：云南的某些語言里，曾經把“斗争”說成“打架”。这样，和誰或什么斗争就是要和誰或什么打架了。又如：去年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用和平协商的方式进行社会改革的时候，有些干部向农民交代政策，把“和平”說成“len-ipeN”，其实这个詞是“平等”的意思，跟“和平”的意思相差很远，后来發現了，才改正过来。在貴州的某些布依族地区，也曾經把“統購統銷”說成“卖去买求”，引起群众对政策的誤解。

2) 同一个意义用詞不一致——同一种語言的編譯工作者因缺少联系和商討，有时对同一个概念不必要地使用几种不同的說法。这种情况甚至还出现在同一个文件当中。如果两种語言不同，必然有些詞在表达概念的範圍和用法上是不一致的。这就会产生同一个概念在某种語言里用一个詞表达而在另一种語言里用几个詞来表达的現象。特別是描写性的詞、動詞、連詞、介詞和助詞难免有这些現象。这是不可避免的。例如：漢語“騎馬、騎腳踏車”可以用“騎”，但是不能說“騎船、騎汽車、騎火車、騎飞机”。到傣語里却不管是“馬、車、船、飞机”一律用“xi4”。这就不應該勉強求得一致。可是，在同一种語言里，除了为丰富表达手段使用一些同義詞以外，用詞最好避免不必要的紛歧。不必要的紛歧只会給标准語帶來混亂并且增加學習和使用的負担。例如：維吾爾語“青年团”既用“ياشلар иттипак”，也用“ياشلар союзи”，同是一个“領導者”，用了“йолбашчи”、“йетәкчи”和“рәһбәрчи”①三个詞。这完全可以選擇并确定其中的一个，以节省學習和閱讀的勞力。

3) 有些詞义不好懂——新詞術語的正确了解和使用是跟使用者的政治和文化水平有联系的。虽然，一般地說，許多新詞術語要經過學習才能徹底了解它們的意义和用法，但是制造許多难懂的詞，甚至抛弃了在人民群众当中已經通用的詞而另外借入或創制一些难懂的詞也是不妥当的。例如：我国蒙族已經懂得久已由漢語借来的“иуваншувай”②（元帅）和“жийангжи-

① 为排印方便，本文所引維語例子是用俄文字母轉写維文， q 代表 [q']。

② 为排印方便，本文所用蒙語例詞是用俄文字母轉写蒙文。 нг 代表舌根鼻音。

йун”(將軍),現在又有人引進大家不熟悉的俄語:“маршал”和“генерал”。這對於我國蒙族人民群眾來說,自然是難懂的詞了。

4) 新詞術語的數目還不能適應需要——這種情況特別表現在沒有文字的語言、文字歷史較短或新建立文字的語言上。由於新詞術語的數目太少,民族語言的口譯和筆譯以及編寫工作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舉例子來說,現在有許多建立了自治州的民族,還很難用自己的語文來翻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又如,當我和幾位雲南佤族的同志翻譯政府發到國外的“安全回家証”的時候,也遇到很大的困難。這個安全回家証上主要只有三句話,我們竟費了三天才勉強把它譯成佤文。如果翻譯自然科學的書籍,在絕大多數民族的語言里,都要遇到困難,甚至對許多民族語言來說,這在目前還是不可能的。產生這些情況的主要原因就是新詞術語的數量距離實際需要太遠。

以上四項缺點,1) 2) 3)是屬於“質”的,4)是屬於“量”的。這些缺點都是在語文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我們應該找出產生這些缺點的原因,以便及時消滅這些缺點。

我覺得產生這些缺點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項。

第一,有些語文工作人員在創制語詞和借貸語詞這兩種豐富語言的手段上,走了兩個極端。一個極端是不問運用本族語言的材料是不是能表達,一遇到新概念就借用漢語、俄語或其他語言的詞。這樣就會使新借詞的分量在一個文件上占的比重太大,對於那些不懂漢語、俄語或其他借出語言的廣大群眾來說,很難了解;另一個極端是不考慮或很少考慮由漢語或其他語言里借入新詞,不管什麼新概念,都一律用本族語言材料來表達。由於大量的新概念的輸入,原有語言材料,不管它有多么豐富,必然有些概念在本族語言里找不到合適的詞或合適的辦法來表達。正因如此,任何語言都不可避免地有一些借詞。如果完全不考慮借入這個方式,就會使許多新創制的詞的意義不恰當或甚至引起很大的誤解。有的編譯工作者,甚至連早已在人民群眾中生了根的借詞,也放棄不用,另行創制對於群眾陌生的詞,這自然會脫離群眾,甚至引起群眾對新文字的不滿。

以上所說的兩種極端,對於新詞術語的發展都有妨害。事實上,用自己的語言材料創制和由別的語言里借入新詞術語都是豐富語言的手段。這兩種手段對任何語言都可以使用。有人說,“某些語言是不可滲透的,借詞進不去。”我認為沒有不可滲透的語言。蘇聯境內有印歐語系、阿爾泰語系、伊比里-高加索語系、古亞語系、芬蘭-烏格爾語系和閃語系的語言,在這不同語系的一百多種語言里都有數量不同的一些俄語借詞;我國漢語以外還有漢藏語系、阿爾泰語系、南亞語系、印歐語系的許多語言和朝鮮、高山等語言,在這

些語言里,也都是一些漢語借詞。這可以說明,絕對不能滲透的語言是不存在的。借詞只有程度的差別,有的借的多些,有的借的少些。而這種多少的數量,基本上並不決定於語言的特點,而主要決定於兩個民族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相互影響的程度。因此,對這一問題的正确處理,也應該主要根據民族間相互影響的程度和這種程度在具体語言里反映的實際情況,不應該只根據個人的主觀愛好和願望。

第二,沒深入挖掘本族語言的詞匯和研究人民群眾口語里借詞的使用情況。我們目前對各民族語言現有的詞匯,搜集、整理、研究的工作,做得還很不够。有許多新的概念,本來可以在深入挖掘並研究本族語言詞匯的基礎上,找到解決的辦法,可是由於沒深入挖掘原有口頭的和書面的詞匯,對原有具体語詞的知識不足,對構詞法也不能很好地掌握,就沒能使這一問題得到完善的及時的解決。同時,有一些新詞術語是少數編譯工作同志坐在屋裡想出來的,而不是在新詞術語反映在廣大人民群眾口語的基礎上,加以整理提高的。這就會使我們在出版物裡出現一些和人民群眾口語不一致或很難為廣大人民群眾了解和接受使用的新詞術語。

第三,沒有系統地、比較全面地研究新詞術語。過去在編譯工作中往往是遇到一個詞就解決一個詞,沒能把有關聯的詞統一起來考慮解決。這就使新詞術語的工作限於被動,也就會產生用詞不當、用詞不好懂和經常改變詞的意義和用法的毛病。再加上各地編譯工作同志,沒能加強聯繫並坐在一處討論共同的問題,也就產生了同一種語言各地用詞不一致,甚至同一個文件也有用詞不一致的現象。今後應該多開一些討論新詞術語的會議,爭取工作中的主動性,把有關聯的語詞一組一組地放在一起討論。例如:“法律、法則、法制、規律、規則、規程、條例、憲法”等詞,做為一組來考慮,“人民、公民、國民、市民”做為一組,“鬥爭、競爭、競賽、爭辯、爭論、辯論”做為一組。當然哪些詞在一組,不能完全根據意義的接近,還要參考本民族語言的構詞規則。往往各組中間還有一些詞是相互牽制的。

新詞術語問題在各民族語言里,有些是共同的,有些是特殊的。因此,要正确地解決這一問題,最好先廣泛地討論,確定一些共同的基本原則;然後各種語言的工作同志再參考這些原則並根據自己語言的具体情况以及這種語言和其他民族語言的關係,來擬訂出制訂各種語言新詞術語的規則。我在这兒,根據同志們現有的經驗,初步地歸納出五項建立新詞術語的原則,供同志們討論研究這個問題的參考。

(1) 如果從本族語言的材料里能找到適當的辦法來表達,就用自己的固有的詞或早期的借詞和語法成分

来创制。创制的方法有三：

A) 在原有語言里找現成的詞而給它新的意义——例如：云南西双版纳傣語里，*sǎ̌nam*^① 是“議事庭”的意思。現在議事庭的制度已經取消，傣族人民群众很自然地就用它来表达“政府”这个新概念。也有人怀疑这种办法并且耽心傣族人民群众把旧的“議事庭”和新的“政府”等量齐观。我想，即使对某些人有这种可能，也是暫时的。事实上，他們从我們人民政府的具体工作中，已經很快地体会到这个旧詞在意义上已經起了变化，并且具有了新的意义。詞的意义随着社会的發展而变化，在各种語言里都是常有的現象。如果在日常生活里旧意义已經消失而具有了新意义，也就可以認為这是创制了一个新詞。标准語里沒有而方言里有合适的詞，也可以选用。

B) 运用原有的詞和不能独立的詞素或再加語法成分，按照自己的構詞規則構成新詞——例如：广西僮語 *həŋ* 和 *buk* 都是“大”的意思，現已把这两个詞合起来成为 *həŋ buk*^②，表示“偉大”的意思。又如維吾尔語在名詞后边加上構詞成分 *вазлик* 構成：

kəfəz 紙——*kə əzważlik* 文牘主义

иш 事——*ишвазлик* 事务主义

гуруһ 派別——*гуруһвазлик* 宗派主义

C) 参考漢語或其他語言的詞义，按照自己的語法規則，翻譯成詞——例如：僮語里本來沒有相当于漢語“水庫”的詞，現已用翻譯的方式創制了 *əŋzromrəŋɕ*，*əŋzrom* 意为“倉庫”，*rəŋɕ* 意为“水”，因为按照僮語語法構造，限制的名詞要放在被限制的名詞的后边，所以“倉庫——水”，就成了“水的倉庫”，也就成了“水庫”的意思了。也可采取半借半譯的办法，例如：凉山彝語 *dalchol* (大槍)“砲”。^③

(2) 如果运用本族語言的材料沒有适当的方法来表达，可以从漢語或其他关系密切的語言音譯过来。这就是通常所說的借詞。借詞的書写形式，一般有以下三个办法：

A) 按照借入民族一般人民群众的讀音来写，完全服从借入語后的語音規則。——例如：維吾尔語借漢語“辣子”，写成“*Лаза*”，借漢語“桌子”，写成“*жоза*”。

B) 完全按照借出語言的語音来写，如果两种語言的字母相同，或專为借詞增補了借出語言所用的字母，在字形上也写得完全一样。例如：苏联境内有許多民族文字，把新的俄語借詞写得和俄文一样，把“語法”写成 *грамматика*，把“革命”写成 *революция*。

C) 既根据本族語言的語音系統，也适当地照顧到借出語言的語音，这是 A) 和 B) 的折中办法。我国現代維吾尔标准語处理新的漢語和俄語借詞，就用这种办法。例如：借漢語的“汉族”写成 *Хэнсу* (維吾尔語里沒有 *цз* 音，写成 *с*)；借俄語的“Большевик”(布尔什

維克)写成 *Болшевик* (我国阿拉伯字母形式的維吾尔文里沒有軟音符号，就省去了 *ь*)。

以上借詞書写的三个办法究竟采用哪个好，要根据民族关系和語言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如果两个民族的交往关系很密切，語文需要互相学习，字母形式相同就可以考虑用 B) 項办法；如果字母形式不同，語音系統又相差很远，也可考虑用 A) 或 C) 項办法。在我国多民族的大家庭里，漢語已經逐漸成为各民族的交际語，各兄弟民族多年来已經从漢語里吸收了许多語詞。我在这兒專就在兄弟民族語文里書写漢語借詞的問題，提出以下四項有关的办法：

第一，如果語音系統和漢語相差太远，不必專为拼写漢語里有而本族人民群众不能發的語音增加很多字母，可以基本上按照在本族語言里所發漢語借詞的語音来書写。例如，在新建立的僮族标准語里，不能發漢語标准音的 *ㄉ、ㄊ、ㄓ、ㄔ、ㄕ、ㄖ、ㄗ、ㄘ、ㄙ、ㄎ、ㄌ* 等十三个音，如果在僮文里把这些音都照漢語写出来，就得專为写借詞里这一些僮族人民群众所不能發的語音增加許多个字母，这将給僮文学习和使用上增加了很重的負担，不如就按照僮族人民实际所能讀的音来書写。这样，既不需要增加許多字母，也和人民群众的口語相結合。不过，漢語借詞在僮語各个方言土語里，也有讀音不一致的現象，这就可以参考僮語标准音和方言的情况以及鄰近漢語和漢語标准音的情况，略作調整，使書写借詞有一定的規則。这些規則都要明确地規定在僮文正字法里。

第二，在少数民族鄰近地区的汉族沒普遍使用漢語普通話以前，制訂少数民族文字里漢語借詞書写規則的时候，要多参考对他們影响最大的鄰近的漢語。最好当漢語普通話在他們鄰近地区普遍推广而且对兄弟民族語言起了一定影响的时候，再考虑按照漢語普通話的語音吸收借詞。不然，就会脫离开他們实际的語言环境，結果很难行得通。例如，海南島黎族周圍的漢語环境現在还不是普通話而是和普通話相差很远的海南漢話。黎族語言里的漢語借詞很自然地就从这种海南漢話里吸收。“合作社”海南漢話說 *gap-do-de*，黎語也說 *gap-do-de*，黎文也就應該写 *gapdode*^③，因为这样写对他們說，更亲切、更容易学习。如果一定照普通話写成 *hezuoshe*，那对他們就成了完全陌生的詞，脫离了他們語言的实际。这是語音的轉写规划，如果普通話和地方話在詞彙上有差別时，最好尽可能考虑借普通話。

第三，如果有大量的漢語借詞，这些借詞里有一些語音只用在漢語借詞里，不用或少用在本族原有語詞里，可是本族人民群众都会發这些語音，这就應該考虑

① 为避免印刷的困难，在本文里用拉丁字母拼写傣文。

② 本文所引僮語彝語的例詞，用新創制的文字書写。

③ 本文所引黎語例詞，用新創制的黎文書写。

为这些語音設計字母，增加新的音节。如果本民族里只有一部分人在借詞發音上和漢語相同，還有一部分人不能發某種語音，而這些語音的影響正在逐漸擴大，也可考慮專為拼寫借詞而增加幾個字母和新的音节。例如，維吾爾、蒙古、景頗、傈僳、佤等語言里雖然原來沒有“f”這個語音，但是，因為已經有許多人能發或能分辨出這個語音，所以，在這些文字里也已經增加了表達這個語音的字母。同時，也增加了一些新的音节。

第四，如果少數民族語言在音譯的借詞前邊或後邊加上一個本族語詞，使詞義容易了解，儘管增加部分的意義和借詞里的一個組成部分的意義有些重複，也不必把增加的部分刪去。例如：

蒙語：	Xуангхэ	мурэн—	黃河
	黃河	河	
僮語：	daɣ	huen ² ho ² —	黃河
	河	黃河	

這樣做，可以使詞義清楚好懂。即使不懂得漢語，也可以一看或一聽就懂。這種情況存在於許多語言里。既然是語言的實際，就應該在文字里也寫上去。當然，像這一類的詞用久了，借用部分已完全能清楚地表達意義，增加的部分也有逐漸地被淘汰的。到那時再省去也不遲。

(3) 在兩種語言詞序和構詞成分次序不同的情況下，可按照以下的辦法處理：

A) 完全用本族語言的材料或久已融合在本族語言里的老借詞創制新詞術語的時候，應該完全按照本族語言的次序。例如，西双版纳傣語：

heɣ¹het¹tsaŋ¹—生產力
力 生產

B) 一個成分是借詞，一個成分是本族語詞，也按照本族語言的次序。例如，僮語：

baŋ² su¹lim—士林布
布 士林

C) 完全音譯漢語的，如果本族人民群眾按照漢語次序吸收，便可以按照漢語的次序書寫，把幾個成分合起來做一個整體來看。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按照僮語次序應該作“國——共和——人民——中華”或“共和國——人民——中華”，但是僮族人民群眾都說“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就可以寫“Cunhua-jinmin-gungho”，在中間加“-”表示這幾個成分雖然在漢語里是不同的詞，但是在僮語里作一個整體來看。①如果完全分開寫就和僮語語法的一般次序發生矛盾。但是，如果分別做單詞看待，最好服從本族語言的次序，例如：僮語“jinmin cungho”可以用作“中國人民”，“cungho jinmin”可以用作“人民中國”。這種情況最初在口語里會有些混亂，可是也不難逐漸地在書面上確定下來。

(4) 一個民族暫時使用幾種文字的，在創制新詞術語方面，應該儘可能求得一致。但是在語音系統基本詞匯相差很大、構詞成分也有不同的情況下，就不必過分勉強地求得一致。暫時雖然不同，也可互相推薦，將來再求逐漸統一。例如，景頗族內使用景頗文和載佤文兩種文字，景頗語和載佤語的詞匯差別很

大，完全不同的詞超過了全部詞匯的半數，新創制的四種苗文，完全不同的詞也超過全部詞匯的半數，而且語音系統不同，漢語借詞的語音也有相當大的差別。對這種情況，在目前可以適應各自的詞匯、語音和語法條件來書寫新詞術語，不必急遽地勉強求得統一。但仍應儘可能地向統一方面做。

(5) 兩個國家的民族因語言相同而使用一種文字的，在建立新詞術語的工作方面，要考慮兩國的具體情況，能一致的就取得一致，但不必過分勉強。即使有一部分各自使用的詞，只要交往頻繁也不難互相了解，甚至在可能範圍內也可互相採用。例如，我國的朝鮮族和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使用相同的文字，我國柯爾克孜族和蘇聯吉爾吉斯族使用相同的文字，雲南景頗族也和緬甸的景頗族使用相同的文字。在新詞術語方面，國內外都難免有不同程度的出入。雙方的借詞就必然地會有一些不同。單就景頗文來說，我國景頗族已經從漢語里借入了大量的新詞術語，而緬甸的景頗族卻從緬甸語或英語借入了一些語詞，這種紛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能經常地彼此看到一些出版物，也不難互相了解。

我們應該肯定，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民族語文研究和編譯工作同志們在新詞術語方面已經進行了許多有價值的工作，這些工作對語言文字的豐富和發展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時我們也看到新詞術語在各種語言里反映出來的情況是很複雜的，牽涉的問題也很多。我認為今後要更好地解決兄弟民族語言的新詞術語問題，還需要加強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1) 廣泛地搜集各民族語言的固有語詞，深入研究構詞法以及語言的歷史和語言的發展規律。

2) 不斷地調查研究新詞術語在各民族廣大人民群眾和知識分子的口語里建立和使用的實際情況，順應現有語言的基礎和發展趨勢，加以適當的管理並逐漸確定規範。

3) 就漢語和各兄弟民族的語言或兩種互相影響較大的民族語言，進行平面的比較研究和對照的描寫。

以上三項研究工作，對新詞術語的制訂和發展都將有很大的幫助。第1)項工作能使新詞術語適合各種語言的特點和發展規律。第2)項工作能使新詞術語的科學研究和實際密切結合，在任何時候也不會脫離群眾。第3)項工作對於借詞的書寫規則有極重要的意義。拿漢語和兄弟民族語言的關係來說，不應該只注意兄弟民族語言和漢語標準音的比較，還要注意兄弟民族語言和鄰近的或對它影響較深的其他漢語方言土語的比較。為了給這一工作準備資料，在調查一種民族語言的時候，對於它鄰近的或在較大的程度上影響了它的漢語，也得進行調查研究。

以上不過是一些初步的不成熟的意見，希望同志們批評指正。

① 如果本族語言的語法次序和漢語相同，就不需要加短橫，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景頗文里就可以寫成 C¹unghwa Rinmin Gungho。

对翻译工作的几点意见

謝尔久琴柯 吳乐

1956年12月我们在成都时，曾利用一个休息日参观了杜甫草堂。在这里，收集了不少关于这位伟大诗人——爱国者的一生及其创作活动的资料，有许多是不同年代的手写或印刷的杜甫的作品。一间屋子里还专门陈列着一些中国现代画家以流传很广的杜甫为题材精心绘制的图画。

一个玻璃柜里陈列着苏联著名的诗人—翻译家用俄语翻译的杜甫。见到这些译诗，我们又一次感觉到在两个伟大的国家——苏联和中国的人民之间已建立起来的那种牢不可破的友谊和无可动摇的兄弟之情，又一次感觉到在文化方面那种经常性的相互繁荣。

读着A. 盖多维奇用俄语译的那本杜甫(1955年，莫斯科文学艺术出版社)，我们感到译者曾经如何仔细地、努力地想表达出杜甫的感情、思想及他所经受的一切，而所有这些都是流露在这位伟大的文学巨匠的永不褪色的诗文里的。粗略地比较了一下原诗和译诗，我们深深相信，译者在这一工作上化了巨大劳动的。

1955年在莫斯科还出版了A. 拉戈乔夫译的、郭质生教授校的中国著名的古典文学作品——施耐庵的《水浒传》。这本译著的出版，使苏联的广大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了书中鲜明地刻画出的宋代中国农民起义运动。

《水浒传》的译文虽然删节了个别段、句，有个别词句表达不很准确，但是却保留了中国这部优秀的文学作品的整个精神，因此也能使苏联读者相当满意。此外，苏联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的俄文译本，正在逐年增加并趋于完善。

中国把苏联的许多社会政治、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作品译成汉文的巨大工作也在进行。大家都知道，把古典的俄罗斯及现代的苏联文学作品译成汉文的这一极其重要工作的创始人，就是鲁迅及其在翻译活动方面的战友瞿秋白、曹靖华等。关于鲁迅和瞿秋白在翻译时所碰到的那些必须克服的困难和他们的翻译态度，在许广平的《鲁迅和翻译》，杨之华的《谈谈秋白同志的翻译工作》两文中都谈得很好。解放后，翻译工作在中国大规模地展开了。可以有信心地说，继鲁迅及其战友之后，新的翻译干部都在力谋改进自己的翻译质量。然而，由于翻译工作规模的日益扩大及其作用的重大，人们对译文的要求自然也在不断提高。

近年来不论是中央或地方的中国报刊上，都在讨论关于翻译工作的意义、作用和任务等问题。这段时

期所发表的文章里已经不止一次地谈到过争取质量好的译文的必要性。1957年4月16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李何的一篇文章，其中谈到了苏联作家波列伏依对翻译问题的意见。

当然，中国翻译工作的规模不能只限于俄译汉或汉译俄。目前，有许多各种各样的著作正从东方和西方的许多语言译成汉语。同时，从汉语译成中国各少数民族语言（尤其是在为许多没有文字的民族创立了新文字之后）的译文数量也在逐年增加。

毋庸置疑，在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国家条件下，在以一切方法巩固各族人民友谊的条件下，把各少数民族人民的口头创作、文学及历史等作品译成汉文的工作也将日渐发展。

大家都知道，中国这个友爱的大家庭里的蒙古族、突厥语族以及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的诗文都是极其丰富多采的，并且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性。通过译文，将使广大的汉族人民也能读到这些优美的民间创作。通过汉译文，它们还将被译成其他国家的文字。全人类的文化宝库也将因此而更为充实和丰富。

利用翻译的方法所达到的各民族间的文化合作和相互繁荣，证明了翻译工作者劳动的重要性及其责任的重大。

翻译工作者绝不是机械的工作人员。他所从事的是巨大的文化启蒙和社会教育工作。社会政治文献的坏译文能给马列主义的教育事业和培养社会主义新思想的事业带来危害；科学技术文献的不成功的译文能使工业和技术装备各部门的发展受到阻碍；质量不高的文学作品的译文则会剥夺掉原文宝贵的艺术力和教育力。

所有这些，不仅翻译工作者和编辑出版人员应该懂得，社会广大的各界人士也应该懂得。

二

苏联的翻译工作者认为，把某一作品的内容从一种文字准确地译成另一种文字是完全可能的。西方和东方各族人民相互交际的现实，证明可译性是存在的。实际上译文和原文不仅在内容上，常常在形式上也是一致的。

苏联的翻译工作者认为，英帝国主义著名的歌唱家列路得亚得·吉普林所说的话是种族和民族妄自尊大的表现。他说各民族好像是被剥夺了彼此了解的可能。他甚至在诗歌里也阐述了自己种族主义的主张。

他写道：

啊！西方是西方，东方是东方，
在世界末日，最后的审判来到之前，
它們誰也不会离开自己的位置。

当然，各种語言都以詞彙、語法規則和語音色彩而彼此不同。但是，各种不同的語言也正是表达人类思想的各种不同的方法。人的思維能力都是一樣的，这并不依賴于他是屬於哪一個种族或民族。同时，思維的法則對他們來說也是一樣的。正因为如此，只要有足够的語言知識，把某一著作从一种語言等值地譯成另一种語言是完全可能的。

自然，譯者不僅應該完善地掌握原文的語言，同時也應該完善地掌握譯文的語言。但是，目前从中国的外國語學院培养出来的大多数翻譯工作者，不論是在漢語或自己專業的外語方面，都还没有完善地具备进行譯翻工作所必須的条件。^①

我們認為，現在各專門的語言學院里改进培养翻譯人員的工作是很必要的，而其中尤其應該注意培养民族語言的翻譯工作者。

三

到目前为止，北京民族出版社只用藏、蒙、朝鮮、維吾尔及哈薩克等五种文字出版書刊。由于1956到1957年間又为中国16个少数民族創立了二十种文字，在近年內民族出版社的活动显然会大大發展，翻譯工作必然要扩大到各少数民族的語言。因此，漢語和少数民族語言的对譯工作，不仅在中央，同时也將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一天天展开。所以，培养民族語言翻譯人員，現在已成为迫不及待的問題了。

我們認為，从事漢語和其他民族語言对譯工作的人應該具备的条件是：

1) 必須精通漢語。不僅要在實踐上掌握漢語，同時要了解漢語史的基本知識，詳細地知道漢語的句法和詞彙結構；翻譯時善于分析在語言中所遇到的語法、句法結構；能使用形象的、富有藝術表現力的語句，用以表达某一人物的社會性和職業性的語言特征。

2) 必須全面和深入地瞭解譯文的語言（這常常是他的本民族語言）。同樣，如果只從實踐上掌握譯文的語言也是不夠的，還必須有理論知識。要善于分析語言的不同特點（語法、詞彙、諺語和常用語的）。翻譯工作者應該在實踐中創造性地豐富譯文的修辭手段、詞彙和語句。這一點對那些不久前才得到文字，却在修辭方面和政治、經濟、科學、文化等術語方面還沒有得到發展的語言來說，尤為重要。

3) 除去很好地掌握兩種語言——漢語和所譯文字的語言之外，任何一個翻譯人員都還應該掌握翻譯的基本方法和要求。翻譯工作者一定要懂得翻譯方法——從一般的邏輯要求到完整地表达出原文的內容及

其民族風格特征。

社會政治文獻，其中包括黨的文獻的翻譯工作最好委託給那些在社會政治方面有足夠條件的人，他要懂得馬列主義的哲學問題，中國人民革命史及中國共產黨史，同時還要了解目前的政治局勢。

很多的社會政治文獻，如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毛澤東主席及人民中國其他許多社會政治活動家的著作都具有豐富的政治哲學內容，同時又都是以簡潔的、豐富多采和富有藝術表現力的文字寫成的。

因此，社會政治文獻的譯者應該同時掌握科學的和藝術的翻譯方法。像任何一個文學家一樣，還應該經常記得毛澤東同志關於文章風格所說的那些話。毛澤東同志曾寫道：

在這裡要請讀者注意，我們的許多同志，在寫文章的時候，十分愛好黨八股，不生動，不形象，使人看了頭痛。也不講究文法和修辭，愛好一種半文言半白話的體裁，有時廢話連篇，有時又盡量簡古，好像他們是立志要讓讀者受苦似的……這就要求我們的報紙和刊物的編輯同志注意這件事，向作者提出寫生動和通順的文章的要求，並且自己動手幫作者修改文章。^②

我們完全相信，任何一篇譯文都應該做到：1) 準確地表达原文的意思；2) 不添加或減少任何足以歪曲原文的東西；3) 不是翻譯單詞或詞組，而是要翻譯完整的句子，要考慮到該句和上下文的关系，同樣也要考慮到整個被譯作品的特殊性質和一般風格；4) 只能遵循譯語的語法、句法規律。在任何情況下也不盲目地摹仿原文的句法，而只用譯者所能掌握的本族語言的句法来表达；5) 譯文要富有表現力及足夠程度的藝術說服力。

四

培养翻譯人員，其中包括中國少数民族語言翻譯人員的這一工作，應該引起中央和地方的許多機關的注意。看來，民族語言翻譯幹部首先應該由中央民族學院以及地方的民族學院来培养。

在負有培养翻譯人員責任的學院中，最好能設立專門的教研室，負責翻譯理論和翻譯方法的教学。同時，現在就應該為這些學院准备翻譯課方面的教科書。

根據許多有高度翻譯水平、从事翻譯西歐語言的漢學家們的經驗，并參考了蘇聯民族語言翻譯工作者

① 本文的作者之一就曾親身感受到這一點。她在數年前從外語學院畢業，在學院中她完全沒有得到關於漢語的系統的理论知識，所得到的外語（基礎俄語）和翻譯方法方面的知識，也十分不夠。所能得到的外語知識只局限在課本之內。畢業後，她才獨立地充實了漢、俄語的一般語言理論和實踐問題以及翻譯理論和方法問題方面的知識。所有這些，她本來都應該在學校中就取得的。

②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下冊，1953年，1134頁。

的丰富經驗，在教科書里最好能闡明下面这些問題：

1) 翻譯在中国的作用和意义；2) 中国翻譯事業發展簡史；3) 翻譯工作的基本方針(同时应估計到中国及外国的經驗)；4) 馬列主义經典作家論翻譯問題；5)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及漢語和民族語言對譯的任务；6) 翻譯方法問題——a) 原文和譯文的語法、詞彙和語義特点；b) 對譯文句法的要求；c) 翻譯時所允許的對原文的壓縮或擴張；d) 同音詞的表达；e) 俗語、成語和諺語的表达；f) 同義詞的表达；g) 術語的翻譯；h) 作品的藝術形象、政治傾向及風格的表达，等等。

在研究上述各問題時，翻譯方法方面還應該回答一個重要的問題——即譯文應在哪種程度上保留原文的民族特點。在蘇聯一些有關翻譯理論和方法問題的著作中(K. 楚柯夫斯基的《高級藝術》，格·謝爾久琴柯的《翻譯問題概述》，A. 費道羅夫的《翻譯理論導言》，《文學翻譯問題集》等)，對這一問題都給了相當明確的回答。

當然，任何一位譯者，除去要很好地掌握語言外，還應該有其他一些必要的知識。恩格斯在自己有名的《不應該這樣翻譯馬克思》一文中公正地指出了這一

點。恩格斯寫道：

為了翻譯像馬克思的《資本論》這樣的書，光是知道德國標準語是不夠的。馬克思自由地運用日常生活中的語彙和地方方言中的習慣語；他創造新詞，從科學的各部門中借用作為例證的材料，從整打語言的文學作品里摘用引文。要想理解馬克思，就必須真正完善地掌握德語，掌握口語和書面語，並且，除此以外，還須知道德國人的一些生活情況。(着重點是我們加的——本文作者)

恩格斯的這個“一些”，正是對翻譯工作者的基本要求。應該了解人民的历史、社會政治發展及現狀；應該知道並懂得人民的生活、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而這些，在談到民族語文翻譯時尤其重要。所以，培養翻譯人員的教學計劃中，除去專門的語言和社會政治科目外，還應包括該民族的民族史及人文情況。

人民中國的翻譯工作者正進行着極重要的工作。這一工作導向多民族的中國的國際關係，中國跟其他國家間的相互了解和友誼的進一步鞏固；有助於促進中國所有民族繼承偉大的文化遺產。正因為如此，合乎要求地培養具有高度水平的翻譯工作者的這一事業，是應該引起社會的廣泛注意的。

從翻譯中看漢語的問答句

王素蓉

語法學者常談到兩個術語：語義成分和語法成分。從翻譯的角度來看，語義成分一般可以直譯，語法成分就不能直譯，因為從一種語言譯成另一種語言，我們有時可以添上一些，有時可以減去一些，有時也可以採取別的办法來對譯。比如，德語里的冠詞 der、die、das 譯成漢語干脆可以不管，可是把印歐語系的某一種語言譯成漢語時，常常要在原文的數詞和名詞之間加上一個量詞。再如，翻譯俄語名詞第五格時，我們大多是用漢語里的語義成分的動詞“用”等來對譯，譯第二格時是用了一個表示修飾關係的語法成分“的”來對譯，而這個“的”並不等於俄語的第二格。

現在翻譯文章里常常出現一種問答句。這種問答句雖然結構簡單，但往往譯得别扭，不合漢語習慣。就拿國內現有的譯文質量比較高的《斯大林全集》中譯本來說，其中有些簡單的問答句，在忠實於原文上是沒有問題的，可是就漢語習慣說，就覺得别扭。例如：

- 1) 現在中國無產階級有沒有同盟者呢？是的，是有的。(9卷，843頁)
- 2) 中國無產階級在不久以前有過這種同盟嗎？是的，有過。(9卷，395頁)
- 3) 我做這種聲明是否有根據呢？是的，是有根據的。(11卷，208頁)
- 4) 在莫斯科組織里或它的上層機關莫斯科委員會內是不是有過猶豫和動搖呢？是的，是有過的。(11卷，207頁)

像上舉這樣的問答式例句還有很多，單就這幾個例子看，對原文完全不錯，就漢語書面語說，也還說得過去；可是那些答問的句子要是念起來，就令人覺得不大合於漢語的口語習慣，至少在普通話地區很少有用這樣的語句來回答問題的。

這裡把俄文的答句“Да, есть”譯成“是的，是有的”，“Да, были”譯成“是的，有過”，“是的，是有過的”……，但是，說漢語的人回答這樣的問題用的是另外一種語法手段。回答要是肯定的，就簡單的把問句里的表示肯定的那個詞重復一下。例如回答例1)，可以直接用“有”，回答例2)可用“有過”，等等。回答要是否定的，那就把問句里表示否定的那個詞重復一下，如果例句里沒有表示否定的詞（如例2），那末就把表示肯定的那個詞加以否定。這樣，回答例1)可以用“沒有”，例2)用“沒有過”，等等。這是從語法的形式方面來說的，要是從意義方面來說，漢語的回答問題，僅僅就問題里所提示的事物的對不對、有沒有或是不是等等來予以回答。而印歐語系的語言是就整個問題的對不對來回答的。二者是絕不相同的。

論現代漢語簡單句的分類問題^{*}

——存在句與占有句^①

龍果夫

語言是人們借以互相交際、交流思想和達到互相了解的工具與武器。由語言的這個定義可以得出必須特別注意語言的交際功能這一結論。因而，研究對話（既包括寫成文章的對話^②，也包括運用於問答實驗的口頭對話）^③的語言就非常重要。這些對話，經過巧妙和有計劃的運用，就能夠推動對漢語語法的許多非常複雜的問題的解釋工作，首先能夠推動對句子的語法形式劃分和“實際的”劃分的相互關係問題的解釋工作。我在《現代漢語語法研究》^④一書中的許多章節都提到這個問題。本文就是根據帶動詞“有”的簡單句的材料來研究這個問題。

A. 簡單句句型在中國語言學著作中的分類

謝爾巴院士多次指出^⑤，研究非本族語的語言學家，應該非常慎重地對待那些就這種語言來說是本族語的人對該語言在語法和詞彙上的觀察，因為在這些觀察與描寫中“總是有許許多多的真象應當很好地研究，儘管他們的語言學方法可能有錯誤”。漢語研究者們，可以在各個時期的中國語言學家的著作中找到許多有趣的東西，甚至就是在某些中國語言學家的總的觀點和通行的觀點有著很大距離，或者整個觀點都不能被接受的時候，也會是這樣的。

在中國的語言學著作中，對簡單句句型的分類還沒有一個統一的見解。許多中國學者認為，在現代語中有兩種基本句型——名詞句和動詞句。但對這個術語的內容卻有著非常不同的理解，有一些學者認為，名詞句句型既包括帶名詞謂語的句子，也包括帶形容詞謂語的句子^⑥；另外一些學者把形容詞看作是一種性質動詞，把帶形容詞謂語的句子也看作是動詞句。而且，由於某些中國學者把系詞句也看作是動詞句，就更不合理地擴大了動詞句句型（這是由於他們把系詞“是”無條件地看作是動詞的緣故）。^⑦在這種情況下，名詞句部分就剩下了為數不多的，名詞性謂語是用無系詞的名詞表示的“例外”了。

王力教授^⑧和不久前也同意他的觀點的高名凱教授^⑨的觀點，簡單地說來就是根據謂語是用名詞、形容詞，還是用動詞表示的不同情況，認為可以把現代漢語分為三種基本類型的句子。

1952年到1953年，在《中國語文》連載的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語法小組所著的《語法講話》里，除這三種句型外，又加上了謂語是由“主謂結構”構成的

第四類句子。^⑩但是，如果《講話》的作者們對這一句型提出的論述是正確的，那麼大概不能把這種句子叫作簡單句吧。

最後，呂叔湘教授認為^⑪漢語中有四種基本類型

* 此文撰寫時，有C.E.雅洪托夫和E.H.龍果娃參加。

① 本文於1952年12月提交東方學研究所。

② 特別是現代中國戲劇家的著作。

③ 在漢學家的著作中，採用問題與回答的，基本上局限於那些並不是為研究目的而採用它的初級課本。但可以參考我所寫的《現代漢語語法研究》（1952年版）第38節，用提出問題的方法來闡明“他|頭|痛”↑這一類型的句子結構；另一個例子是（同書第86節）“馬|跑的|快”↑這一類句子在肯定的或者是帶小詞“嗎”的疑問句中所包含的同音異義現象：a）“馬|跑的|快”或者是b）“馬|跑得|快”，是可以通过把它翻譯成否定型或者提出帶否定詞“不”的問題觀察到的，這些結構在形式上是有差別的：

a) 馬|跑的|快|不|快？——馬|跑的|不|快。

b) 馬|跑得|快|跑|不|快？——馬|跑|不|快。

↑ 譯文編者按：原文例句有分寫制度，這裡|表示詞和詞的界限，原有的短划也保留。少數幾個甘肅方言的例句也保留了注音。

④ 特別是參看本書第1，76，77，81—89，152等節。下面這本書縮寫為ДН。

⑤ 特別是在《語言學里的經常性的問題》，著者死後刊登在《蘇聯科學院通報，語言文學部分》第4卷第5分冊：1945年175頁。

⑥ 例如高名凱教授曾在《漢語語法論》（1951年第2版）第一部，第一，二章上這樣提出過。

⑦ 假使以這一觀點來把俄語句子分類的話，就會把“Он был офицер”（他是軍官）看作是動詞句，而把“Он офицер”（他——軍官）這類句子看作是名詞句了。

⑧ 見王力著《中國語法理論》卷一，79頁以下以及96頁以下（1951年第3版），《中國現代語法》卷一，77頁以下及90頁以下（1943年），《中國語法綱要》（1951年第5版）106頁。

⑨ 見《燕京學報》上的《語法叢識》，1951年第40卷，109—111頁。

⑩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語法小組：《語法講話》，1952年10月號《中國語文》，第24頁。

⑪ 見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1953年第6版）卷一，第3—4章及第5章。但應當指出，呂叔湘教授在後來所寫的普及著作《語法學習》（1954年北京第6版）中只提出三種基本類型的句子。

的簡單句。呂叔湘把所有帶動詞“有”和“沒有”的句子從動詞句中提出來①，歸為第四類，并把這種句子叫作“有無句”。呂叔湘寫道，這種句型的基础是有着存在的意义，但是他只对这样一些句子，如：“不-好！有！賊！”“玫瑰花有紅的，有白的”，才用“存在句”②這一術語。他認為這些句子具有純粹的存在意义，這種句子並不复杂，因為在這些句中沒有偶然參預的地点（或時間）关系，也不屬於某一個占有者（人）：像“山東省有兩個和尚”“我有——一本——書”這一類句子中的一樣。呂叔湘教授細致地分析了這兩小類句型的意義上的差別，把占有意义和地点意义在句中結合在一起的句子的問題留作懸案（這裡他舉了“我——這兒——有——一本——書”這個例子）。③

這說明了沒有能够合乎邏輯地揭示出本族語的形式與內容的一致性，也就是說沒有能够具体地探尋出什么样的形式上的差別和觀察到的內容上的差別相符。

研究非本族語所進行的方法恰恰相反，這時應當解釋的是什么样的內容上的差別和觀察到的形式上的差別相符。④ 下面我們就嚴格地遵循着這一方針，來研究呂叔湘教授所認為的有無句（我們認為原則上不是清一色的句型）的分類，部分地也涉及到那些近似的句型。

B. 分析帶動詞“有”的句子

I. 簡單存在句⑤

簡單存在句（肯定形式）回答“那里（……地方）有些什麼？”例如：

這本兒書——里——有——畫兒。
現在——課堂——里——沒有——人。
他們——屋子——里——沒有——鐘表。
在——商店——里——甚么——樣子的——衣裳——都——有。
東西——有——一——道——松樹——林子。
這兒——有——會——說——中國——話的——沒有？
他們——那里——有——一——位——醫生。
請——問，在——你們——這兒——有——空——房間——嗎？

這些句子的特点就是实际的成分划分和語法形式的划分有着冲突：對話人事先知道的談話出發点是地点狀語⑥，而談話內容的重心，新因素，談話核心是主語——事物之名称（通常是不確定的）⑦，它們是直接以不及物的“存在”動詞“有”來联接的。這個動詞“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省略，這下面再談。

“那個（……東西）——在——哪兒？”這個問題不適合于存在句。回答這一問題的句子是帶有動詞“在”的句子（在這個句子里，出發点通常是意义确定的主語，而談話核心則是由動詞“在”和地点名称所組成的謂語組）。是語法形式划分和实际成分划分有相反关系的存在句，它的特点就跟包含“在”的句子有对照关系。

（問題）

桌子——上——有——些——什麼？
紙——在——哪兒？
我——這兒——有——些——什麼？
報紙——在——哪兒？

（例句）

出發点 談話核心
桌子——上——有——紙⑧
紙——在——桌子——上
我——這兒——有——報紙⑧
報紙——在——我——這兒

黎錦熙教授和其他中國語言學家不同，指出在現代語中動詞“有”的變體如下：表明“占有关系”的及物動詞（包括有着类似意义的“联系”動詞）⑨以及和它相對立的帶有存在意义的不及物的“存在”動詞。⑩ 黎教授正确地指出后者和動詞“在”的意义联系，認為它們

① 此处包括省略動詞“有”（在句子是从地点狀語開始的条件之下）的这些平行的變體。

② 動詞“存在”和“有”的區別，見呂叔湘、朱德熙《語法修辭講話》，1954年，北京版，73頁。

③ 呂叔湘：上引著作，109頁。

④ 謝爾巴：《外語教學的展望》，《外語教學》文集，1944年，莫斯科，第9頁。

⑤ 這裡我們不分析复合存在句，包括單部的，如：“有人——敲——門”（呂叔湘：上引著作，160頁），“有——客人——找——你”和雙部的，如“那邊兒——有——個——什么——東西——在——半空——中——飄着——呢？”“講台——上——有——主席——因——坐的——那兒”。

⑥ 沒有地点狀語是在考慮到整个具体情况的時候，“就在這裡”，或者“就在那裡，就在那談到的地方”，例如：“今天——沒有——云彩”，“沒有——姓——說的，只——有——姓——談的”。暗含有“在中國”，“中國姓中”這樣的狀語意思。

呂叔湘教授沒有注意到，這類句子整個地決定于上下文，沒有上下文時，語法上是不完整的（王力著《中國語法綱要》曾進一步指出這個特点）；其他的作者，特別是高名凱認為這類句子確認了“占有”，同時作為暗示的“對方”，“天道”在考慮（關於占有句參照下面所述）。

陳述某一概念的類別的存在的句子是在內容上進行補充的，不需要地点狀語，也不需要上下文的句子。如：“玫瑰花——有——紅的——有——白的”，“地主——還——有——不——壞的”（周立波），“還——有——這樣的——人——嗎？”（馬加）

⑦ 如果地点狀語或者主語帶有定語的時候，這個定語當然是各談話核心出發点的一部分。下面分析的都屬於同樣情況。

⑧ 作主語的是用于概括意义的名詞（在一個例子里有物質意义，在另一個例子里有复数意义），因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可能在不改變確定詞的情況下把例句從一種結構換為另一種結構。（“確定詞”這一術語見ДН第218節注）

⑨ 見黎錦熙所著有名的《新著國語文法》，1954年20版，124頁第8項和131——133頁。

⑩ 同書126及49—50頁。但是我們感到，問題的實質與其說是在於某些變體里，或是動詞“有”本身的意義里，不如說是在含有這個動詞的，表明占有和存在的不同的句型中。

是完全的等义词，认为它们只是在功能方面有差别。就是说这些句子的结构是完全相反的。黎锦熙认为一个带不及物动词“有”的和另一个带动词“在”的平行句子有着同样意义。^①但是，根据我们分析下页左栏下面的句子的结果可以明显看出，绝不能把它们在结构上的不同看作只是形式上的差别：正相反，这是由于叙述目的不同而产生的基本意义上的差别。

和存在句有着类似现象的另一类句子，是那些虚假的同义结构（也可以把它换作带“在”的句子），但是在应当用“有”的地方，却用了“是”（或“就是”）。^②例如：

- {a) 紙|底下|有|書}書|在|紙|底下
{b) 紙|底下|是|書}

把这几个句子拿来进行比较和观察时，就会发现a与b不只在意义方面，就是在内部结构方面也有着根本的差别。这种差别的外部表现就在于选用“有”或者“是”。我们分析一下《白毛女》剧中的成为对照的例子。^③

- a) 那边|有|个|草子|地，我|快|藏起来。

在这个句子里，确定了草子地的存在，但是这也不能不是隐蔽地，因此，用动词“有”。

- b) 顺着|这条|路|追下去，前面|是|一条|大|河，她|跑不了。

接着是：

- 前边|就是|大|河，她|跑到|哪儿|去？

这里事先知道前面有点什么，于是在这些句子里指出这在前边的“什么”是大河（在头一个句子里是不确定的，在后一个句子里是确定的，前面提到的），因而选用了有名词谓语句和系词“是”的b)这个结构：在这个句子里，“前面”（“前边”）具有名词性，而没有像在带“有”的存在句中的副词性。^④

在选定“是”或者“有”时所根据的意义差别还表现在：带“是”的句子具有周遍性（在这样的句子里，指出了当场所有的一切），而带“有”的句子却把在那里是否还可能有别的东西这个问题留作悬案。例如：

- [团长]|担|一|担|饭，一|边|是|馍，一|边|是|汤，筐|里|有|碗|筷|杓|等。（马健翎：《血泪仇》）

事实上，扁担的每一头有些什么是一定的，因而用“是”，在筐里，则除了碗、杓和筷子外还有些什么，因而用“有”。

再举几个具有周遍意义的“是”的例子：

- 南|炕的|对面|是|描着|金|凤-的|红|漆|箱箱。
（周立波）

- 床-上，地下|都|是|人。（赵树理）

- 刚|下过|雨，道-上|尽|是|泥。（周立波）

现在来讲一下存在句的结构。如果这类句子的主语有定语（数量定语或性质定语），那么这个定语就成

为谈话内容的真正中心。

一方面，这表现在可能向这类句子提出使事情更加确定的问题：“那里有多少叫这种名称的物体？”和“那里有什么样的叫这种名称的物体？”下面一些简单对话可以作为例子（说这话的前提就是A知道有书这一事实）。

- A. 书|在|哪儿？在|你-那儿|不|在？

- B. 书|在|这儿，书|在|我-这儿。

- A. 你-那儿|有|几本|书？

- B. 我-这儿|有|三本|书。

- A. 你-那儿|有|什么|书？

- B. 我-这儿|有|中国|书。

另一方面，定语意义所占的优势也间接地表现为在这种情况下，动词“有”不是非存在不可的；换句话说，只和动词“有”这种形式上的特征潜在地关联的不完全句也属于存在句的范畴。吕叔湘教授指出，在我们叫作存在句的句子里可以省去“有”。^⑤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这是由于存在着某种形式的数的概念的缘故。“门-前|有|人”这样的句子可以说，“门-前|人”这样的句子却不可以说。我们举几个例子：

- 你|家-里|几口|人？我|家-里|三口|人。

- 比较：在|你的|家-里|有|几口|人？在|我的|家-里|有|三口|人，就是|我的|父母|跟|我。

- 南坡庄|不过|三-四十|家|人。（赵树理）

- 今年|山-里|一|场|雹子。（马加）

- 到了|灘*(?)|里，灘(?)|里|一个|房子。（甘肃方言）

- 他喜儿|在|园子里|耍的呢。园子里|一|窝|蚂蚁。

- （甘肃方言）

与此相同，在有数量定语的条件下，和上面分析过的带“是”的句子相当的句子也成为无动词句了。（那里明显地有某件东西，也就是……）例如：

- 靠|西|墙|是|竹丛，下面|许多|筍。（鲁迅）

- 门-外|左-右|全|是|土坡，中间|一条|车道。（鲁迅）

- 看|时，果然|绿|杨树-上|一个|老鸦|巢。^⑥（水浒传第七回）

当数词“一”有“全”的意义时，也属于这种情况。例

① 《新著国语文法》，129页，注4。

② 这两种句型的差别在《语法讲话》中论述得很好。（《中国语文》，1952年12月号，17页）

③ 见ДН第48节。

④ 在这些句子里，像“前面”这一类的副词性名词具有的体词性质，可以从西北诸方言的以体词语尾“的”作主语的主谓结构（ДН，第48节）和分析过的带“是”的结构相符一事中得出结论。例如：“锅里的肉”гуәниди-жу（甘肃方言）。

⑤ 吕叔湘：上引著作，卷一，107页。

* тап——曠地，林中空地，开垦地。

⑥ 注见次页①。

如:

刺蝟的|身上|一身②|刺。(甘肅方言)

Цывиди шышшон йешын цы.

哎-呀! 这兒|一地②的|紙!

可能会問,为什么中国学者把数的范围和上面分析的句子的可以活用無動詞性这样重要的結構特点之間的緊密联系漏掉了呢?

可以这样來說明,中国語言学家需要把本族語的詞按詞类划分(沒有这一点不可能論述它的語法),而在詞的特定的形态外貌中又找不到可以使詞屬於某一詞类(或者詞类内部的某些分类)的根据;因而他們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他們把詞的基本意义作为主要准则(論述本族語时会自然地走上这条道路),但是未能用足够的語法材料来証实这种詞义标准。③ 特别是他們把数詞只看作是意义范畴,忽略了它的語法特点,忽略了数詞和物体的詞組所具有的謂語性質。

但是,詞的变化和配搭的特性只有在語法中才能实现,因而只有在語法的基础上,根据詞与其他詞以及形式因素的各种配搭的性質才能把詞分为詞类。

II. 占有句④

1) 占有句和存在句的比較

現代漢語中,占有句是常見的帶有 П—С—Д⑤ 結構的動詞句。这里,С 是及物動詞“有”,是非動作動詞之一。⑥ 動詞“有”以及它后面的物体名称使占有句和存在句相近似,但它們的相同点也只限于此。

占有句(肯定形式)回答補語問題:⑦ “П有什么?”(П 是某占有者,以主語表現之)。同时,因为對話人事先知道主語,所以主語起出發点的作用,而謂語組却作为談話的核心,在謂語組里,有談話內容中心的補語(照例是不确定的)。举一些簡單的例子:

我|只|有|五塊|錢。

他|沒有|弟兄,只|有|个|妹妹。

我|今天|沒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我們比較一下下面各对例句的語法划分与实际成分划分的关系。

	談話的出發点		談話的核心
[占有句]	主語	謂語	補語
	他	有	个 菜園
[存在句]	狀語	謂語	主語
	那边兒	有	个 菜園
[占有句]	主語	謂語	補語
	我	有	紙
[存在句]	狀語	謂語	主語
	我-这兒	有	紙

这样,存在句与占有句的头一个和最重要的区别,要看主語是否充当談話的出發点;第二个区别要看“有”后面的名詞是及物動詞的補語,还是以不及物動

詞作謂語的从屬主語。⑧ 第三个区别决定于狀語的作用。在存在句里地点狀語总是說話的出發点,在占有句里地点狀語照例是省略的;如果有的話,或者和句子实际成分划分沒有联系,或者作出發点,而所有其他內容却是說明这个出發点的。这些其他內容同时也分为出發点(主語)和談話中心(謂語組),例如:

汉口|我|有|个|亲戚。

“我|問|你,韓|老|六|到底|有|多少|地-呢?

本|屯|有|八|十-来|垧。⑨

外|屯-呢?外|省-呢?”(周立波)

第四个区别是存在句和以“在”为內容的句子有着对照关系,占有句則沒有。这一点在“我-这兒”这种类型的句子里表现得特別突出。呂叔湘教授似乎傾向于把这类句子看作是不明显的或是中間的情况,因为在这些句子里,占有意义和地点意义在狀語里是結合在一起的。

① 指出列举物体的無動詞句是非常有趣的,在这里数的概念不用数詞表达,而是列举本身就表达了数。例如:“左边|几-上|文|王|鼎,匙,筋,香|盒,右边|几-上……(紅樓夢,第三回);“搬的|人|多的很-来;里头|哈薩,纏头†,黑娃子††,烏茲别克,塔吉克,烏路斯*。老回回**|就|我們|一|家子。(甘肅方言) Банди жың дуәдихын-лә: литу хаса, чанту, хивазы, узбек, тажик, вурұс. Лохуэйхуэй ву вәмү йл жызы.

† 維吾尔人, †† 吉尔吉斯人, * 俄罗斯人, ** 东干人。

② “身”和“地”这里用作“刺”和“紙”的一种“度量單位”。

③ 参考王力《中国現代語法》(1955年,卷一,18—20頁)以及在《中国語法理論》(1955年,卷一,第20—32頁)中对这一論点的叙述。試比較呂叔湘、朱德熙《語法修辭講話》(第10頁)的論据,对詞类在句子結構中所起的作用显然是估計不足的。

④ 这里我們不分析像“我|有|个|朋友|姓|王”这类的复合句。

⑤ 黎錦熙:上引著作,124頁,第8項。

⑥ 这些動詞見 ДИ 第91—92节。

⑦ 定語的存在相应地增多了可能的問題的数量(关于必須用定語的情况参考第 II 部分第2点)。

⑧ 即和“桌子-上|点着|灯”这类句子的主語一样。关于从屬主語的概念見我的論文《論漢語句子的从屬成分》(《苏联科学院通报,文学語言部分》1946年版,第5卷,第6分册,第486—487頁)。这种主語的从屬性在于它是謂語組的一部分,因而和后者不是平等的。尽管在帶从屬主語的句子中存在着两个主要句子成分,这种句子仍是單部句(只要在謂語前沒有作为陈述出發点的地点狀語,就会是这样;这就像在本文中分析过的句子一样)。

⑨ 这里暗含主語是“韓|老|六”,从該句所回答的問題就可以看出来。

我們比較下面的一組例句:

	談話的出發點		談話的核心	
	主語	謂語	補語	
[占有句]	他們	有	包	東西-的 紙
[存在句]	狀語	謂語	主語	
	他們-那里	有	包	東西-的 紙

帶“在”的句子只和存在句這一例句有類似關係，問：“包|東西-的|紙|在|哪里？”，答：“紙|在|他們-那里。”占有句却不能這樣說，不能說：“紙|在|他們”。

像這樣，通過對存在句和占有句的語法上的劃分，那些由“我-這里”開頭的句子，也就在分類中找到了它的位置。

2) 占有句內部區別，以及近似占有句的名詞句

中國的一些作者們^①，注意到被我們叫作占有句的意義上的差別性，認為這種差別性和補語的意義有關。的確，“我|有|一塊|錢”和“我|有|一個|名字”這兩個句子在意義上的差別是明顯的。但是中國的作者們沒有解釋伴隨着這種意義上的差別，語法差別又是怎樣，這兩種情況的分界線又劃在那里。

問題在於動詞“有”所表達的占有的差別性質，要看補語表達的是可轉讓的物體（例如錢）還是非轉讓的（例如名字）。^②在第一种情況下（上面在本節頭一個問題中，所舉占有句的例子都屬於這種情況），動詞“有”在任何條件下都不可能省略或者用“是”來代替。“我|有|書”和“我|有|三本|書”都不能夠變為“我|書”，“我|三本|書”或者“我|是|書”，“我|是|三本|書”，而不失去意義。

在第二種情況下，也就是說補語是用非轉讓的名詞充當時，動詞“有”需要的程度，像在存在句中一樣，要看是否有數量定語。例如在“人|有|手”這個句子里，因為根本沒有表現出數量的概念，省略“有”是不可能的，這就像有沒有非轉讓意義的補語時一樣。

偶而有數量概念參加時，根據“有”的存在與否就會產生一些具有各種意義的平行結構。例如：

這張|桌子|只|有|三只|腳。^③

和這個句子類似的無動詞句，表明桌子就是由三只腳構成的，這種句子屬於以非轉讓為其特點的句子，也就是屬於無系詞的名詞句一類。

這張|桌子|三只|腳。^④

在計算年令，大小等等時，這一類無系詞的名詞句表明準確數目，而和這相類似的帶“有”的占有句（屬於動詞句）則表示概略數目。例如：

郭|全-海|二十-四|歲，比|白|玉-山|小|四|歲。

（周立波）

這|人|現在|有|五十|多|歲。（趙樹理：李有才板話）

這|一|回|碰了|有|二十|來|斤，大的|尺|米|長，小的|才|三-四|寸。（草明）

階梯|共|有|二百|八十|多|墩。（草明）

大家知道，用系詞“是”是強調非轉讓名詞作謂語的數量定語或質量定語。如：

他|不是|三十-五|歲|，是|二十-五|歲。

個別的帶非轉讓名詞的無系詞的名詞句是陳述某一物品的價錢的，同時在謂語組內有表示錢的單位的詞。

這個|東西|兩|毛|錢。

① 特別是呂叔湘教授（上引著作，卷一，109頁）和黎錦熙教授（上引著作131—132頁）。

② 在ДН第37—43節闡述了非轉讓的名詞的語法特點。

有趣的是，法語中非轉讓與可轉讓的差別，在完全相同的結構中，用確定詞（冠詞）的方法來表示，而譯成俄文時，則用句法的方法來表達這類句子的差別（特別是借助於“есть”的有無來表示），例如：

Il a les cheveux noirs.（他有黑色的頭髮）

他一定有什麼樣的頭髮是肯定了的，這里告訴我們這（用確定冠詞 les）頭髮是黑的。

Il a des chevaux noirs.（他有黑馬）

他也可能沒有馬，這里告訴我們他有幾匹馬（des是部分冠詞，單數時和不定冠詞 un 相當），而且是黑的。

（雅洪托夫注）非轉讓的名詞的語法特點首先在於它是以整個句子用作謂語的句子（“他|頭|痛”的類型）的一部分；謂語句的主語却只可能由屬於非轉讓範疇的名詞來充當。（見ДН第38—39節）

非轉讓的範疇還有着其他語法特點，其中的某些特點在龍果夫著《現代漢語語法研究》中沒有論述到。例如，Г. И. 萊斯卡婭認為，屬於非轉讓的名詞可以用為被動結構句中的補語，例如：“我|被|狗|咬了|腿”。

應當把謂語句和下列句子分開：

1) 以數量形容詞（“多”，“少”）作謂語的句子（Л. Г. 葉菲莫娃曾經確定了這類句子和主謂謂語句的區別），例如：“廣-聚|地|多”。在這個例子里主語是“地”，“地”當然不是一部分，也不是“廣-聚”的非轉讓的部分。在帶“多”，“少”的句中的談話出發點不僅是人稱，而且也可以是地點狀語，例如：“街-上|人|少”（在“他|頭|痛”這一類句子里，當然不能把人稱名詞換為地點狀語）。

2) 以四字成語為謂語的句子。例如：“中國|地|大|物|博”。“地|大|物|博”是一個詞彙單位，其中名詞在這一詞組外（在其他成語外）不用，或者有時雖然獨立使用，但是卻不屬於非轉讓範疇。

這樣一些句子類型（以數量形容詞或者四字成語為謂語的句子）和非轉讓範疇的劃分沒有關係。

③ 此句及前句取自上述黎錦熙教授的文法第132頁。

④ 如果有性質定語，非轉讓的名詞也可作無系詞謂語。見ДН第41節。我們指出，非轉讓的名詞可歸納到中國作家引用的大部分名詞句中去，但是他們沒有把這類句子分為特別的小類，沒有把這種結構看作是和非轉讓範疇有聯繫。

房|租|不|貴,論|人|不|論|間,每|人|每|月|五|毛|錢。(趙樹理)

B. 分类方案建議

根据上述一些情况,我們現在可以来談一談現代漢語可以划分为哪些基本的簡單句类型,这些簡單句又形成了什么样的系統。

首先我們可以确定把現代漢語簡單句分为回答“什么事”或“發生了什么事情”的問題,而只由叙述核心組成(不論是用什么表示的)的單部句以及由出發点与談話核心組成的双部句。單部句的例子,我們上面已經举过,如:

不|好|有|賊!

双部簡單句①按語法划分和形式划分之間的相互关系,可以再分为兩类。出發点是地点,而新因素即談話核心却是对这一地点加以描述的东西,算作一类句子。和这不同的,出發点是事物,談話中心却是陈述这一事物的新的事物,亦即談話的出發点和主語是相吻合的句子算作另一类句子。

把这两类句子再进一步进行划分时,則按談話中心,即新因素来划分,这个新的因素,就其内容与語法形式来講可以是异常多样的,——但是这里只分为兩类。

在陈述某种事物的句子里,謂語用名詞表現的名詞句形成为一类。謂語②用動詞或謂語形容詞表現的動詞句則形成另一类。这两类句子的差别,在形式上表现为名詞句的謂語不直接和否定詞“不”相接,而必須用系詞;動詞句的謂語不需要用系詞,可以直接和否定詞“不”相接。③

動詞句从意义和語法兩方面来看,根据謂語是用動詞表示,还是用謂語形容詞表示,还可以分为两个小类。④

再进一步对狭义的動詞簡單句进行細分时,既可按帶及物或不及物動詞結構的差别来划分,也可按動作動詞和非動作動詞来分。⑤ 像上面已經指出的,占

有句在这一分类中属于及物的非動作動詞句(可以以“爱”为例)。

至于談到陈述某一地点的句子或者是广义的存在句时,那么它們可以分为:上面分析过的,回答“那里有什么?”,句中談話的新因素是物体的名詞句以及本文未提到的,回答“那里發生什么事?”或者“那里情况如何?”,談話的新因素是指出某一事实的動詞句。例如:

床-上|躺着|一个|人。 这里|很|干净。

像这样,在这一分类中,帶“有”的句子形成两个極不相同的类别。帶“地点——‘有’——事物”結構的句子是名詞型的存在句,而帶“事物——‘有’——事物”結構的句子却是一种独特的動詞句,在这种句子里,出發点以事物表示,且和主語相符。⑥

不要以为上面提出的方案就可以看作是結論了。相反地,这不过是从語言是交际工具这一本質出發,对現代漢語簡單句进行分类的初步尝试。

这方面的工作是很多的;但是,可以相信,在苏联汉学家和中国学者紧密合作之下,能够成功地克服摆在我們面前的困难,推进偉大中国人民的語言研究工作。

(陈孔倫譯自《漢語語法的几个問題》,苏联科学院,1957年版)

① 我們这里完全没有涉及到所謂主題主語。

② 这种謂語或者是談話中心,或者只是这中心的一部分(当有次要成分时)。

③ 見 ДН 第1节和70节。

④ 見同書第142,143,163节。

⑤ 見同書第91—102节。

⑥ 帶各种及物動詞的句子同样地属于两个不同的类别。比較:“他|点了|灯”;“屋子-里|点着|(点了)|灯”。头一个句子是通常的動詞句,談話的出發点和主語相符。第二个句子是存在句的動詞型,句中動詞“点”是不及物的,而“灯”是主語。

(上接46頁)

發达有关呢?不用拿很早的《詩經》为例,就以元、明、清戏曲著作來說,如全部《琵琶記》,几乎没有一个表示“非常級”的程度副詞。我們感到應該出現程度副詞的地方,却出現了許多迭字詞尾。这現象不是值得深入探索一下么?

所以,我認为解釋迭字詞尾發生、發展和衰亡的原因,只有認識了迭字詞尾的演变过程,才能正确解釋某些AABB式为什么不能“丢輕音”。例如,“大大咧咧”,“密密層層”,“兢兢業業”,“病病歪歪”等,它們只有AABB的重迭式,而沒有ABB式和AB式的变化。其所以不能演变,我認为关键在于不是由AB→AABB;

而是停留在AA·BB→AABB阶段。

陆、俞兩位先生說,这类詞尾“全是快消亡的东西了”。并且說,是因为“漢語的習慣是什么詞都可以作附加語,形容詞的重要性自然就差了,何况它的詞尾呢?”誠然,这些迭字詞尾,現代比古代是减少多了。可是,尽管附加語發达,迭字詞尾的比喻作用,它在修詞上的形象性和生动性,并不是完全能由附加語代替的。它們今天不發达的原因,我認为主要是受副詞發达的影响。我們还不能十分肯定地說它們一定快要死亡。事实上,不仅在人民口头創作里保存着丰富的迭字詞尾,就是在現代書面文学里也还广泛地使用着,这种例子我想不必去列举了。

迭字詞尾初步研究

馬克前

一 迭字詞尾的类型及其特殊性

漢語的詞兒有形态变化,今天是已經肯定了。陆宗达、俞敏兩位先生早就提出了这种形态变化并加以系統論証。他們着重地討論了漢語實詞中名詞、動詞、形容詞三大类的形态变化;批判了过去認為詞的重迭形式仅仅是迭字或迭詞的說法,肯定了这种形态变化所表达的“量”和“时”的語法范疇。并且提出了重迭形式(ABB式的BB)作形容詞詞尾这一事实。他們肯定說:“所有的詞尾(按:指形容詞詞尾)都是表量的。‘臭烘烘’比單說‘臭’口气重多了。”①初中《漢語》課本第三冊吸取了这些成果,把它們称为“重迭的輔助成分”(77頁),并說它們“使用起来也有特殊的表达效果”,只是沒有明白地提出“詞尾”这一形态学上的概念罢了。本文称为迭字詞尾,一是为了与一般詞尾(如兒、子、头;了、着、过等)区别;一是为了与形态学上的概念体系一致。

《現代漢語語法》上冊只提出了有数的几个迭字詞尾,关于演变問題也談的比較簡單。《漢語》課本第三冊虽然提出了動詞和名詞也有帶这类迭字詞尾的事实,但因限于課本體例,对它的特殊性方面談的比較少。因此,本文想就有关迭字詞尾的問題,进一步提出一些探討性的意見。

現在,先來談一談迭字詞尾的类型。

烘烘——暖烘烘	臭烘烘	熱烘烘
哄哄——鬧哄哄	亂哄哄	
洋洋——喜洋洋	懶洋洋	暖洋洋
生生——活生生	怯生生	脆生生
汪汪——水汪汪	泪汪汪	
沉沉——黑沉沉	陰沉沉	苦沉沉 困沉沉
巴巴——干巴巴	眼巴巴	
茫茫——白茫茫	灰茫茫	
花花——白花花	毒花花	
忽忽——黑忽忽	熱忽忽	肉忽忽兒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們可以歸納为《漢語》課本所指出的以下三类:

- 1) 詞根是形容詞的:暖烘烘,白茫茫,黑沉沉…;
 - 2) 詞根是動詞的:鬧哄哄,活生生,喜洋洋…;
 - 3) 詞根是名詞的:水汪汪,眼巴巴,肉忽忽兒…。
- 第一类最多,第二类次之,第三类最少。

迭字詞尾与一般的詞尾不同。一般的詞尾附加在根詞上,不致失掉根詞的語法特点,也很少改变根詞的

詞性。而迭字詞尾,一旦附加在根詞上,不仅能改变根詞(指名詞、動詞作根詞时)的詞性,还能使根詞失掉其固有的語法特点。我認為这是迭字詞尾的特殊性。現在就来具体談談。

首先,談一談根詞是名詞和動詞的。它們加上了迭字詞尾以后,就变成了形容詞。在句子里处于形容詞所处的地位,可以作形容詞所能作的句子成分。例如名詞“水”,在“她有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的句子中充当定語。又如“眼”,在“他眼巴巴地等着她的信”的句子中充当狀語。再如動詞“笑”,在“他笑嘻嘻地說:‘我走了’”的句子中充当狀語。

其次,着重談一談根詞是形容詞的。虽然沒有改变形容詞的詞性,但是,形容詞的語法特点却几乎完全失掉了。下面就通过比較的方式来論証一下:

1) 帶迭字詞尾的形容詞,不能受程度副詞的修飾或限制。我們不能說“很亮光光,十分白花花,…”。但是,它們可以受範圍副詞的修飾或限制。例如:“全校都靜悄悄的,沒有誰來打攪。”这是因为迭字詞尾有表量的(也可以說是表程度的)作用,所以,就不需要再用程度副詞來修飾或限制了。

2) 不能受否定副詞“不”的修飾或限制。我們不能說“不綠油油,不涼絲絲兒…”。我認為迭字詞尾附加在根詞上,所表达的“量”是有肯定意义的。因此,这种詞兒,就不容許再否定它。否則,就会产生意义上的矛盾。

3) 帶迭字詞尾的形容詞不能用肯定否定相迭的方式表示疑問。我們不能說“黑洞洞不黑洞洞?”“活生生不活生生?”等等。我認為沒有这个語法特点的原因与前項2所說的相同。

当然,“白花花”不能說成“白花花不白花花?”,“报告报告”不能說成“报告报告不报告报告?”,也与音节的長短有关系。像这样長音节的重迭,發音器官的活动是頗不方便的。

4) 一般的形容詞可以重迭,而帶迭字詞尾者就不能重迭。我們的語言里沒有“黑忽忽黑忽忽”,“乱哄哄乱哄哄”等等重迭現象。原因很为明显:一,許多ABB式是由AABB式演变来的(見后);况且,重迭的作用——表量——已經由迭字詞尾表达出来了,沒有必要再来重迭。二,音节太長,不便重迭。可用動詞詞尾“化”來証明:單音节形容詞,加上詞尾“化”以后,

① 見所著《現代漢語語法》上冊。

还可以重迭。例如“綠化”可以說成“綠化綠化”。但是双音节形容詞加上詞尾“化”以后，就失掉了重迭的能力。例如“合理化”不能說成“合理化合理化”。三，“中輕重”的重音格式，也妨碍了重迭。汉语双音节的動詞和形容詞，凡是可以重迭成 ABAB 式或 AAB 式的，尾音节讀輕音。可是，这种 ABB 式的形容詞，它的尾音节讀重音。这也造成重迭的困难。

5) 不能独立作謂語(戏詞和詩、詞除外)。我們在語言里很少碰見“四周黑沉沉”这样的句子，一般都要加助詞“的”，如“四周黑沉沉的”。

形容詞一旦帶上重迭的輔助成分(即迭字詞尾)，就失掉了形容詞的固有語法特点，这一点我覺得还可以在《汉语》課本中扼要地指出。

二 迭字詞尾是帶比喻性的特殊詞尾

究竟这些迭字是表量的詞尾，还是性态副詞？按照《現代汉语語法》上冊和《汉语》課本的主張，似乎都是詞尾；按照黎錦熙、刘世儒先生的《中国語法教材》的主張，則又是“后附副詞”。我認为看成是純粹的詞尾，就是忽略了它們的比喻作用——繪景和拟声的作用；如果仅仅看作是性态副詞，更是掩盖了因重迭而起的形态变化。具体的解釋这种語言現象，必須同时从形态上和結構关系上来进行研究。

詞尾是一种形态。作为詞的一种形态來說，它起碼应该具备三个条件：1) 本身無意义，不能独立，是个輔助成分；2) 能够表达一定的語法范疇；3) 讀輕音。

拿这三个条件来衡量一下所有的迭字詞尾，我們就会發現：它們符合前兩条的要求，只是对最后一条有困难。

就以“邦邦”和“茫茫”为例，如果我們不把它們当作象声詞，不把它們割裂开来去解釋每个方块兒字，的确，它們本身是沒有意义的。可是，当它們一旦与根詞“硬”、“白”結合起来，構成“硬邦邦”、“白茫茫”等詞时，确实是“口气重多了”，表达了“量”这个語法范疇。这难道不符合第一条和第二条的要求嗎？但是問題在于：它們一般讀重音而不讀輕音；除了表“量”外，还有繪景和拟声的比喻作用。我認为“硬邦邦”就是通过拟声的迭字来表量的；“白茫茫”就是通过繪景的迭字来表量的。就不讀輕音这点說，算是不合汉语一般詞尾的現象，就比喻作用說，也超过一般詞尾的作用。正因为这些迭字詞尾具有这种比喻性，所以历来的語法学家，都以“特殊”的眼光来看待它們。王力先生在《中国語法理論》中，把它們归入“特殊形式”一类，直称为“迭字”；黎錦熙、刘世儒先生把它們并入“性态副詞”，称为“泛迭”，并說“这是汉语的一种特殊構詞法”。《汉语》課本注意到了它們的比喻作用，但沒有明确地提出来，只說“也有少数的就字面上看略有意义”，所以我覺得有必要在这里談談迭字詞尾的比喻

作用。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迭字詞尾的比喻作用不是独立表达的。必須与实詞詞根結合起来，才能显示出它們的比喻作用。如“晶晶”、“汪汪”，独立起来看，是沒有比喻作用的(当然，割裂开来，“晶”和“汪”就字面上看是略有意义的)。而一旦構成“亮晶晶”、“水汪汪”等詞，就显示出它們的比喻作用了。

其次，它們的繪景和拟声作用，不是象照象和录音那样逼真如實。可以說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关于这点王力先生有很好的說明。^① 为了說明迭字詞尾既能表“量”，又富“比喻”的这种作用，特在这里引洪升《長生殿·惊变》里的几句戏詞(南扑燈娥)：

态懨懨，輕云軟四肢；

影濛濛，空花乱双眼；

嬌怯怯，柳腰扶难起；

困沉沉，强抬双腕；

可以說，这几句戏詞的每句前一半的形容詞所比喻的，就是后一半所描写的情态；而每句話的后一半，又恰似前一半的注解。

迭字詞尾的比喻性，还可以从另一方面得到例証。我們在分析这类詞的結合情况时，往往会發現：同一个詞根，可以帶上几个不同的迭字詞尾。例如：“黑”就有“黑忽忽、黑洞洞、黑压压、黑簇簇、黑魑魑、黑漆漆、黑沉沉……”等詞尾；“亮”就有“亮晶晶、亮光光、亮堂堂”等形式；“热”就有“热忽忽、热烘烘、热騰騰”等形式。

为什么同一个詞根，会有几个不同的迭字詞尾呢？我認为是为的要求形容的确切性、形象性和生动性。本来，ABB 式是作为形容詞而起作用的，而迭字詞尾又是帶有一定比喻性的，說話者和作者在采用 ABB 式这类詞形容某个現象时，目的是要形容的确切、形象、生动，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光靠某个固定的 ABB 式是不成的。因此，必須在表达基本意义的詞根“A”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形容对象的特点，选择比喻确切的迭字詞尾“BB”，構成新的 ABB 式。例如：对一个霧霾瀰漫的夜晚，我們可以选用“黑沉沉”来形容它；而对一个空曠無光的地窟，就得选用“黑洞洞”来形容它，才更加确切、形象、生动。

迭字詞尾由于重音格式的变化和兒化等原因，它更能表达出“重量”和“輕量”的語法范疇的差別。例如：

1) 重音挪到詞根上，并且兒化，就表达了“輕量”的語法范疇：

‘甜絲絲兒’；‘軟忽忽兒’……

‘綠油油兒’；‘脆生生兒’……

可以兒化的迭字詞尾不多，因此，这种現象还不是普遍的。

2) 重音落在詞尾上，不兒化，这样表达的是“重

^① 参看王力《中国語法理論》，下冊，184—5頁。

量”的語法范疇：

黑忽'忽；乱哄'哄；臭烘'烘…

过去在討論到形容詞重迭之后表量的問題时，总偏于“重量”（或称“多量”）方面，而忽視了“輕量”（或称“少量”）方面，我在这里提出這個問題来向大家請教。

通过上面的分析、論証，肯定这类迭字的特殊的詞尾性質是沒有問題了。現在，再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它們不是“性态副詞”的問題。

黎錦熙、刘世儒先生說，“無論形、动和名，很广泛地迭起来都可以成副，常后附于其他动、形和副，以加强各色各样的客觀性态，这是汉语的一种特別構詞法。”^①

黎、刘兩位先生看到了它們的比喻性，于是就把它們并入“性态副詞”里边；并且說是“以加强各色各样的客觀性态”（着重点是原有的）。其实，黎、刘兩位先生是过于看重它們的比喻性了。正确地說，这些迭字主要的作用并不是比喻，而是表达抽象的語法范疇——量（或程度）的。因此，首先看到的不应是“性态副詞”的一面，倒應該是抽象的語法范疇的一面。

黎、刘兩位先生認為它們是“泛迭”而成的“后附副詞”。这种“泛迭”的說法，也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說，副詞作为一种附加語，对被附加語是有普遍性的。例如，否定副詞“不”，可以附加在一切動詞和形容詞上，說成“不高”、“不跑”等等；程度副詞“很”，也可以附加在一切形容詞上，說成“很多”、“很麻煩”等等。可是，这类所謂“泛迭”的副詞是作不到的。它們有很大的固定性。例如，“油油”，可以說“綠油油”、“烏油油”，但不能說“白油油”、“冷油油”。

其次，附加語与被附加語之間，可以加进别的成分。例如，“听懂”可以說“听不懂”或“听得懂”；而“硬邦邦”就不能說“硬不邦邦”或“硬得邦邦”。这种現象，說明所謂“后附副詞”与被附加語之間是不能加进别的成分的。

再次，这类所謂“泛迭”的副詞，跟一般“轉成”的副詞也是不同的。例如，“打死”的“死”，“冲破”的“破”，它們离开了被补足語，仍然可以独立表达意义。可以說“死了”，“沒破”。可是，“活生生”的“生生”，“鬧哄哄”的“哄哄”，是不能独立表达意义的。

綜上所述，我認為肯定这类迭字是一种“性态副詞”，或肯定这类迭字是一种純粹的詞尾，同样是有毛病的，不全面的。應該肯定它們是一种超出了一般詞尾范疇的、帶有比喻性的特殊詞尾。

三 关于 ABB 式演变过程的探討

在沒有进入演变問題的討論之前，我想先把迭字詞尾的活动情况归納一下。

第一种情况：ABB 式可以变为 A ABB 式，也可以縮变为 AB 式的双音节詞兒，例如：

干巴巴→干干巴巴→干巴

慌張張→慌慌張張→慌張

第二种情况：ABB 式可以变为 A ABB 式，但不能縮变为 AB 式。例如：

乱哄哄→乱乱哄哄 活生生→活活生生

第三种情况：ABB 式可以顛倒变为 BBA 式，或变为 BA 式的詞組。例如：

黑漆漆→漆漆黑→漆黑

香噴噴→噴噴香→噴香

第四种情况：ABB 式可以扩变为 A OBB 式。这个“O”一般是名詞；而且是“BB”詞尾所能比喻的。例如：

热騰騰→热气騰騰 喜洋洋→喜气洋洋

第五种情况：ABB 式固定不变。例如：

白花花 黑忽忽 甜絲絲兒 眼巴巴 肉忽忽兒

这五种情况，基本上概括了 ABB 式的变化形式。現在就来討論一下迭字詞尾的演变問題。

关于這個問題，陆、俞兩位先生說“是由重迭形式变来的”，并且举例說：“比方一个獅子、貓身上，可以說是‘毛毛烘烘’，也可以說是‘毛烘烘’；‘乱乱烘烘’也可以說‘乱烘烘’。”^②其所以由 A ABB 式演变为 ABB 式，他們認為是“丢輕音”的結果。这种見解是正确的，應該肯定。但是，如果肯定“丢輕音”是一个普遍的規律，而去解釋一切 ABB 式的来源，是有困难的。例如，“黑簇簇”、“白花花”等詞，在古汉语里或現代汉语里都难以找到“黑黑簇簇”，“白白花花”的重迭式来。为了說明这种現象，必須从迭字現象的产生談起。

單音节詞重迭的現象来源很古，在詩詞里尤其多（为了节省篇幅，不再举例）。这种現象之所以产生，我認為王力先生的見解是正确的：“因为說話人的用意，在于很生动地描繪一种情景，令對話人或讀者儼然如見。”^③随着重迭形式的發展，許多孤立的迭字，就按照双声、迭韵或意义相近等条件，慢慢結合起来了。用公式表示就是：

AA·BB→AABB·（活活·生生→活活生生→活生生）

当然，現代汉语里的 ABB 式，有些也許是由相反的方向演变来的。例如：

AB→AABB→ABB（慌張→慌慌張張→慌張張）

“丢輕音”的另一表現，是在 A OBB 式的音群里，丢掉輕音“O”，而变为 ABB 式。上述的第四种情况就是。例如：

A OBB→ABB（喜气洋洋→喜洋洋）

总之，ABB 式構成的因素和演变的过程非常复杂，这里面牽涉到許多历史原因，恐怕要通过汉语史的研究才能明白。我現在只粗略地把這問題提出来，希望引起注意而已。又如這問題是否与汉语程度副詞不

（下轉 43 頁）

① 見所著《中国語法教材》，795 頁。

② 見《現代汉语語法》上册，76 頁。

③ 見《中国語法理論》下册，184 頁。

南京話中的“A里AB”

蔣 明

“囉里囉嗦、胡里胡塗”這一類的嵌音詞，是漢語雙音綴形容詞的一種特殊重迭形式。A里AB這種形式在南京話里顯得特別發達，這可以从南京話A里AB的數量多、生發力強這兩方面看出來。

從數量上說，據筆者初步統計，常用的A里AB有一百四五十個之多（不包括“轟里轟隆、嘩里嘩啦”等一類的象聲詞），其中除了與北京話共有的一些如“古里古怪、傻里傻氣……”等之外，大多數是南京話特有的，例如“雷里雷堆（累贅）、痞里痞蘇（不爽利、不舒服）、嘔里嘔搗（不痛快）、意里意思（主意不定）、疲里疲乎（拖拉、不爽氣）”等。

在南京話里，不僅現有的A里AB使用率高，而且創造新A里AB的條件也很寬。有雙音綴的現成詞作基礎固然可以，僅有單音綴的現成詞也照樣能行。例如嫌人家隨便、賴皮，就可以說“隨里隨便”、“賴里賴皮”；嫌東西腥、粘，也可以說“腥里腥氣”，“粘里粘乎”。上面所舉這些“隨便、賴皮、腥、粘”，還都是原來就有的說法。有時為了表達的需要，南京人甚至直接創造出一些沒有原詞的A里AB來，例如揣里揣貨（不輕便）、別里別調（彆扭、古怪）、鼓里鼓搗（不平整、不貼適）等就是。這些不見得都能逐漸取得社會公認的資格，但說話的當時，這些A里AB的含義是能被聽者所理解的。應該肯定，這種靈活運用的現象，正是南京話中A里AB數量眾多的重要原因，也正是A里AB能逐漸增加的源泉。

近年以來，許多語言學者注意到了A里AB這種形式，找出它在北京話中的一些規律。南京話A里AB雖然有一些自己的特色，但基本規律却是與北京話相同的。下面打算用一些實例來印證這一點。另外，在推敲南京話A里AB的過程中，也發現了一些其他南京話與北京話共同的規律，一併在這裡提出來供學者們參考。

南京話中凡是用這種形式重迭起來的詞，它的詞義範圍都是表示人們不喜愛甚至憎惡的。上文所舉的例子已能說明這一點。底下再舉一些例子：

骨里骨蘇——指食物半生不熟，或人的脾氣古怪。

韶里韶刀——形容人喜歡多嘴、囉嗦。

痞里痞嘍——嫌液體食物不冷不熱。

甩里甩怪——形容人說話，作事都不得當。

裹里裹拉——形容衣著或其它物品不輕便、不利落。

雖然這種形式是表示憎義的，我們却不能反過來說，凡是憎義詞AB都能重迭成A里AB。因為只有

形容詞的單純詞才能全部這樣重迭，形容詞的合成詞能這樣重迭的只是一小部分（少數名詞、動詞也可以這樣重迭，重迭後詞性轉變，下文還要談到）。例如“陰險、毒辣、繁瑣”等詞，就都不能說成“陰里陰險、毒里毒辣、繁里繁瑣……”它們雖有憎義，在南京話與北京話里可都沒有A里AB的形式。

上面說，一部分憎義的AB可以重迭成A里AB，這些A里AB都可以說是由AB派生的。說AB派生A里AB在北京話里沒有什麼問題，在南京話里却不能一概而論，因為南京話A里AB中的AB並不都是能抽出來單獨使用的。例如“麻里麻癩、木里木渣（淡而無味）、楞里楞癩、鋪里鋪拉（不結實、不緊湊）”中的“麻癩、木渣、楞癩、鋪拉，都是不能獨用的。上文所舉的“意里意思、裹里裹拉、……”其中的AB也都是沒有獨用能力的。

能派生A里AB的原詞以形容詞為主，有些名詞和有些動詞也可以，這一點南京話與北京話是相同的。例如南京人常說的“疙里疙瘩、妖里妖氣、草里草包、膿里膿包”，原詞“疙瘩、妖氣、草包、膿包”就是名詞，“活里活動（不穩定）、呱里呱嗒（惡聲惡氣地斥責人）、幌里幌蕩”中的原詞“活動、呱嗒、幌蕩”就都是動詞。因此，說原詞不限于形容詞，有可能是名詞，也有可能是動詞，這是切合南京話與北京話的語言實際的。力山同志在《北京話里的一個嵌入音-li-》中認為A里AB的原詞是“形容詞或副詞（見《中國語文》創刊號），這樣提法有些缺陷：既嫌窄，又嫌寬。窄，是指它沒提名詞、動詞；寬，是指A里AB的原詞沒有可能是副詞。

A里AB和一般形容詞相較，在語法特點上的不同有四：1）一般形容詞可以直接作動詞的補語，A里AB就不可以。例如，我們可以說“你這樣說，他那樣說，簡直把我弄胡塗了”，可不能說“你這樣說，他那樣說，簡直把我弄胡里胡塗了”，如果A里AB作動詞的補語，就得在動詞後面加一個助詞“得”。2）一般形容詞可以用“不”來表示“否定”，A里AB就不能這樣。例如，我們可以說“這個人不嘍咕”（“嘍咕”是形容人脾氣不好），可不能說“這個人不嘍里嘍咕”。這是因為A里AB本身帶有“陳述性”，不能與表示否定的“不”結合。但是在命令句中它可以和“不要、別”結合，如“不要囉里囉嗦！”“別冒里冒失！”3）一般形容詞可以用肯定與否定相迭的方式來表示疑問，A里AB就不能這樣用。人們可以問“這個人邋場不邋場？”却不會（下轉7頁）

语文短评

333 于是一切又归于沉寂。两个人又就着一灯如豆，默默地做起针线活来了。(文汇报 1957 年 1 月 9 日 3 版)
“一灯如豆”是个主谓结构的词组，不能作为名词再跟介词组成介词结构。可改成“就着微弱的灯光”；要不就去掉“就着”字，让“一灯如豆”做状语，虽然文言气重些，句法上还说得过去。(谭永祥)

334 [第 45 号地区·苏联彩色艺术片] 写护林战士神速扑灭空降特务烧毁森林、企图混入的恶毒计划。(津日报 1957 年 1 月 16 日 4 版广告)

如果把这句话的附加成分全去掉，便变成“写护林战士扑灭计划”，实在不像话。“计划”可以“打破”或“粉碎”，但不能扑灭。应改为：“写护林战士神速粉碎空降特务企图烧毁森林并乘机混入城市的恶毒计划。”(谢翼彬)

335 …然后广泛发动群众讨论研究，接受过去规划中“旱包水，水包旱”，灌排渠道混乱，闸壩管理养护等缺点和教训。(新华日报 1957 年 2 月 9 日 1 版)

只听说过“接受教训”，没听说过“接受缺点”，应把“缺点和”三字删去，或是把“接受”改成“改正”，把“和教训”删去。(赵宁淦)

336 截至 1956 年底，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宣布了一种产生原子能新方法。(人民日报 1957 年 3 月 7 日 7 版)
用“截至…”，表示一定长短的时期，底下所说的事情和这个时期有关，例如“截至 1956 年 9 月底，人民日报已经发行 3370 号”。现在说的是“宣布一种新方法”，是一件单一的事情，不牵涉到一整个时期，用不上“截至”。只要把“截至”去掉，这句话就通顺了。(牛文炳)

337 [中央音乐学院实验合唱队招考队员] 凡机关、团体、工厂、企业职工、大中学在学学生、社会青年、利用业余时间、参加演唱。(天津日报 1957 年 4 月 15 日 4 版广告)

这根本不是句子，而是一些没有组织好的词和词组。可改为：“…本队是业余合唱队，机关、团体、工厂、企业的职工、大中学生、社会青年都可报考。”(谢翼彬)

338 从云龙山北望，不远处有一个高聳的土山，这便是被项羽尊为亚父的范增墓。(新华日报 1957 年 5 月 2 日 2 版)

被项羽尊为亚父的是“范增”而不是“范增墓”，“范增”后面那个“的”字少不得。(赵宁淦)

339 最近该县又专门召开了沿故黄河两岸的五个区、十二个乡、五十三个农业社主任的座谈会，全面讨论故黄河的利用和规划问题。(新华日报 1957 年 5 月 13 日 1 版)

参加会议的到底是哪些人呢？如果只是农业社的主任，应该把“十二个乡”之后的顿号改为“的”字。如果除农业社主任之外还有区乡干部，应该把那个顿号改为“的干部和”。无论哪种改法，农业社和主任之间都应该有个“的”字，因为“沿故黄河两岸”的只能是“区、乡、社”，不能是“主任”。(赵宁淦)

340 …自 1868 年至 1949 年上海解放时为止，全市也不过十四个占地 9882 亩的公园。(新闻日报 1957 年 5 月 9 日 2 版)

“十四个占地 9882 亩的公园”很容易使读者误认为十四个公园，各占地 9882 亩，这跟原意显然不符。至少应在“十四个”后面加一个“共”字。最好改为“不过十四个公园，占地 9882 亩”。(仲和)

341 一个摊贩办的小学 (人民日报 1957 年 8 月 18 日 4 版标题)

到底是“一个”摊贩自己办一所小学呢，还是许多摊贩合起来办一所小学呢？按文章里所报导的来看，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只要把“个”字改成“所”字就不会误会了。(施旦中)

342 一九五三年中国文联召开第二次文艺界代表大会，冯雪峰受委托起草大会报告，在报告草稿中他对解放后文艺界的成就几乎完全否定了，…(吉林日报 1957 年 8 月 28 日 3 版)

“对”和“把”虽然都有提前宾语的作用，但两者的用法是不同的。这里的“对”字应改用“把”字。(白俊耀)

343 …这班人在全国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中扮演了骨干作用。(人民日报 1957 年 8 月 29 日 1 版社论)
“作用”不能作“扮演”的宾语，应该把“扮演”改为“起”。(周恩来、罗务范)

344 右派分子沈三多、袁軼群及其他右派分子及言論者等，在会上竭尽挑撥鼓动之能事。（解放日报 1957 年 8 月 30 日 5 版）

沈三多、袁軼群和其他右派分子同是右派分子，不必另分出来。“言論者”不成为一个詞，不能和“分子”并列。全句应改为：“沈三多、袁軼群及其他右派分子和有右派言論的人，在会上……”（張偉）

345 民主德国的哈雷法院 2 月 27 日对美国軍事諜报机关的三名間諜各判处了十二年、四年半和三年徒刑。（人民日报 1957 年 3 月 4 日 5 版）

馬來亞以盛产橡膠和錫砂著名于世，橡膠平均年产量 60 余万吨，錫 6 万余吨，各占世界总产量的 33% 和 35%。（人民日报 1957 年 8 月 31 日 7 版）

用“各”字必須有相同之点，例如“在这个城市的 23 万人口中，原来的居民和最近五年里迁入的各占二分之一”，同是二分之一，可以用“各”。上面兩句里边，第一句的“十二年、四年半、三年”是不同的刑期，不能用“各”，应该用“分別”。第二句的“33%和35%”是两个不同的百分数，也不能用“各”，应该用“分別”。（这一句如果用“各”，只能說是“各占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左右”。）（谷斯南）

346 …在我国人民，特别是我国音乐界來說，是一件值得兴奋的事情。（人民日报 1957 年 9 月 4 日 8 版）
汉语只有“对…來說”的格式，如果用“在”，底下只能用“方面”。（潘 醒）

347 在肯定文艺的阶级性、政治性，肯定新的人民的文艺应该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时候，却往往对問題达到了簡單的結論。（中国青年 1957 年第 14 期 22 頁）

“达到”的只能是“目标、目的、目的地”等，不能說“达到結論”。应改为：“…却往往給問題下了簡單的結論。”（方曙平）

348 作为北京的观众，对著名的武生高盛麟离开他出身之地——北京的舞台这么久而不回来演几場戏，真是十分令人怀念。（新观察 1957 年第 7 期 24 頁）

誰“作为北京的观众”？誰“对著名的武生高盛麟…不回来演几場戏”？沒有交代。“作为北京的观众，对高盛麟…不回来演几場戏”又怎么样？也沒有很好交代。底下来个“真是十分令人怀念”，使整个句子的結構陷于混乱。只要去掉“令人”二字，使讀者意識到有一个沒說出来的“我”作全句的主語，句子就貫通了。但这里用“怀念”也还欠妥，也許該說“感到遺憾”。（程好問）

349 总政文化部当时决定丁里同志由总政文工团政治委員的工作崗位上抽出来导演这个戏。（解放军文艺 1957 年 7 月号 9 頁）

从“由”字看，丁里同志是主动者，从“抽出来”看，丁里同志是被动者，这就使句子不通了。按原意，应在“决定”之后加一“把”字。（山岭）

350 在汉语拼音文字通行之后，因为以上所述的特殊关系，汉字將有某程度、在某方面、某阶段相当的長期存在。（拼音 1957 年 7 月号 4 頁）

既有“某程度”，又有“某方面”，还有“某阶段”，再来个“相当的”，看起来話說得很严密，实际上是說得很糊塗，叫人不懂究竟真意何在。只要改为：“…汉字仍然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下去”，完全可以表达必須表达的意思。（康郎、均仁）

351 假使我們仅仅引用这些話給中学生解說詩、詞、曲的“分疆”、“分界”，必然地愈听愈糊塗。（語文教学 1957 年 8 月号 1 頁）

上半句的主語是“我們”，但“愈听愈糊塗”的主語却是“中学生”。应在“必然”前面加“他們”。“必然”之后一般不加“地”。（而中）

352 右派分子为了反对党的領導，利用某些知識分子对文字改革的抵触情緒，不惜对社会主义建設和工农大众有利的文字改革工作进行惡毒歪曲。（中国語文 1957 年 8 月号 47 頁）

“对社会主义建設和工农大众”是一个介詞結構，是“有利”的狀語，“对…文字改革工作”是另一个介詞結構，是“进行”的狀語。这两个介詞結構湊在一起，兩個“对”字碰头当然不好，但是併成一个也不对。应该設法取消一个。似可改为：“…不惜对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設和工农大众的文字改革工作进行惡毒的歪曲。”（而中）

353 她現在不需要看見一个人類，她憎恨任何人走入她屋中。（科尔沁旗草原，作家出版社出版，第 415 頁）。
“人类”是一个集体名詞，这里应改成：“她現在不需要看見任何一个人，…”（徐偉）

更正：本刊 1957 年 9 月号目录倒 11 行“作品意見”应为“作品的意見”；23 面倒 3 行“古詞”应为“古詩”；24 面倒 8 行“…000, 0000”应为“…000, …0000”；48 頁左欄 10 行“召”应为“占”。

中古方音差別問題

章 璣

我讀了李于平先生的《陸法言的切韻》一文（本刊1957年2月号）之後，對於中古方音問題有點疑問，這里寫出來向李先生請教。

李先生也承認中古（李先生稱“切韻時期”）有方言的差別，具體論證時說：“我們可以假定《切韻》時期的方言，音類上頭的差別比音值上頭的差別小。”又說，“拿現在方言的情況類推古代方言的情況，我們可以假設《切韻》時期，方言之間音類的差別不大。《切韻》前後其他音韻史料，也是符合這個假設的，不過本文不能細說。”

李先生怎樣得到這個結論的呢？李先生比較了現代的濟南話和北京話，論證了它們之間音類差別不大，接着用“類推”的方法就得到了那個結論。李先生未說明為什麼要拿這兩處方音來比；如果拿現在的北京話和廣州話來比，是否也可以“類推”古代方言的情況，而所得的結論是否相同呢？李先生說還有一些史料“符合這個假設”，可惜限於文章的性質，李先生“不能細說”是什麼“史料”。

我想在這個問題上也抄几項史料請教一下。從這幾段史料看來，我覺得李先生的假設是有問題的。

《切韻》作者之一的顏之推，在《家訓·音辭》篇說：“其謬失輕微者，則南人以錢（昨先切）為涎（夕連切），以石（常隻切）為射（食亦切），以賤（才錢切）為羨（似面切），以是（承紙切）為舐（神紙切）”；“劉昌宗《周官音》，讀乘（食陵切）若承（署陵切）”。又敦煌曲子中有這樣的句子：“父兄皆事佐國良臣”（王重民《敦煌曲子詞集》，頁70）；“薄情事我夫”（頁66）。這兩句中的“事”字皆

當為“是”字。“事”，鉅吏切；“是”，承紙切。從這樣例證可以說明，在中古方言中有不少是牀母與禪母不分，從母與邪母不分的。

《顏氏家訓·音辭》舉《字林》中音“看”為口甘反。《廣韻》“看”，苦寒切，寒韻；“甘”古三切，談韻。又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六引唐胡曾《戲妻族語不正》詩：“呼十却為石，喚針將作真。忽然云雨至，總道是天因。”這詩說明了胡太太的方言針、真不分，陰、因不分。（“呼十却為石”也有問題，此處不論。）；“針”職深切，侵韻；“真”職鄰切，真韻；“陰”於金切，侵韻；“因”，於真切，真韻。這幾個例子說明當時有些方言是不分侵真、寒談韻的，用現代話來說，韻尾上大有區別。

李涪《刊誤》《切韻》條下說：“然吳音乖舛，不亦甚乎！上聲為去，去聲為上。……又恨怨之恨，則在去聲；恨戾之恨，則在上聲。又言辯之辯，則在上聲，冠弁之弁，則在去聲。又舅甥之舅，則在上聲；故旧之旧，則在去聲。又皓白之皓，則在上聲；号令之号，則在去聲。又以恐字苦字俱去聲。令士君子于上聲呼恨，去聲呼恐，得不為有知之所笑乎！”這里列出的“恨”、“恨”，“辯”、“弁”，“舅”、“旧”，“皓”、“号”四對字，說明了李涪的方言是全濁上聲變去聲的（本段資料轉用李榮《切韻音系》1956年版頁152注1）。上文所引用的敦煌曲子中“事”誤書作“是”的例子，“事”去聲，“是”全濁上聲，同樣說明全濁上聲變去的語音情況。至於全濁上聲字去聲韻的例子是相當多的，這里不必舉例。

這兒就聲、韻、調三方面各舉一例，已經可以說明當時的方言在音類上的差別也不是不大的。

每冊定價人民幣 0.24 元（訂閱刊費預付、按季整訂）

本刊上期 9 月 22 日出版

中國語文

月·刊

1957 年 10 月号

總第 64 期

1957 年 10 月 22 日出版

編輯者 中國語文編輯委員會
北京海甸中關村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景山東街 45 號

印刷者 北京京華印書局
北京虎坊橋

總發行處 郵電部北京郵局

訂購處 全國各地郵電局、所

代訂處 全國各地新華書店

預定：三個月 0.72 元，半年 1.44 元，全年 2.88 元；寄費：1. 平郵寄費不計，2. 掛號郵費由訂戶負擔。

1-21,705 冊
代號 2-44